

在肃反問題上
駁斥右派

群众出版社

在肃反問題上駁斥右派

群众出版社

1957.8

在肃反問題上駁斥右派

群众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东堂子胡同3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00号

五三五工厂印刷·新华書店發行

書号(总)26(社)3开本787×1092 1/32印張5¹⁵/₃₂

1957年8月第1版 1957年8月第1次印刷

字数124,000 印数00001—40,000册

定价(5) 0,39元

編 者 的 話

我們的國家現在所以能夠這樣的鞏固，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們通過偉大的肅反鬥爭，比較徹底地肅清了反革命，基本上完成了擺毀殘余反革命勢力的歷史任務。這本來是一件很容易了解的事。但是，資產階級的右派野心家們，為了達到他們不可告人的目的，卻不肯正視這一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實，他們竭力散布種種謬論，對肅反鬥爭肆行惡毒的攻擊，企圖從根本上否定肅反運動的偉大成績。當然，他們這種陰謀是不能得逞的，現在，他們的這種陰謀，正在遭受到全國人民的堅決的反擊。

為了在這一反擊中盡我們應盡的一分力量，我們準備陸續匯集有關這方面的材料編成小冊子。這一本小冊子中收集的是：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有關這方面的報告和發言，全國各地有關駁斥右派分子在肅反問題上的謬論的一些言論，並以人民日報7月18日的社論——“在肅反問題上駁斥右派”，作為本書的引言。這裡所搜集的材料，雖然不甚週全，但我們相信，這本小冊子對於擊破資產階級右派野心家們對肅反的各種謠言，使全國人民了解真象，將會有所幫助。

1957年8月5日

目 录

在肃反問題上駁斥右派 ……………人民日报7月18日社論	1
在第一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會議上	
关于一九五六年以来檢察工作情况的报告…張鼎丞	11
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报告……………董必武	30
全体司法干部团結在党的周圍彻底打垮右派 分子的猖狂进攻……………史 良	39
肃反斗争是一次历史性的偉大胜利……………馬卓洲	47
河南省肃反运动的胜利……………賈心斋	57
决不能放松警惕……………刘永生等	61
肃反对誰來說“糟得很”……………陈成义	66
肃反成績是不容怀疑的……………朱 光	70
不許右派推翻肃反成果……………谷志标	77
肃反运动的偉大胜利……………欧百川	85
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在健康的成长……………刘文輝	87
駁斥右派分子污蔑肃反的謊言	
評肃反“糟得很論”……………石小祖	93
肃反运动搞糟了嗎?……………高炳文	95
对反革命分子必須实行专政……………尹惠純	98
右派分子为什么攻击肃反……………鳴 邦	104
揭穿右派分子把肃反运动說成是 “庸人自扰”的阴謀詭計!……………于洪洋	108

肃反工作的成績是偉大的，任何右派分子	
也否定不了……………	刘 公 113
駁右派分子对肃反运动的各种謬論……………	任光椿 118
斥右派分子对肃反运动的攻击！……………	薛 坦 127
肃反运动推不翻……………	張少康 138
肃反运动在兰州……………	兰 坪 148
肃反运动搞得很好（民革中委楊亦周	
先生訪問記）……………	方 凌 153
誰說肃反搞錯了（越劇演員許瑞春訪問記）	孙傳鑄 158
肃反运动太好了（大連造船厂老工人	
黃兆林訪問記）……………	牟承启 161
保卫肃反成果坚决打击右派分子的污蔑……	周 齐 164
感謝肃反解除了我的思想包袱……………	譚启栋 167
談談我对肃反的亲身感受……………	庄本农 169
我認为肃反并不“伤感情”……………	王維祺 173
經過肃反使我增强进步信心……………	陈可新 175
我对肃反运动的亲身体会……………	刘汉耀 177
我这个冒牌特务是在肃反中查清的！……………	李鴻成 179
倪鳴皋以自己的經歷駁斥右派分子的謬論……………	182

在肅反問題上駁斥右派

人民日報 7 月 18 日社論

現在我們都公認毛主席這樣的論斷是正確的：在我們國家里，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反革命分子不多了，這是一個有重大意義的事實，它從一個重要的方面表明，我們的人民民主國家已經基本上解決了摧毀反革命勢力的歷史任務，走上了鞏固發展的階段。

反革命分子之所以不多了，首要的原因正是過去幾年來的鎮反運動和肅反運動。這本來是很容易了解的事。然而，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特別是那些企圖用庇護反革命分子和成立所謂平反委員會來取得政治資本的英雄們，却竭力散布種種謬論，特別攻擊 1955 年開始的在機關學校進行的肅反運動，說它“糟糕透頂”，根本沒有成績可言。另外一些人，或者由於在肅反運動中被鬥爭過，或者由於把暫時的局部的現象當作全體，也隨聲加以附和。為了澄清這些錯誤意見，對於肅反運動（主要是 1955 年的肅反運動）究竟有無成績，成績大小，必須根據事實，加以實事求是的討論。

肅清反革命分子的鬥爭是一場艱苦的、複雜的鬥爭。在這個鬥爭中，敵人是隱蔽的。正因為這樣，我國人民在肅反鬥爭中，不但依靠專門的國家機關——公安部門——的工作，而且首先依靠廣大群眾的積極參加。我們認為，只有廣

大群众积极投入这个斗争，才能比较容易发现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也才能比较少犯错误。要错误少就得经验多，而经验是需要积累的。从这个观点出发，才能正确地估计1955年肃反运动的成就和错误。

1955年肃反运动的成就，有以下四个主要的方面。

第一，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就现在已经定案的来说，有八万一千多名（普通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由于国家采取了更加宽大处理的政策，不以反革命分子论处，没有计算在内）。在这些反革命分子里面，有美蒋特务机关派遣进来的特务间谍，有老早就潜伏下来的特务间谍，有重要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有各种各样的反革命集团。把他们清查出来，对于我国的国防和建设的安全，无疑有极大的意义。

第二，由于肃反运动，反革命分子内部日益趋向于分化和瓦解。一年多来，全国有十九万余名反革命分子投案自首，其中包括不少长期潜伏的和美蒋派来的特务间谍分子。1956年全国的反革命案件，比1955年减少了40%以上，其他刑事案件也减少很多。对于反革命活动的打击，帮助了社会秩序的安定，帮助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顺利进展。

第三，在肃反运动中，还有一百三十多万人弄清楚了各种各样的政治问题，例如隐瞒参加反动组织、隐瞒反动身份、隐瞒历史上的恶迹等等的問題。不弄清楚这些问题，就很难划清敌我界限，而他們自己也将背着沉重的包袱。现在，对他們弄清了疑点，做出了结论，使他們去掉了精神负担，便于积极工作。这无论对于人民事业或者对于他們本人，都是有利的。

第四，经过肃反运动，群众比较懂得了怎样去识别隐蔽

的敌人。使广大群众具有对隐蔽的敌人的警惕性，具有识别暗藏反革命的能力，不仅过去和现在需要，将来也仍然需要，因为帝国主义还存在，蒋介石集团和残余的反革命分子还存在。大家都看到6月9日报纸上的一条消息：6月7日晚上，一个特务分子在广州文化公园扔了定时炸弹。如果不是被两位青年学徒发觉，就不知道会有多少游客死在特务手里。很明显，群众的这种革命警惕性，经过肃反运动是更加提高了。

以上所说的肃反运动的巨大成绩，都是不容抹煞的。

否认肃反运动有成绩的有几种人。一种人同人民站在相反的立场上，从根本上否定肃反运动。人民认为肃反很必要，他们却认为肃反本身就是错误。人民因为肃反的结果得到了安定的社会秩序而感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他们则因为自己的阶级本能，在思想感情上总觉得把反革命分子搞得太狠了，而对于肃反运动和肃反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对于领导肃反运动的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心怀怨恨。这种人实际上是反革命分子的代言人。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些人，例如黄绍竑，在解放以前本来是杀人不眨眼的反革命刽子手。这样的人，对于肃反运动怎么会不竭力反对和加以污蔑呢？

另一种人承认肃反运动有成绩，却认为成绩太小了。他们说，“搞来搞去没有搞出多少反革命分子”。在他们看来，八万人的数目是太小了，不值得“小题大作”。

这种意见是错误的。首先，就是不說肃反运动给予整个反革命活动的沉重打击，也不說由于肃反运动才投案自首的十九万余名反革命分子，单是八万个反革命分子也决不是什么小事。难道一定要八十万个，八百万个，才值得我们兴师

动众去肃清么？

其次，应该指出，在这八万多反革命分子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人窃据了重要部门的重要职位。例如曾经是内务部户政司司长的周维斌，原来是叛变投敌，做过日伪警察分局长而且负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又如山西师范学院教授、民主同盟成员潘恩溥，是一个叛徒和中统特务分子。他曾经破坏内蒙古东胜旗革命运动，出卖党的负责人，致王若飞同志被捕，田得秀同志被害。又如吉林省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处长于民一，原来是1938年混入革命队伍的中统特务。又如，公安部十局副局长张荣桂，竟是一个混入共产党十八年的特务，早在1935年他就参加了国民党反革命组织C.C.。

让反革命分子掌握了重要职务，窃据了要害部门，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敌人在我们的革命堡垒里面，埋下了按照敌人意志活动的“定时炸弹”。这些炸弹一旦爆炸，就可能给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事业造成难以逆料的损失。

还应该指出：在1955年—1956年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中，现行犯有三千八百余名之多，而且这里面还有相当数目的重要的特务间谍。

广州市第十五中学教员黄然，1955年3月经澳门的特务分子张维安、张维柱介绍，参加了蒋帮特务组织，被委任为“广州工作组组长”。他曾八次用密写、暗语等方法同特务组织联系和寄送情报。武汉市劳动局调配处会计王鹏，是蒋帮保密局的上尉通讯员，解放前干过逮捕进步学生、监视中共代表团等罪恶勾当。1949年，他在日本的“中美联合工作总部万能情报员训练班”受训，1950年就潜回大陆进行特务活动，向敌人送过密写情报多次，并阴谋架设电台。山西太

原機車車輛修理廠四級工程師王孚中，騙取了先進工作者稱號，審查結果竟是奉保密局太原站長田峻之命，攜帶電台一部，潛伏下來進行特務活動的軍統特務。

有人說，在清查出來的反革命分子中間，大部分並非身居要職，也不是現行犯。但是第一，對於重要的和現行的反革命分子的危險性，不能簡單地拿數字去判斷；第二，沒有身居要職的歷史反革命分子，對於人民的危險性也決不允許忽視。

許多人都知道抗日戰爭時期發生的河北灤縣“千人坑”大慘案，有一千二百八十名愛國同胞在這個慘案中遭到活埋。當時河北灤縣日偽警察所警務股書記張占鰲，就是這次慘案的兇手。在埋入坑前面，曾經有一位婦女揹着一個小孩，跪在他的面前求饒。毫無人性的張占鰲竟一木棒把這位婦女打到坑里，然後提起孩子的兩隻小腿扔了下去。解放以後，他改名換姓，混進了黑龍江省龍江縣的教育界，當了小學教員。

1947年蔣軍侵入山東省昌邑縣的時候，該縣角蘭鄉自衛團長畢晉祥，同一幫匪徒活埋和慘殺了本鄉的十五名革命幹部，積極分子和他們的家屬，其中五個人是畢晉祥直接動手殺害的。這個劊子手還慘殺了土改積極分子李永勝的全家，包括一個三歲的孩子。直到這次肅反運動，才把他從第一汽車製造廠的雜工中清查出來。

象這樣萬惡的凶犯，能夠聽任他們逍遙法外嗎？

這樣的劊子手，隱瞞了自己的血腥的歷史，甚至改了名，換了姓，混在人民內部，雖然暫時同反革命組織中斷了聯繫，暫時隱蔽不動，但是有什麼根據相信他們已經痛改前

非，真正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呢？一旦他們認為时机到来，他們就会重新擦亮屠刀来对付人民。6月25日报載，山东館陶县浮渡乡乡长申林台全家九人，有七人惨遭反革命分子杀害。行凶的主犯申孟春在敌伪时期当过伪军班长，对革命群众有过血债。这一次他只是怀疑申林台知道他的底細，就对申林台全家下了毒手。对于这样的豺狼，难道不应该在他們还没有来得及重新动手以前，就把他們清查出来么？

彻底肃清反革命，这是我們国家的长治久安之計。正因为这次肃反运动在历次的革命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又得到了新的巨大的胜利，清除了大量的反革命分子，弄清楚了许多人的政治問題，我們的革命队伍更加純洁了，所以党和人民政府才有把握作出这样的論断：反革命还有，但已經不多了。

再还有一种人說，肃反成績的确很大，但是錯誤缺点更大，因而得不偿失。这种說法对不对呢？

当然，我們說肃反运动有巨大的成績，并不是說在肃反运动中沒有錯誤，沒有偏差。肃反运动确实有錯誤，在极少数单位，錯誤还很严重。無論錯誤大小，有了錯誤就必須糾正，不能含糊。但是这些錯誤同上述的肃反运动的重大成績比較起来，只能說是次要的。

肃反运动中究竟有那些錯誤呢？

錯誤的性質有两类。一类是有些单位在肃反运动中漏掉了一些本来可以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另一类是不少单位錯斗了一些好人。这些单位曾經根据一些不确实的材料，沒有經過認真的調查和仔細的分析，把本来沒有政治問題的好人錯認為坏人。还有一些人平日工作上出过容易引起怀疑的差錯，肃反运动一来，这些单位的領導方面沒有冷靜地加以

分析，混淆了工作上的差錯和反革命破壞，以致把這些人當作反革命分子鬥爭了。

究竟為什麼一些共產黨員會犯這種現在看起來是不應該發生的錯誤呢？這是因為，反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鬥爭，本來是一件難事。加以許多單位沒有用最嚴肅的態度進行周密的調查研究，因而混淆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或者把壞人當作了好人，或者把好人當作了壞人。漏掉了的反革命分子，必須繼續清查，不能因為肅反有了成績而懈怠疏忽。錯鬥了一些好人，傷了他們的感情，損害了他們的名譽，使其中一些人暫時地同黨和政府疏遠了，使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某些環節暫時地受到了一定的損失，對於這種錯誤必須坦白承認，並且徹底糾正。

有一些沒有反革命活動、但是隱瞞了政治問題的人，在肅反運動中也曾被鬥爭過。因為隱瞞政治問題而引起懷疑，隱瞞者本人不能說沒有責任。經過清查，現在才可以作出明確的判斷，他們並不是反革命分子。如前所說，弄清了他們的政治問題是好事，但是把其中有些人當作反革命分子，却是錯了。

此外，在一個短的時間內，有些地方，在鬥爭方式上犯了錯誤，例如打人罵人等等。這些錯誤僅僅是發生在1955年肅反運動初期小組鬥爭的高潮當中，時間很短，一經發現，就採取了糾正的措施。

有些人不大喜歡“難免”論。當然，如果可以避免的錯誤而沒有避免，那是不能用“難免”論來推卸責任的。但是象肅反這樣的鬥爭，你或者根本不進行，那只能把反革命分子保留下來；或者認真地進行，那就確有一部分錯誤是難以

避免的。正因为考虑到这一点，所以党和人民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尽可能地防止錯誤的发生和扩大，尽可能地避免不能补救的錯誤。这些措施确实避免了許多錯誤，但是仍然沒有避免了也不可能避免所有的錯誤。

就錯斗了好人的問題說，無論是直接被錯斗的人，或者是同他們亲近的人，或者是自己参加了錯誤的斗争、感觉抱歉的人，或者是完全旁观、代打不平的人，对于这样的錯誤都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公平的認識。錯誤都是不对的，不好的，不应该掩护和粉飾的；身受錯誤損害的人，尤其不免有种种痛苦。这是事情的一面。但是事情还有另一面。这种錯誤是为什么发生的呢？是为了保存反动势力？是为了私人的恩怨利害？是明知其为錯誤而故意犯錯誤？不是的。犯錯誤的人（除了极个别的假公济私、明知故犯，因而必須懲处的例外）是为了革命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他們当时并不知道而且很难知道自己是犯了錯誤。在最英明的統帅所指揮的完全正义的战争中，也无法保証被炮火攻击的都是該受攻击的。不但普通居民，有时甚至自己方面的战士，也会受到誤伤。但是我們能不能根据这些無心的过失，去否定一場革命战争或者卫国战争的必要性和正义性呢？我們能不能因此而把犯了这些过失的将士看作冤仇呢？同样，每一个能够客观地权衡利弊得失、分清大是非和小是非的人，对于肃反斗争中的錯誤，以及其他革命的群众运动中的錯誤，也不难作出正确的而不是片面的、感情用事的判断。

毫無疑問，在斗争中，同一些人伤了感情，发生了一些副作用（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甚至是难于弥补的副作用），对于这一点应该有足够的估計。我們認為，在一方面，暂时受伤

害的人應該看到事情的本質和整體，不要怨恨不已，必報復而后甘心；在另一方面，在鬥爭中誤傷了好人的人，特別是各單位肅反鬥爭的領導人，必須向一切受了傷害的好人公開承認錯誤，進行賠禮道歉。當着原來參加鬥爭的群眾恢復他們的名譽。這個工作許多地方已經進行過，已經取得了許多被錯鬥的人的諒解。有些地方善後工作做得不好，應該立即毫不躊躇地認真補課。即令有些人暫時還不諒解，我們相信，當他們徹底了解了肅反鬥爭的意義，看到了肅反鬥爭的某些錯誤確是難以完全避免，那些犯錯誤的人對他們確是毫無私怨，而且在認識了錯誤以後堅決糾正錯誤，向他們誠懇地賠禮道歉，當眾恢復他們的名譽之後，他們終有一天是會完全諒解的。

說肅反的成績是主要的，是指就全國、全省、全市、全區來說的。至於某些單位，錯鬥了一些人，而並沒有搞出一個反革命分子，或者根本那里就沒有反革命分子，當然應當進行具體分析，作出實事求是的結論，即使在這樣的單位，也不能抹殺肅反的成績。把一個單位的全體人員的政治面目弄得清清楚楚，為什麼不是成績呢？至於用這樣的局部的情況去判斷全體，那自然更不正確了。

無論如何，凡是站在革命的人民的立場上的人，凡是堅決主張肅清反革命的人，決不能給肅反運動潑冷水，決不能給參加肅反運動的群眾、積極分子和幹部潑冷水。人民事業的進步；人民民主專政的鞏固，依靠而且只能依靠革命的群眾、積極分子和幹部的任勞任怨、百折不撓的奮鬥，依靠而且只能依靠他們在奮鬥的過程中不斷地增加經驗，提高覺悟。群眾、積極分子和幹部的革命積極性，這是一切財富中

最寶貴的財富。對他們潑冷水，實際上也就是對革命潑冷水，對社會主義潑冷水。

反革命分子雖然不多了，但是還有，因此還需要繼續警惕，繼續識別，繼續清除。“有反必肅，有錯必糾”，這就是革命的人民的方針。為了貫徹執行這個方針，對於過去的肅反運動的成績和錯誤，作出透徹的分析和恰當的估計，是完全必要的。只有這樣，才能夠用事實來駁倒那些根本反對肅反運動的右派分子，才能夠用事實來回答那些對肅反運動抱有懷疑態度的人，才有利於認真糾正工作中的左的和右的錯誤，也才有利於保護人民群眾同反革命分子鬥爭的積極性。

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第四次會議上

關於1956年以來 檢察工作情況的報告

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張鼎丞

各位代表：

我代表最高人民檢察院向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報告一九五六年以來檢察工作的情況，請予審查。

一九五六年以來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各級人民檢察院的工作主要是：繼續深入地進行了肅清反革命分子和懲治其他犯罪分子的鬥爭，對於一九五五年以來的肅反案件進行了檢查，完成了對在押日本戰爭犯罪分子的偵查起訴工作，並且改進和發展了檢察業務。現在分別報告如下：

一、一年多來的肅反鬥爭情況

在一九五五年底和一九五六年初，由於社會主義革命勝

利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由于一九五五年肃反斗争的巨大胜利，反革命分子内部愈益明显地表现出分化和瓦解的趋势。根据这一情况，中共中央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规定了宽大处理农村中残余反革命分子的办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了关于宽大处理和安置城市残余反革命分子的决定。由此，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开展了政治攻势，号召一切反革命分子投案自首，并且对于免于追究刑事责任的分子、刑满释放的分子和被管制的分子，进行了规划入社和安置就业的工作。

一年多来各级检察机关和司法各部门贯彻执行党和政府上述方针政策，取得了肃反斗争新的胜利。

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深入地开展政治攻势的结果，全国有十九万余名反革命分子投案自首，其中有罪恶严重、民愤很大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有解放后多次进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并且有不少长期潜伏下来和从国外派遣进来的特务间谍分子。在机关内部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中，也有很多是在宽大政策感召下坦白交代的，其中有些是隐藏在高级机关和要害部门中的反革命分子。目前反革命分子这种分化瓦解的情况，还在继续发展。

各级人民检察院在对残余反革命开展政治攻势中，执行了对于投案自首分子的宽大政策，对于罪行轻微、或者仅有一般历史罪恶没有现行破坏活动的投案自首的分子，一般不予追究；对于按其罪行应该追究刑事责任，但系真诚坦白或者有立功表现可以免于刑罚的分子，作出免于起诉的决定；对于坦白自首但罪恶严重仍需判刑的，也在起诉时建议法院从宽判刑。根据二十一个省、市检察院和专门检察院的统

計，在一九五六年，經檢察机关作出免于起訴决定的共一万八千四百余人。

其次，一年多来对于反革命分子以及地主富农分子的改造工作，收到了更大的成效。在各級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对于在城市和农村中原来的反革命分子以及地主富农分子分別规划加入合作社或安置就业，有些并依法改变了他們的反革命身份或地主富农成份。据統計，在老解放区，原来的反革命分子、地主富农分子成为正式社員的一般占百分之五十左右，候补社員占百分之四十左右，监督生产的占百分之十左右。在后解放区成为正式社員的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候补社員占百分之六十左右，监督生产的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在城市中，对于寬大处理和安置残余反革命分子也做了許多工作。据辽宁、河南、江苏等地区的統計，共寬大处理了在城市中的残余反革命分子一万八千一百六十六人，其中安置就业的一万三千八百四十二人，占百分之七十六。在对犯人的劳动改造工作方面，由于監獄和劳改机关进一步加强了政治教育和人道主义待遇的感化，也收到了更好的效果。一九五六年有相当一批服刑期滿和在劳改中表現良好的分子，从監獄和劳改場所釋放出来，得到了正当的社会职业。这样，就把一大批原来对社会起消极作用的人，改造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同时，各級人民檢察院本着“有反必肃”的方針，繼續逮捕起訴了一批过去有罪惡和民憤而拒不投案的反革命分子，进行現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和敌人派遣进来的特务間諜分子，以及經過处理后仍不悔改、又繼續进行破坏活动的分子。例如，国民党“中委会第二組”派遣进来的特务分

子刘立，曾多次刺探我軍事情报，报告給蔣帮的特务机关，并于一九五六年五月一日晚，用定时炸彈破坏了广州深圳車站以北的一段鐵路。这个罪大恶极的特务分子，在案件发生后的一个月內即被我公安机关逮捕归案，經檢察机关提起公诉，人民法院已判处了該犯死刑。一九五七年六月一日夜，山东省館陶县三区发生了一件重大的反革命凶杀案：主犯申孟春是一个当过汉奸、有血債、逃亡十余年的反革命分子，一九五七年二月潜回本地，于六月一日夜伙同其他几个反革命分子将我館陶县三区浮渡乡乡长、中共乡总支委員申林台一家九口人，杀死七口，杀伤一口，行凶后并散发反动布告。这伙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杀人犯，也沒有能够逃脫人民的法网，在案件发生后的七十二小时內就被破获。十分明显，对于这样一些反革命分子給予严厉镇压是十分必要的。

一九五六年，在肃清暗藏在机关内部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胜利，繼續查出了一批隱藏較深、罪惡很大的重要历史反革命分子和繼續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特务分子。例如，甘肃省查出了混入兰州市工人电影院的反革命分子蘆秉林，他原是盛世才統治新疆时的伪監獄官，亲手杀害了中共黨員陈潭秋、毛澤民、林基路等同志。江西省余干县航運站查出的反革命分子章光亮，是一个有四十六条人命血債的外逃反革命分子，解放后会五次改名換姓逃避我公安机关的追捕，在这次肃反运动中，才被群众查出。广州鐵路机务段查出了特务分子江賽荣，他于一九五〇年即参加了蔣帮特务組織，曾先后发展四人当特务，并向特务机关报告我軍运情况十余次。从这些事例不难看出，肃清暗藏在机关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对于純洁革命組織、巩固人民政权、保卫社

会主义事业，是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一九五六年的内部肃反斗争，由于领导机关和群众有了更多的经验，由于专门机关和群众运动有了更加密切的配合，因而肃反斗争进行得更加健康，错误越少了。

一年多来的肃反斗争证明，在社会主义革命基本胜利和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力量已经肃清的情况下，对残余反革命分子进一步实行宽大政策是正确的。但是应该认识，今天的政策只适合于今天的情况，如果以今天的政策去衡量过去的问题，认为我们过去对反革命分子采取的镇压措施是错了，或者说在过去就应当实行象现在这样更为宽大的政策，从而否定过去肃反斗争的成绩和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在过去一个时期内，党和国家的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和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必须发动群众直接行动来完成革命的任务。当时，残余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十分猖狂，党和国家采取坚决镇压的措施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就是在当时，党和国家的肃反政策也是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在一九五六年以后，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国家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党和国家的政策当然有必要相应地加以改变。由此可见，党和国家对反革命分子的政策是根据不同时期的斗争形势和任务以及反革命活动的情况来决定的，过去的政策适合于过去的情况，今天的政策适合于今天的情况。

现在，虽然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力量已经肃清，残余反革命分子的数量更加减少了，但是，国内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还有少数更加坚决和狡猾的反革命分子在作垂死的挣扎，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还在不断地派遣特务间谍进行

破坏活动，而且今后还可能出現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因此敌我矛盾虽已降到次要地位，但是敌我矛盾还是长期存在的，我們决不能放松警惕和懈怠斗志。

二、对1955年以来的肃反案件的

检查工作

一九五六年二月，最高人民檢察院指示各級人民檢察院对于一九五五年肃反斗争所逮捕和起訴的案件进行認真复查。一九五六年七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又会同最高人民法院、中央公安部、中央司法部召开了全国各省（市）公安厅（局）长、檢察长、法院院长联席会议，决定对一九五五年以来的肃反案件进行一次普遍检查。会后各地檢察机关均协同有关部门組織了专门力量进行检查工作，中央和各省市的司法机关，都組織了工作组深入县、市进行指导。检查的结果有力地証明了在一九五五年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尖锐阶级斗争中，开展大规模的肃反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指导肃反斗争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司法各部门在执行国家的法律和肃反的方针政策上是严肃認真的，肃反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所取得的成績是巨大的。

一九五五年以来肃反斗争中所逮捕和判处的反革命分子，絕大多数是拒不登記坦白、有罪惡、有民憤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和进行現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对于这些反革命分子給予应得的懲罰乃是完全必要的，而且絕大多数案件是办理得正确的。

在这里，我举两个地方的例子来说明：

例如，北京市自一九五五年一月至一九五六年上半年逮

捕的反革命犯，經過逐案檢查證明，其中百分之九十五点九七是捕得正确的；錯捕的占百分之一点二九，有罪惡但按政策可以不捕的占百分之二点七四。在捕得正确的反革命犯中：历史上有人命血債的反革命分子占百分之二十三点零七，解放前有搜集情报、鎮压学生运动、瓦解革命組織等各种罪行罪該逮捕的反革命分子占百分之八点五五，有抓捕、拷打革命工作人員和搶劫、勒索財物、奸淫妇女等罪惡的反革命分子占百分之二十八点四九，組織反革命武装、进行反攻倒算和利用反动会道門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占百分之二十点一，特务間諜及进行各种現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占百分之十九点七九。

再以河北省通县为例。經過該县司法各部門前后六次进行复查，証明該县从一九五五年一月至一九五六年六月逮捕的反革命分子中，有百分之九十五点七一是一捕得正确的，錯捕的占百分之一点四八，有罪惡但按照政策可以免于追究的占百分之二点八一。在应当逮捕的反革命分子中：历史上有人命血債的反革命分子占百分之四十四点一四，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反动道首占百分之二十三点二四，实行反攻倒算的不法地主分子占百分之九点八六，抗拒登記并进行潜伏活动的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占百分之十二点六七，有建立反革命組織、进行反革命造謠破坏等現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占百分之八点四五，犯有其他罪行的反革命分子占百分之五点六四。这些反革命分子中有些所犯的罪行是极为严重的，他們在解放前共杀害了我干部、群众八十三名，抓捕群众一百五十人，倒算和搶劫农民的粮食十八万二千余斤，并且其中有些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在解放后繼續进行各种反革命

活动。

仅从上述两个地方的情况即可表明，在一九五五年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开展肃反斗争严厉镇压反革命的破坏活动，是完全必要的。

在几年来肃反运动胜利的基础上，经过一九五五年肃反斗争又一次给予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反革命的残余势力已经基本上肃清了。一九五六年反革命案件较一九五五年下降了百分之四十二点七，其他刑事案件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二点八，社会秩序更加安定了。肃反斗争的胜利，有力地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顺利发展。

但是，在肃反斗争中也发生过一些缺点和错误。一方面是发生了一些错捕、错判的案件，捕了一些虽有一定的罪恶但按照党和国家的政策不必再加以追究的人，也错捕、错判了个别无辜的好人。另一方面，在肃反斗争中还漏掉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发生了一些该捕不捕、该判不判和重罪轻判的现象。在一九五六年实行更为宽大的政策精神以后，有些地方片面强调从宽，对于一些罪恶严重、应当逮捕法办的反革命分子也不予追究或判刑过轻。在机关内部肃反斗争中，也有比较严重的漏掉反革命分子和处理偏轻的现象。例如，云南省临沧专区在肃反运动结束后，又复查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二十二名。黑龙江省绥化县在复查中查出了该县食品公司经理是一个日本特务，并有七条人命血债。福建省莆田县查出一个叛变分子赖金繁，曾将我特委书记等四个同志骗至家中，报告敌人捕去杀害，而对这样一个罪恶严重的反革命分子，却只判了二年管制。在检查肃反工作中，一般的是较多地注意了查错，而较少地注意查漏，这是一种右的偏

向，是应当加以糾正的。

發生上述兩方面缺點錯誤的原因，除了由於在某些司法工作人員中存在着官僚主義、主觀主義的作風，對於情況掌握不夠準確，調查研究工作做得不夠，政策界限交代不夠清楚外，主要的是由於在少數地方和某些單位未能認真正確地貫徹執行群眾肅反的路綫，沒有充分地把群眾發動起來，因而就不能夠徹底地孤立和揭露反革命分子，造成運動的夾生現象，漏掉了一些應當依法懲處的反革命分子。也有少數地方和單位在群眾發動起來之後，未能及時加強對運動的領導，將群眾性的清查、檢舉同專門機關的工作很好地結合起來，以致在鬥爭中發生了一些粗糙現象，搞錯了一些好人。對於這些應當避免和可以避免而沒有完全避免的缺點和錯誤，是應當引為教訓的。但是，另一方面，這些缺點和錯誤的發生也有一定的客觀方面的原因。因為肅反鬥爭是解決敵我矛盾的尖銳的複雜的階級鬥爭，反革命分子又是陰險狡猾的，有些反革命分子在確鑿的罪証面前仍拒不坦白，因而激起了群眾的義憤，發生了一些過火的現象。

此外，在檢查中還發現了某些案件的處理上有拖延和積壓的現象，影響了對犯罪分子的及時追究和懲罰，其中有個別被錯捕的也未能及時發現和糾正。在肅反鬥爭的緊張時期，個別地方也發生了某些不注意遵守法律程序的缺點和錯誤。

以上所說的缺點和錯誤，是在肅反運動中所發生的一些個別的、局部的現象，它和肅反鬥爭的偉大成績比較起來，雖然是很次要的，但都是必須認真糾正的。對於這些缺點和錯誤，我們本着“有錯必糾”的方針，凡是一經發現，就嚴

肅認真地進行糾正。有的在後來的檢查中，陸續地作了糾正和處理，或者正在糾正和處理。我們的處理原則是：凡是被錯鬥、錯捕、錯判的好人，原來在什麼範圍內弄錯的，就在什麼範圍內宣布平反、恢復名譽，並進行妥善安置。對於那些曾經加入過反革命組織，同反革命組織有過關係，同反革命分子有過政治關係或者平素有反革命言論的人，經過審查也給他們作出公正的結論。應當指出，在運動中對這些人進行清查或者鬥爭，都是有一定的根據的。另一方面，對於漏掉了的反革命分子，則仍必須繼續追查究辦；重罪輕判的和輕罪重判的，依照法律程序予以改判。

在檢查肅反工作中，注意了防止和克服對缺點錯誤認識不足和誇大缺點錯誤這兩種片面性的態度，堅持從團結和教員幹部出發的精神，啟發幹部自覺地檢查和認識工作中的缺點錯誤，而不對幹部和積極分子潑冷水。因而這次檢查工作是進行得健康的，既糾正了缺點錯誤，又保護了幹部和羣眾的積極性，並且提高了幹部的政策水平和法制觀念，改進了工作制度和作風。但並不是說，經過這次檢查所有問題都已經解決了，肅反鬥爭中的錯、漏案件以及其他的缺點和錯誤，還可能有未被發現的，或者雖然已經發現糾正，但處理得還不夠好的，因此今後繼續深入進行檢查仍是必要的。

三、關於懲治其他刑事犯罪分子的鬥爭

由於我們國家實行了一系列的社會改革的結果，由於國家為全體人民實行統籌安排的政策，由於人民羣眾的政治覺悟和道德水平的提高，加以結合着歷次的肅反鬥爭打擊了

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刑事惯犯，社会上的刑事案件已經逐漸下降，一九五六年刑事案件下降的情况更为显著。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慣偷、慣盜、流氓等刑事惯犯还未完全肃清，由于资产階級墮落腐化思想的影响，同时，由于我們在過去这一时期中对刑事犯罪分子有打击不力的右的偏向，因而目前的刑事犯罪案件还有一定的数量，而且在某些地方某些时候仍然是比較严重的。目前刑事案件数量較大的是盜窃案件，其中有很多是屬於輕微的盜窃案件，重大盜窃案件只是少数，但它的危害是严重的。在某些大中城市中尤其是某些新建和扩建的城市中，有少数未受到惩处和經過处理仍不悔改的流氓分子不事生产，为非作歹，招搖撞騙，污辱奸淫妇女，并唆使、引誘少年兒童犯罪，扰乱社会秩序，引起了群众的憤懣。在資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完成以后，不法資本家經濟犯罪案件大大減少了，但是仍有少数不法私方人員利用各种机会和合营企业管理制度上一时尚不完备的空隙，进行盜窃企业财产的活动；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在国家开放了一部分自由市場以后，少数不法資本家投机倒把的活动又有所滋长。如青島市在一九五六年发生不法資本家經濟犯罪案件四十件，其中在第四季度发生的就有十七件，一九五七年第一季度又发生了三十三件。此外，由于某些工作人員沾染了资产階級的享乐腐化思想，由于企业和合作社組織中还存在着某些組織不純的現象，因而在企业和合作社中的貪污現象也时有发生，但其中比較大的貪污案件是极少数的，大多数还是屬於輕微的貪污行为。

根据上述情况，各級人民檢察院除对殘余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外，还协同有关部門加强了同其他各种刑事犯罪活动

的斗争，依法惩治了盗窃、诈骗、强奸、凶杀等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例如，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从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第一季度批准逮捕的各种刑事犯罪分子中，盗窃犯占百分之五十九点六九，强奸犯占百分之九点四七，诈骗犯占百分之八点零七，凶杀、纵火、放毒犯占百分之三点三九，其他刑事犯占百分之十九点三八。同时，各级人民检察院进行了对职务犯罪案件，经济犯罪案件和侵犯人权犯罪案件的侦查工作。根据一九五六年的不完全统计，检察机关侦查的刑事案件中贪污公共财产的案件占百分之四十一，妨害社会经济秩序的案件占百分之十点八，侵犯人身权利的案件占百分之三十七点六，其他案件占百分之十点六。

司法机关惩治刑事犯罪的斗争，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于巩固社会治安，保护国家和公共财产，保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起了积极的作用。例如，包头市由于基本建设的迅速发展，在城市中混入了一些敌对阶级分子和流氓分子，因而该市的刑事犯罪活动曾经一度比较严重。有些流氓分子甚至在白天就闯进职工宿舍强奸职工家属，引起一些工人极大不满。该市在一九五七年一月惩治了一批刑事犯罪分子，并广泛地进行了遵守法律和共产主义道德的宣传教育后，二月份发生的刑事案件较一月降低了百分之四十二，社会秩序大为改善，广大群众表示满意，群众防范犯罪的积极性和共产主义道德风气，普遍有所提高。福建省晋江县人民检察院侦查处理了该县池店乡光明高级农业合作社出纳李文宜贪污社款三百余元一案。在处理该案之前，社员生产情绪低落，有四十五户社员闹退社，社员不愿向合作社投资；处理了这个案件之后，社员生产情绪提高了，把合作社当作大家庭，在十

六天中社員向社投資四千八百元，原来開退社的社員不退了，出工率也显著提高。湖南省各地人民檢察院在一九五七年一、二两个月內，經偵查屬實逮捕了投机倒把破坏經濟秩序的犯罪分子五十九人。其中长沙市不法資本家徐兆魁、肖桂福一貫不服从国家市場管理，一九五六年九月自由市場开放以后，該二犯又糾合其他不法分子八人跨行跨业进行黑市投机买卖，乘国家統一掌握的建筑材料鉄釘、鉛絲供应緊張之际，分赴該省的醴陵、衡阳、益阳和广西省的桂林、全县，及江西省的萍乡、宜春等二十三个县、市，冒充合作社和国营基建单位的工作人員大量套購鉄釘、鉛絲等物，严重地破坏了市場管理。这个案件經過檢察机关起訴和法院公开审判后，不少有違法行为的商人向政府坦白了自己的違法行为，长沙市工商局进一步加强了对市場的管理，建立了市場管理委员会，并对各个行业进行了全面的檢查。

各級檢察机关在惩治刑事犯罪分子的斗争中，貫徹执行了懲罰与教育相結合的方針。对于盜窃、流氓犯罪活动，着重打击那些作恶多端的慣偷、慣盜，恶习甚深的流氓犯罪分子，以及教唆和組織犯罪活动的分子；对于情节輕微、危害不大的犯罪行为，主要是由治安部門給以适当的行政處罰，或者給以批評教育，以达到教育改造的目的。对于少数因沾染了不良习气而犯了某些罪行的青少年，除了某些犯罪情节严重的以外，主要是通过家庭和學校加以管教，一般地不采取司法懲罰的方法去处理。对于企业，尤其是农业合作社中的貪污現象，着重是处理那些貪污数量較大、情节恶劣的分子，对于偶尔的小量貪污行为，主要是由本单位、本部門进行批評教育，責令檢討，退出脏款，并根据情况給以必要的

紀律處分。在處理經濟犯罪案件中，著重是懲處那些投機倒把、大量套購物資、擾亂市場的不法分子，對於小商小販和某些落後農民的一般商業投機行為，也主要是由有關部門通過說服教育和加強市場管理的方法加以解決。事實證明，採取這樣的處理方針是正確的。

但是，由於有些地方對於刑事慣犯鬥爭不力，處分過輕，以致未能在勞改期間真正加以改造，因此在刑事慣犯的犯罪案件中，經過懲罰後又重新犯罪的刑事慣犯占了不少的數目。例如，北京、天津兩市在一九五六年一月至十一月捕獲的一百五十五名刑事慣犯中，釋放後又重新犯罪的一百二十七名，占百分之八十二。上海市一九五六年第三季度捕獲的七十二名刑事慣犯中，有三十四名是刑滿釋放後重新犯罪的慣犯。由此可見，對於慣竊慣盜犯、詐騙犯等各種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犯罪分子，必須給予嚴厲的懲處，實行較長期的勞動改造，否則，就不能達到徹底改造和逐步肅清這些犯罪分子的目標。

四、檢察機關的業務有了很大的 改進和發展

隨著各級檢察機構的逐步普遍建立，到一九五六年，各級人民檢察院已經全部擔負起審查批准逮捕人犯工作和審查起訴工作。在審查批捕和審查起訴工作中，一般的都做到了逐案地認真審查核對材料，鑒別證據，有的還進行了實地調查，然後依照法律政策，分別作出是否批准逮捕的決定。審查批准逮捕和審查起訴工作的質量較前有所提高。在審判監

督工作方面，各級人民檢察院對於向法院提起公訴的案件出庭支持公訴的工作，比過去有了進展，但是整個說來，這一工作還遠遠落后於實際的需要。在過去，由於大部分地區的檢察機構尚不健全，只能選擇一些有教育意義或案情重大的案件派員出庭支持公訴，還有相當多的案件沒有派員出庭。一九五六年以來，隨著檢察機構的加強，我們已有計劃地加強了出庭支持公訴的工作。目前不少地區（如北京、天津、上海、安徽、湖南等）出庭的案件數已達到交付審判案件數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並且有不少縣、市已做到全部出庭。各地人民檢察院在一九五六年通過審查人民法院所作的判決和處理不服法院判決的申訴，發現法院判決不當的案件，按照上訴程序和監督程序提出抗議的共有二千七百件，在法院已處理的一千四百件中，決定改判或撤銷原判發還更審的一千一百五十九件。在監督刑事判決的執行方面，除對於死刑案件的執行，一般都已派員親臨刑場進行監督外，不少地方還檢查了緩期執行、管制、假釋等案件的執行情況，並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同時，對於檢察院不批准逮捕和決定不起訴有錯誤的案件，有不少經過公安機關提出意見和控告後得到了糾正。如湖南省人民檢察院在一九五七年一至四月審查下級公安機關控告檢察院不批准逮捕決定有錯誤的案件六十三件，其中有二十一件撤銷了不批准逮捕的錯誤決定。一九五六年，法院在審理檢察機關起訴的案件中，有百分之七點七二的案件認為起訴不當，裁定不交付審判。這樣就發揮了相互制約和法定的監督作用，提高了辦案的質量。

在監所勞改監督工作方面，各級人民檢察院結合對肅反工作的檢查，協同有關部門對全國各地監所、勞改機關進行

了普遍檢查，有的地方已經建立了定期檢查的制度。檢查的結果證明，各級監所勞改機關基本上貫徹執行了“懲罰管制與思想改造相結合，勞動生產與政治教育相結合”的方針，在各種困難情況下，進行了繁重的工作，在改造罪犯成為新人和組織犯人進行勞動生產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由於有些監所、勞改單位對於國家關於獄政和勞改工作的方針政策缺乏完整的了解，曾一度發生偏重於勞動生產、忽視對犯人進行教育改造的偏向。少數勞改單位還曾發生過打罵犯人、壓制犯人申訴和逾期不放等違法現象。針對上述缺點和錯誤，在檢查工作中，着重解決以下幾方面的問題：首先嚴格糾正了在管理犯人上的違法措施和非人道待遇現象，改善了管理制度，改善了犯人的生活條件和勞動條件，加強對犯人的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增加了醫療設備，改進了環境衛生。其次，審查處理了犯人申訴的案件，平反了一些錯案，並糾正了一些不應釋放而釋放犯人的現象。有些地方並協同監所、勞改管理機關研究改進了處理犯人不服判決的申訴工作，防止積壓犯人申訴的現象。再次，會同公安機關和法院對於一些改造較好或已失去活動能力的老、弱、病、殘犯，採取提前釋放和保外執行的方法進行了清理。據吉林、廣東、甘肅、上海等四個省、市的統計，清理了一萬零二百零一名犯人，其中提前釋放八百九十七名，保釋一百九十七名，假釋一千八百六十名，保外就醫四千零二十七名，保外執行三千二百二十名。同時在檢查中，也發現和處理了一些在押犯人重新犯罪的案件，懲治了在押犯人的不法活動。

在經過普遍地深入地檢查監所、勞改工作之後，推動監所勞改部門進一步加強了對犯人的政治教育和貫徹執行了懲

罰管制与革命人道主义相結合的原則，在改造犯人和組織犯人生产上都收到了更好的效果，監所、劳改的工作有了显著的进步。例如云南省潯益县看守所經過檢查并改善了管理制度后，有十三名犯人坦白了过去沒有講过的罪行，經查証有十二名犯人的坦白屬实。天津市瑪鋼劳改工厂的犯人，在該市召开了犯人积极分子代表會議后，积极提出合理化建議，可以采納的有五十五件，为国家節約了不少資金。这种事例是很多的。但是在檢查后，在有些地方又发生了片面地理解人道主义待遇，放松对犯人的管理，不适当地提高犯人生活的另一种偏向，并且在有些地方釋放了一些不應該釋放的犯人，他們在釋放后仍然为非作歹，危害社会治安。这些現象虽然已經作了糾正，但却是值得今后繼續注意的。

此外，各級人民檢察院在一般法律監督和处理人民申訴方面都做了不少的工作。

上述檢察工作的情况表明，各級檢察机关的业务已經基本上建立起来，已經能够基本上担負起国家赋予它的职能了。同时还表明，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司法各部門之間分工負責，互相制約的制度已經建立起来了，司法干部遵守革命法制依法办事的作风加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不仅在革命實踐中起了巩固专政和保护人民民主的巨大作用，而且从實踐中証明了它較之任何資本主义国家的法制具有無比的优越性。

五、最高人民檢察院在中共中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會的领导下，在有关部門的配合下，于一九五六年全部完成了对在押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偵查起訴和免于起訴的工作。根据偵查的結果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會“关于

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決定”，对一千零六十二名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分别作出了起訴和免于起訴的決定，其中起訴审判的四十五名，決定免于起訴而寬大釋放的-一千零十七名。

对于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的偵查工作，是做得比較充分和細致的，取得了确凿的罪証。同时，对在押战争犯罪分子进行了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教育，实施了革命人道主义待遇。在偵查结束后，还組織他們到我国大中城市参观我国社会主义建設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成就。在确凿的証据面前和人道主义待遇的感化之下，所有在押战争犯罪分子都供認了自己的罪行，被判刑的战争犯罪分子在法庭审判中和判决后都表示了悔罪，愿意在服刑期間努力改造自己，重新做人，被寬大釋放的战争犯罪分子紛紛表示了反对侵略战争、爭取和平的愿望和决心。在回到日本后，他們中間許多人积极参加了和平运动，通过各种集会和报刊揭发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忏悔自己的罪惡，感謝我国人民的人道待遇和寬大处理，称贊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偉大成就。住在东京的从我国釋放回日本的战争犯罪分子曾經参加了禁止原子彈、氫彈的世界大会，并以“战犯小組”的名义向大会发出了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和氫武器的电报，受到大会的热烈欢迎。我們也收到了許多战争犯罪分子和战争犯罪分子家屬的来信，在信中表示感謝我国的人道主义待遇和寬大处理。以上这些情况充分說明，我国处理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的 policy 是完全正确的。

一年多来，檢察工作能够取得上述的成績，是由于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的正确領导，由于有关部

門的配合和群眾的支持。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政協委員在視察工作中給予我們許多有益的批評和幫助，推動了各地檢察工作的改進。但是，在我們的工作中，還存在着不少的缺點和錯誤，這主要是由於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各級人民檢察院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作風。

現在。國內大規模的群眾性的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人民內部矛盾開始上升到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地位，但是階級鬥爭並未完全結束，同反革命分子的鬥爭，同一切反抗社會主義改造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的鬥爭，同各種違法犯罪分子的鬥爭，仍然是一個長期的任務。因此，今後各級檢察機關必須繼續貫徹“有反必肅”的方針和鎮壓同寬大相結合的政策，徹底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並且更有成效地改造一切可能改造的反革命分子，進一步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實行懲罰與教育相結合的方針，加強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作鬥爭，懲治侵犯國家和人民的財產、破壞社會秩序的犯罪分子，保護國家財產和公共財產，保護人民的利益，安定社會秩序。同時，加強與一切違反國家法制的行為作鬥爭，支持人民群眾對於侵犯人民權利的違法行為的檢舉和申訴，保護公民的權利和合法利益，提高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

為了更好地完成檢察機關的任務，我們已在檢察機關內部開展整風運動，學習毛澤東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指示，檢查和克服存在於人民檢察機關工作中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作風，學會正確地區別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學會正確地運用法律調節人民內

部的矛盾。批判和克服檢察业务建設中的教条主义思想和旧法观点，总结几年来檢察工作的經驗，健全我国的檢察制度。

毛主席在今年二月二十七日召开的最高国务會議扩大會議上指示，在中央由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主持，在地方由省、市人民委员会和政协委员会主持，对肃反工作进行一次全面檢查，总结經驗，发揚正气，打击歪风。我們热烈地拥护这一指示，并且已經責成各級檢察机关本着“有反必肃、有錯必糾”的精神，对这次檢查工作采取积极負責的态度，完成这一重要任务。

各位代表，人民檢察机关的工作中是有缺点和錯誤的，而且这些缺点和錯誤又往往是与最高人民檢察院領導上的缺点有关的。因此，我們誠懇地希望各位代表从各方面批評我們的工作，監督我們的工作，以便我們更好地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正确领导下，在人民群众的監督下，做好檢察工作，完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付托給我們的任务。

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董必武

各位代表：

最近发表的毛澤东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的講演，是一个具有偉大历史意义的丰富馬克思列宁

主义的光輝文献。它确切地反映了我国当前的政治生活中一系列根本性的問題，并且清楚地指出了我国六亿人民在建設社会主义社会中如何加强国家各項工作的基本方向。我們国家机关正在根据这一偉大指示的精神来檢查和改进我們的工作。

現在我向大会作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报告。

关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今春我曾把一九五六年的工作情况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作过报告，这个报告已作为大会文件发給各位代表，我不再重复。这里我着重把最高人民法院一九五七年一月至五月的工作和当前全国审判工作方面的情况向大会报告。

(一)

最高人民法院从今年一月至五月底，共受理上訴、复核等案件三百三十四件，其中刑事案件三百一十七件（反革命案件一百零六件，普通刑事案件二百一十一件），民事案件十七件。这期间共結案三百二十三件，其中刑事案件三百零六件，民事案件十七件。从本院受理案件的情况来看，今年一月至五月比去年同时期稍有增加，但反革命案件期已显著减少。

就全国情况来说，一九五六年全国各級人民法院受理第一审刑事、民事案件的总数比一九五五年下降約三分之一，其中显著下降的是刑事案件，反革命案件下降达百分之四十以上。一九五七年第一季度比一九五六年第一季度，民事案件略有上升，而刑事案件仍有下降。这說明，在社会的大变动中，刑事犯罪和民事糾紛案件的情况，已有显著的变化。

犯罪的現象，在我們國家里，所以表現了減少的趨勢，其原因主要是由於國家勝利地實現了生產資料私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建設獲得巨大的發展，使我國的社會生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人民群眾生活日益改善和政治覺悟日益增強；同時，這也是歷年來對反革命和其他犯罪作鬥爭取得重大成就的結果。

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級人民法院除處理刑事、民事案件外，還受理大量的不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的申訴。就最高人民法院來說，從今年一月至五月底，即受理了來信申訴六千零六十六件，來訪申訴一千二百八十四人次。一九五七年頭五個月的申訴比去年一年的還多。這是最高人民法院的一項極為繁重的工作。申訴所以這樣多，主要原因還不是由於法院辦案質量不高，而是由於申訴與上訴不同，當事人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訴的案件，既沒有時間上的限制，也沒有審級上的限制。從本院今年辦結的部分申訴來看，原判正確、申訴沒有理由的占絕大多數；原判不恰當、申訴有理由的，只是很少數。申訴中還有一種情況，是有些申訴人對合理的判決，再三再四地纏訟不休，這不僅與判決的要求穩定性不合，而且妨礙生產。所以目前申訴雖多，不能說這是完全正常的現象。現在有些人對申訴不加分析，認為所有申訴都是合理的，指責法院辦案“一團糟”，這是根本不合事實的；至於那種利用申訴製造是非，甚至不惜為真正的反革命分子“申冤”的人，當然是別有用意的。最高人民法院對申訴是重視的，認真處理申訴，是對各級法院實行審判監督的一個重要方法。對於申訴的處理，必須遵照“有錯必糾”的原則，既要嚴肅處理申訴人的合理申訴，

同时也須照顧已經发生法律效力的一切正确的判決和裁定的稳定性，制止那种無理取鬧的行为。

(二)

刑事案件的下降，标志着我国犯罪現象的減少，特别是标志着我国国内大規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經基本結束，反革命势力已經基本上肅清。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結論，反革命殘余和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很快就会完全趨于消灭。如果有这样想法，那是很危險的。同一切犯罪現象作斗争，繼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仍是我們人民法院的头等重要任务。

目前关于反革命分子的情况，正如毛澤东主席指出的：“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我們知道，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仍将相当长期存在。一方面，帝国主义和蔣介石集团目前仍在不断派遣特务、間諜进入大陆，进行破坏活动和顛复活动，并且企图利用我們人民内部的某些矛盾来制造騷乱。另一方面，国内少数殘余反革命分子、少数漏网的反动会道門头子和其他反动分子还没有死心，他們仍在利用各种机会进行造謠、凶杀，甚至組織暴乱。同时，在原来的剝削阶级分子中，也还有人伺机进行破坏社会主义建設的活动。我們各級人民法院，对此如果有任何放松警惕，麻痹大意，那将是政治上的严重錯誤！

关于那些偷盜、詐騙、奸淫妇女和流氓集团等犯罪活动，就目前情况來說，在不少城市，特別是一些新建、扩建的工业城市，仍然比較严重。这些犯罪分子中，有些是还没有完全肅清的恶习甚深的旧社会渣滓；还有许多是受剝削阶

級思想严重影响的腐化堕落分子。他們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妨害社会主义建設，人民群众对他們非常憤恨，必須予以有效的制裁。最高人民法院会同司法部于今年五月发出了“关于城市中当前几类刑事案件审判工作的指示”，責成有关法院依据懲办与教育相結合的方針，对上述犯罪分子給以法律制裁，繼續同这类犯罪作严肃的斗争。

目前在农村中，搶劫、盜窃、奸淫妇女、杀人、放火等犯罪現象，有的地方亦时有发生，严重危害着农村社会治安和群众利益。对于这些犯罪行为，各級人民法院必須予以严肃的法律制裁。目前农村中较为普遍存在的，是贪污、偷窃、打架、哄鬧以及侵犯人权等現象，但是，其中除少数是屬于犯罪行为外，絕大多数是情节輕微而不能作为犯罪来看待的。我們必須認識，目前存在着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間的矛盾以及其他矛盾；特别是由于目前农业生产合作社一般是新建的，还不很巩固，社的财务制度和經營管理方面还有不少缺点，而有些农民的落后自私观念也还相当严重存在，所以在合作社内部也存在着不少矛盾。許多問題，主要即是由于这些矛盾的存在而发生，并且一般是屬于人民内部的是非問題和錯誤、缺点的改正問題。因此，对于这些問題的处理，必須采取慎重态度，分別不同情况，除对那些真正构成犯罪行为的，必須予以法律制裁外，一般應該是采取說服教育的办法加以克服，而不應該片面地強調懲罰的办法，即实行懲办主义。

在今年春季一个短时期內，曾有些法院把人民内部問題当作敌我問題来处理，或者在人民内部問題上，又誤用懲罰办法来处理有些不构成犯罪的事件。例如，有的对带头要求

合作社清算帳目而引起的群众哄鬧，認為“聚众騷亂，破坏农业合作社”而論罪科刑；有的把說牢騷話、要求退社的行为，同破坏行为混为一談；有的对一些輕微毆打吵鬧和一般群众性的迷信等行为，以简单的逮捕懲罰的手段来代替应有的艰苦的說服教育工作。这种作法，常常容易造成脱离群众和扩大人民内部矛盾的后果。上述情况，經发现后，我們已喚起各地人民法院注意和糾正。另一方面，也有些法院对情节严重的犯罪分子，甚至对應該法办的反革命分子，也片面強調教育，而不追究法律責任。这种现象，自然也是应当糾正的。

(三)

由于我国的社会面貌已經有了巨大的改变，因此，在我們人民法院所审理的許多民事案件的性質內容上，也同上述許多刑事案件一样，发生了新的变化。拿民事案件中占多数的婚姻关系的案件來說，如果說过去主要的是屬於反抗封建性的婚姻关系問題，那末現在除了还有大量的束縛男女婚姻自由的問題外，同时，草率結婚輕率离婚的婚姻关系問題，在不少地区已逐漸有所增多。在家庭关系問題上，目前在农村中，由于以土地为基础的扶养关系变为以劳动为基础的扶养关系，因而不扶养老人的家庭糾紛也較前增多。再拿一般财产关系的案件來說，如果說过去很多是屬於私与私和有些公与私的問題，那末現在由于生产关系的变革，屬於公与私和公与公的問題已在增加，而私与私的問題，实际上又有不少是涉及公与私的問題的。在农村中，土地所有权的糾紛已有很大減少，但在合作化以前的土地买卖、出典、抵押、租賃

等，由于土地归集体所有而发生的糾紛还不少，其中比較多的是宅地、自留地、伙道等糾紛；合作化以前农民买进生产工具的买价以及农民向銀行、信用社所借的貸款，由于入社后而引起的清償糾紛，也都不少。这些糾紛所要解决的問題，实际上許多不簡單是私与私的問題，而是涉及社与社員，或者社与国家的問題。这类問題，在城市中亦是存在的。至于目前城市、农村中的一般合同糾紛，那就更多的是属于公与公的問題。

显然，民事糾紛是人民內部的是非問題，而这些是非問題在法律上就是权利、义务問題。人民法院对这些糾紛的处理，就是要公平合理地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并且用一定的强制手段来保护合法的权利和履行应尽的义务。由于私有制度的逐漸消亡，社会新道德新风气的树立和发展，以及人民群众政治觉悟的日益提高，絕大多数的民事糾紛，甚至引起斗毆伤害而涉及刑事范围的一些糾紛，例如村与村、社与社发生的爭夺湖草、柴山、荒地等打鬧事件，都不是不可調和的矛盾。因此人民法院对民事糾紛案件，应当从加强团结、有利生产的目的出发，遵照政策法律的規定，对可以調解解决的案件，尽可能采取調解的办法来解决；只有对那些必須經過訴訟和审判来解决的，才依法判決。

由此可見，各地基层政权早經設置的人民調解委员会（有的称为人民調处委员会），是处理人民內部一般糾紛的良好組織形式，它既可以及时地調处很多民事糾紛，減少群众的訟累，加强干部同群众的联系，也可以促进群众相互間的团结。目前，某些地方認为农业合作化以后，人民調解委员会可有可無了，这是完全不对的。加强这一組織和工作

的領導，并吸收当地一些富有社会經驗的公正的有威望的人参加，都是很必須的。

(四)

各位代表：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屆第三次會議以來，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和各專門法院审判了百万以上的案件，通过这样大量案件的审判，实现了国家付予它的对敌人实行专政和調整人民内部矛盾的职能，这对維護社会秩序，保护公民的权利和合法利益，保护、发展社会生产力，保卫我們社会主义制度的繼續建立和巩固等方面，都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这些成績的取得，是由于党和各級人民代表大会的正确领导和监督，同时也与全体司法工作人員的勤勞努力和思想政治水平、业务能力的不断提高分不开的。

但是，必須指出，我們的工作中还有不少缺点和錯誤，这主要表现在，对刑事案件的处理，有些法院由于对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划分不清，对某些犯罪行为 and 一般的是非問題划分不清，因而錯判案件和用压服方法的情况，还时有发生；同时，对于有些應該法办的犯罪分子，錯誤地以为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不給予惩办的右的傾向，也是存在着的。对民事案件的处理，不少地方也有处理不当的現象。至于办案的粗枝大叶和拖拉不及时的作风，在有些法院和有些审判人員中間，也还没有清除。这些缺点和錯誤，都是必須彻底糾正的。

自中共中央号召黨員整風后，最高人民法院的中共黨員即开始整風的学习。在这期間，本院的非黨同事和院外关心我們司法工作的朋友們，对我党領導的司法工作提出了不少

的意見。這些意見中，正確的部分，有些我們立即採納，已經改進或正在改進我們的工作；有些因牽涉面廣，正在考慮採納後如何實行。意見中也有我們認為不正確的部分，擬再加討論。現在有些右派分子，骨子裡不贊成社會主義，不贊成人民民主專政，不贊成共產黨領導，他們在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幌子下，實際是向党進攻。他們反對肅反，惡意攻擊肅反的方法不好，不承認肅反的成績。他們這種荒謬的論調，周恩來總理在他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已經給予了明確的批駁，我不再多說了。這裡，我要指出，現在有些右派分子，對於我們過去進行的司法改革也是反對的。他們認為司法改革是對舊司法人員“一棍子打死”的辦法，而且認為現在司法工作搞得不好，就是由於過去錯誤地搞了司法改革，因此他們現在要“招魂”，就是要把那些過去的舊司法人員的“魂”招回來，讓他們“上台”。人所共知，司法改革的成績是巨大的，它是我們建國初期，從政治上、組織上和思想上純潔各級司法機關的重大措施。應當說，正由於過去進行了司法改革，我們的人民司法建設和司法工作，才能取得現在的重大成就。可以設想，沒有那樣一次司法改革，我們的司法工作要想使它符合於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需要是不可能的。與此同時，有人批評我們，審判員不應該都用黨員，他們這樣說是有意歪曲事實，為右派分子所謂“黨天下”和“清一色”的理論找根據；也還有人故意標榜過去舊司法人員的所謂業務能力，而批評我們審判員不懂業務，他們否定我們審判人員在工作與學習中不斷提高自己業務水平的事實。總之，這些論調，是與反對黨的領導和所謂“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的等等錯誤言論起共鳴的，我們必須

予以彻底的駁斥。

因此，認真学习毛澤东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的講演，認真开展整风运动和在政治上、思想上反右派的斗争，是当前各級人民法院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只有切实遵照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的講演的精神，通过整风运动，大力糾正缺点、錯誤，同时彻底駁斥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論，才能进一步改进法院工作，使它更加适应今后社会主义建設蓬勃发展的需要。

各位代表：在去年第一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會議上，部分代表提出的有关法院工作的两个提案，和根据視察結果提出的意見，我們都已分別研究办理。这对改进法院工作給予了很大的帮助。今年各位代表还要繼續視察，希望对法院工作更多提出批評，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将表示热烈的欢迎。

全体司法干部团結在党的周圍 彻底打垮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史良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李先念、薄一波副总理和張鼎丞檢察长、董必武院长、彭真副委員长的报告。現在我想就司法工作講一点意見。

去年以来，人民司法工作在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下，依靠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全体司法干部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

成績。全國各地人民法院，認真地按照人民法院組織法的規定，審理了大量的刑、民事案件，正確地發揮了對敵人實行專政和調處人民內部糾紛的職能。同時，在審判活動中更進一步貫徹了國家的法制。據不完全統計，現在全國已選出人民陪審員二十四萬六千多人；遼寧、浙江、安徽、福建等省各級人民法院，已經有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九十的案件，依法實行了人民陪審員制度。各級人民法院依法實行公開審理的案件，已占全部案件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其餘是依法不應實行公開審理的。除了認真保護被告人的辯護權外，我們積極地建設了人民律師制度，以進一步維護訴訟當事人的權利和合法利益。到今年六月底為止，在高級和中級人民法院所在地、人口在三十萬以上的市和少數農村地區的縣城，均已建立了律師組織，現全國已有律師協會籌委會十九個，法律顧問處八百二十處，律師和工作人員二千五百二十八人。律師工作深受群眾歡迎，凡是工作開展得好的地方，法律顧問處接待當事人都是應接不暇的。為了培養後備司法幹部，除了高教部領導的設在綜合大學內的六個法律系外，司法部還管理有四個政法學院，並在上海、濟南、重慶三地建立了三所法律學校；現正加強師資的力量，提高教學質量，以適應培養司法幹部的需要。此外，人民法院和律師組織，還運用自己的全部活動，廣泛地向群眾進行了法律宣傳。僅據江蘇等四個省區的一百五十一個單位統計，去年一年，光法律講演就作了二千四百七十四次，聽眾達百萬人以上。這就大大有助於提高幹部和群眾的守法觀念，有助於解決人民內部的糾紛和促進群眾之間的團結。這一工作今後必須加強。應當指出，我們的工作雖然有很大成績，但是也還存在不少缺點和

錯誤，例如：办案質量还不够高，办案也有不及时的現象，有的地方执行各項审判制度还不够認真，司法干部的質量还不能完全滿足当前实际工作的要需，律师工作的組織与业务建設还需进一步加强等等。我們热忱地欢迎各方面的批評，我們坚信，通过这次整风运动，司法工作中所存在的缺点将得到很大的克服。

但是，正当我們根据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偉大指示，进一步檢查和改进工作的时候，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章伯鈞、罗隆基、章乃器、黃紹竑、龙云、陈銘樞等借口帮助共产党整风，从四面八方我們猖狂进攻，其中罗隆基、黃紹竑、譚惕吾、王造时、楊兆龙、楊玉清等人向党領導下的人民司法工作开展了恶毒的攻击。他們首先集中攻击了我們的肃反工作，說“肃反搞糟了”，“搞錯了”，他們到处叫嚷，鼓励反革命分子“翻案”、“叫冤”。黃紹竑对于司法工作表现了異常的“关心”，一直装着人民民主法制維護者的样子，其实他感觉兴趣的并不是怎样帮助我們改进工作，他是利用視察工作的机会，搜集个别的“錯案”材料，到处替反革命分子“鳴冤”。这位儼然以反革命分子的“包龙图”自居和反革命分子眼中的“英雄”，不仅在去年的人大和今年的政协会議上，替反革命分子說話，而且他还利用自己的合法地位，公开为反革命分子开脫罪責，干出違法的勾当。最近报纸上揭发的他庇护反革命分子謝昕等事例，就是最好的說明。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們开脫反革命分子的目的，罗隆基就提出要成立一个自成系統的“平反委员会”。这就是說，他們企图超越国家法定的人民司法机关并摆脱党的領導，把那些罪惡深重已被逮捕、判刑的反革命分子，大

批放掉。这是一个多么毒辣的阴谋啊！大家都知道，肃反运动是完全必要的，试问，如果不搞肃反运动，我们今天能够过这样平静的日子，能够安安稳稳地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吗？每一个正直的人，都会作出正确的答复。当然肃反运动中也有缺点和错误，即有个别错判的案件，但是成绩是主要的，这是不容否认的铁的事实；而且即令是个别缺点和错误，我们亦丝毫没有放松纠正的工作。各地人民法院对于错案已本着“有错必纠”的方针，严肃认真地进行了或者正在进行纠正和处理。这在周总理和张鼎丞检察长的报告中已经作了明确而具体的说明，我完全同意他们对于肃反运动所作的估价。右派分子为什么对肃反运动的伟大成绩视而不见，却偏偏要夸大肃反运动中的缺点和错误呢？为什么那么热心作反革命分子的代言人呢？原来他们是别有用心。

右派分子说我们是“无法无天”，是“重人治而轻法治”，说我国不及“美国法治认真”，原来他们所要的法治同我们所要的法治不一样，他们要的是美国式的法治。他们又说镇压反革命是“违宪”、“违法”，这是违的什么人的“宪”、什么人的“法”呢？如果说我们是违了国民党反动派之宪、之法，那是事实，而且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永远和彻底地废除了蒋记宪法和整个伪法统，这早在一九四九年的共同纲领第十七条中作了明文规定。如果要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宪、之法，那末，我们是坚定不移地执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坚决镇压了反革命的活动；而象黄绍竑之类这样为反革命分子“鸣冤”和罗隆基所要成立的“平反委员会”，却正是违反了宪法关于坚决惩办反革命分子和审判权统一由人民法院行使的规

定。右派分子反对我們肃清反革命，反对我們发动群众把隐藏在各个角落的反革命分子揭露出来，是完全徒劳的。全国人民和人民的司法机关在党的领导下，对于反革命分子，在任何时候都是必須坚决加以肃清和依法处理的，我們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是坚持“有反必肃”的方針。我劝右派分子睁开眼睛看一看，现在是人民的中国，早已不是你們所向往的反动統治的旧中国了。

右派分子不只是反对镇压反革命，而且从根本上反对人民民主法制。他們說司法改革对旧法官、旧檢察官和其他旧法人員是“一棍子打死”，責备我們对旧法不“繼承”，他們大声疾呼要为旧法“招魂”，要旧法人員“归队”，使旧法复活，旧司法人員上台。他們說我們的审判人員，特别是从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审判人員“不懂法律”、“中文水平低”、“不会写判决”，說旧法人員的工作質量“还是今天司法机关在职干部所不及的”。因此，他們就到处叫嚷要人民的司法干部“下轎”、“下台”。那末要誰“上台”呢？他們是要右派分子“上台”，罗隆基說出了心底話：“我搞司法部还恰当些”。这些右派分子企图篡夺人民司法机关这个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武器的阴谋，不是非常明显的嗎？我严正地警告右派分子，人民民主政权是無数革命先烈用鮮血换来的，我們一定要牢牢地保护它，国家的审判权，一定要紧紧地掌握在人民自己的手里，右派分子要夺取是妄想。事实上，在广大群众的声討下，他們的阴谋是完全破产了。

司法改革的巨大成績是人所共知的，它从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純洁了我們的司法机关，对于人民司法工作的建設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一点，我在本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

第一次會議上曾做過報告。事實證明，如果我們不徹底地廢除舊法統，堅決地批判反動的舊法觀點，並把那些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和不適宜作人民司法工作的舊司法人員，清除和調出人民的司法機關，那末，我們的司法機關，就不可能是真正的人民司法機關，我們的司法工作，就不能合乎人民的要求，合乎今天建設社會主義的要求。當然，舊法人員中有很多是願意改造的，我們批判舊法觀點，也正是為了幫助他們能更好地為祖國社會主義事業服務。我們的司法機關擔負着鎮壓敵人、保護人民、鞏固人民民主專政、保障社會主義建設秩序的嚴肅而又繁重的任務，一切從事司法工作的人員，必須是忠於人民、忠於社會主義的嚴守國家法紀的人。我們現有的司法幹部，絕大多數是好的，他們勤懇、謹慎地為人民服務，他們具有鮮明的階級立場，敵我分明；他們在法庭上對詭計多端的罪犯進行着堅決而機智的鬥爭，對人民的利益則謹慎而仔細地保衛着；他們為了調查弄清案情，往往登山涉水，跑很多路，有時連飯也顧不上吃。雖然他們的工作那樣辛苦，但仍然是熱情飽滿，積極工作。人民司法幹部所有這些優良品質，豈是國民黨反動衙門和一切壓迫人民的反動法院中的法官老爺們所可比擬的嗎？他們中雖然有些人還缺乏足夠的法律科學知識，政策水平還不高，但在幾年來的工作實踐中經過培養和鍛煉，都有了顯著的進步和提高。我們除了舉行了中央和東北、西北、中南政法幹部學校外，各省、市還開辦了幹部輪訓班。幾年來，在職司法幹部經過中央和省一級的业务訓練機構訓練的幹部已達兩萬餘名。同時，我們還組織了在職干部的业务自修，廣大在職干部都學習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國家與法的理論等基本知識。

和各項現行的法律、法令及有關的政策。去年以來，還加強了業務學習，推行了表揚先進工作者和推廣先進工作經驗等制度。所有這些，不正是說明我們的司法幹部在基本上是能夠依法正確地處理案件並正在努力提高嗎？那麼右派分子為什麼要到處造謠咒罵我們這些幹部，說我們“不下台不足以平民憤”呢？試問，我們的司法幹部有什麼“民憤”呢。很清楚，就是因為我們堅決地執行我國人民民主法制，鎮壓了反革命，反對了殘存的舊法觀點和舊衙門作風，因而使右派分子頗為傷心。如果要說是“民憤”的話，那顯然不是人民群眾之“憤”，而是右派分子之“憤”罷了！

右派分子為了要從根本上改變人民司法機關的組織成分，他們還企圖控制和把持政法院系的教職。他們把法學教育的改革和院系調整叫作“宗派主義”、“教條主義”，說教學改革是“把舊法學家一棍子打死了”，甚至有人危言聳聽地說我國法學教育“已經倒退20年”。請問，20年前法學教育是怎樣的呢？當時教的、學的都是些什麼？培養些什麼樣的人才呢？我是在舊的法律學校當過學生的，據我所知，舊的法學教育不僅是為了培養為反動統治階級服務的“人才”，而且有許多學生不上課就可以拿到畢業證書。今天，我們的政法院系，不是為反動統治階級訓練“人才”，而是為人民政權培養政法工作幹部。我們把舊的資產階級的法學教育制度加以改革，對學生提出了嚴肅的要求，開設了許多新的課程，這是中國法學教育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其內容與性質更是與過去根本不相同的。所有這些，難道是“倒退20年”了嗎？右派分子的目的就是要學校的學生去學習資產階級國家的法律、國民黨反動派的法律，而不要學習社會主義

的法律、为人民服务的法律。他們为此还拟定了一套恢复旧法学教育的方案，并且准备了右派分子掌权的名单。他們要在政法院系中“驅逐党棍子”，咒罵老干部是“吃党飯”，說他們不能搞法律教学工作，說“政法学院老干部把旧知識分子看成地主、資本家，采用的是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甚至說教旧法的人好象“奴隶”一样。事实上，党对一切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老法学家是重視的，在政法院系中，現在不但有不少老教授正在開課教書，有的还担負着更多的重要职务，而右派分子竟然抹煞事实，惡意地歪曲党对知識分子的政策，挑撥法学界的党群关系，反对共产党。他們还在政法院系的学生中，造謠点火，說不是党团员不能当审判員，政法院系的毕业生只能当書記員等等。我們就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为例来看吧！这个法院里共有审判員和助理审判員52人，其中党员17人，团员11人，其余24人都是非党团员。这怎么能說政法部門“清一色”呢？我們再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为例，几年来先后分配到該院的政法院系毕业生共10人，現在都担任着审判員的工作。应当說明，書記員的工作，是整个审判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的組成部分，剛从大学毕业的学生当書記員，我認为是必要的，这对于培养他們的实际工作能力，使他們熟悉审判业务，都有好处。現在有些人輕視書記員的工作是錯誤的。政法院系的培养目标，其中有一項就是培养能够担任审判工作的人才的。右派分子竟企图以此来煽动政法院系学生鬧事，乘机篡夺党对政法院系的領導，我們必須坚决地予以反击，不讓青年上他們的当。

由上可見，右派分子的陰謀是要在我国恢复旧法統，夺取人民民主专政的武器，他們反对共产党的領導，反对人民

民主法制，以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这个罪恶的阴谋，现在是无法再掩盖的了，我们必须坚决彻底地加以粉碎！人民的司法工作，必须在共产党领导下，必须进一步地为巩固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而努力。全体司法干部，必须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克服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彻底打垮右派分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同时，我们希望右派分子及早悔悟，不要自绝于人民。

最后，我还要严正而明确的讲，我们一定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一定要共产党的领导！

肃反斗争是一次历史性的伟大胜利

馬卓洲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和各位首长的报告，现在我仅就肃反问题发表一点意见。

最近时期，许多党外朋友，为了帮助共产党的整风，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向党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和有益的批评。但是在这个“大放”“大鸣”的时候，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自以为时机已经到来，于是他们揭下了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假面具，暴露了他们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丑恶面孔，向党展开了猖狂的进攻。他们攻击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党所领导的肃反运动。他们有的讲：“肃反搞糟了”，“肃反不知冤枉了多少好人”，有的讲：“肃反是庸人自扰”，“成绩谈不到，缺点错误是主要的”。

他們制造了这些混淆是非、顛倒黑白的議論之后，捏出了要組織一个什么“平反委员会”。他們的目的是十分清楚的，就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不要人民民主专政。对于这些反动議論，河北省的广大干部职工群众同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和进步知識分子一样表现了极大的憤慨，許多机关工作人員說：“我們不需要这种人看我們的成績，只讓他看看事实就够了”，有的群众說：“这些先生們难道不是在替反革命說話嗎？”肃反运动究竟是搞糟了？还是搞得很好呢？为了駁斥右派分子的謠言，讓我在這裡給大家介紹我們河北省的肃反运动的一些情况。

河北省的肃反运动是从一九五五年七月开始的。现在除少数地区和少数单位尚在繼續清查外，从全省范围来看，肃反运动已經基本結束。就目前已經定案的來說：清查出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坏分子共六千零六十一名。在河北省的机关、企业、学校、团体中清查出六千多名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对于我們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人来说，都是一件大事，都是一个巨大胜利。这个胜利，使革命組織純洁了，人民民主专政更加巩固了，有力地保卫了社会主义建設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順利前进。

回忆发动肃反运动的初期，当时正处在偉大的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前夜，处在誰战胜誰的重要关头，階級斗争是異常尖銳的。那些仇視社会主义、仇視人民的反革命分子，并没有甘心他們的失敗，为了阻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他們千方百计地或明或暗的进行着各种阴谋破坏活动，以厂矿企业、基建、財貿系統发生的破坏事故而論，一九五四年比一九五三年就上升了百分之二十五强；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又比

一九五四年上半年上升了百分之四十。这些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疯狂破坏的反革命分子，不仅有一般历史罪恶的反革命分子，而且有人民群众称之为“活剥皮”、“活阎王”等罪恶昭彰、血债累累的杀人罪魁；不仅有隐蔽较深、活动巧妙的派遣进来和潜伏下来的特务间谍分子，还有在我们机关、企业、学校等系统内部发展组织进行反共反人民活动的反革命小集团。这里可以顺便举出如下几个例子来加以说明：如河北省农业厅清查出来的国民党军统特务田铁平，一九四五年打入了我通化专署司法科后，即曾积极搜集我方情报，并于一九四六年二月三日，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策划和指使下制造了通化暴动事件，伤亡干部群众近百名，暴动被我平息后，田还将我俘虏的暴徒和敌我伤亡情况向其上级特务机关作了报告。直到肃反运动中，这个凶恶的反革命分子，还隐藏着手枪五支。丰满县从中学教员中清查出一个反革命分子关任千，日伪时期曾当过警察局的股长、科长，日本投降后，又在东北籠絡頑伪人员成立合江省府特派专员本部，任副专员，指挥其部下刺杀了我佳木斯市市长孙西林和公安局副局长高英杰同志，这一个长期追捕未获的反革命杀人犯，也是在肃反运动中清查出来的。

唐山启新水泥厂有一个暗藏反革命分子馮汝賢，在解放前夕接受了中统特务组织的潜伏任务，埋伏在工厂里以组织护厂队建立通讯小组为名，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一九五五年春天，正当社会主义建设进入高潮之际，他积极制造破坏了风车轴的破坏事故，又同潜藏在该厂的另一反革命分子馮德忠策划、指示他们的伙伴偷出了本厂“八代斯”烈性毒药，阴谋撒在饭菜中，毒害车间支部书记常庆兴等人，由于

被及时发觉，破坏了他們的阴谋，我們的支部書記才免遭反革命的毒手。

在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剝削階級中少数抵抗改造的分子，由于固有的階級本性，对社会主义制度极端不滿，終於发展成为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新生长的这些反革命值得我們严重注意。承德市小学教員于錫麟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他是被斗地主和反革命分子的子弟，从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四日至六月二十一日即先后发出恫吓信四封：他写給承德市委書記的信中說：“听了你在承德市作的关于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报告，使我对你更加憤恨……我告訴你，你再痛罵胡风組織，恐怕你有危險……，我們要为先烈复仇，消灭共产党，打到北京去”，从这几句話里可以看出剝削階級不甘心自己的灭亡，并且要向我们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这难道还不明显嗎？

有帝国主义存在、有台湾的国民党存在，敌人派遣特务間諜的阴谋活动就不会停止。張家口市医士学校附屬医院清查出来的張致生，就是接受了“中美联合工作总部”任务的一个特务分子，挂着医务人员招牌，曾千方百计地搜集我軍政机关設施、飞机場以及“三反”、“五反”、“鎮反”运动等各个方面的情报。

以上这些活生生的事实，还不足以說明我們必須展开肃反运动来把这些反革命分子加以清查嗎？右派分子的所謂“肃反是庸人自扰”不正是替这些反革命分子辯护又是什么呢？右派分子反对肃反，其居心不良，不是明明白白的嗎？那些口口声声反对肃反运动的人，企图夸大缺点錯誤，抹煞肃反运动的巨大成績，动摇革命的成果；显然，这些人并不

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相反，是被推翻的統治階級的殘余，極端仇恨人民民主專政，並且幻想復辟的一種表現。

肅反鬥爭是採取群眾運動的形式進行的。群眾路線，是我們工作的根本路線，當然也是我們搞好肅反工作的根本路線。正是由於我們這樣做的結果，才大大提高了廣大群眾的社會主義覺悟和對反革命分子的辨別能力，廣大群眾積極起來揭發檢舉反革命分子，因而，全省收到了經群眾揭發檢舉的大小問題的材料達九萬多件，有了這批材料，我們才較為順利的清查出一批反革命分子。例如通縣女師教員宋光弼，由於偽裝的巧妙，已經騙取了“模範教員”的稱號，就是經群眾揭發和查證，才弄清他是國民黨黑龍江省代理書記長和哈爾濱市特別黨部書記長的。又如涿縣教員李肇熙，還曾一度偽裝為肅反積極分子，也是經群眾揭發和查證，才弄清了他是一個中統特務分子。事實說明，如果不發動依靠廣大群眾的積極支持，只靠專門機關孤立的來工作，在這樣短的時間，反革命分子就不可能這樣迅速地被孤立和暴露出來，要取得這樣巨大的成績是根本不可能的。動員廣大群眾清查反革命的方法，還可以避免只靠專門機關少數人員去肅反容易發生的“左”的或右的錯誤，即使發生了某些錯誤也比較容易發現和糾正。更不用說群眾通過鬥爭鍛煉，提高了警惕性這方面的好處了。因此，那種反對發動群眾搞肅反鬥爭的人，不是不承認廣大群眾的巨大力量，就是實際上不願意把肅反鬥爭進行徹底。

在肅反運動中，我們還查清了一大批人員的政治歷史情況，幫助他們放下了包袱，分別作出了結論。據全省不完全統計，有九萬多人向組織上坦白交代了自己隱瞞的各種政治

問題和历史問題。這是一個很大的收穫。這對分清敵我界限，擴大我們團結範圍，暴露和孤立反革命，調動積極因素都有重大意義。

全國解放後，我們黨對於大批的舊知識分子與舊人員進行了巨大的團結、教育和改造的工作，收到了偉大成績。但有少數人因為隱瞞了他們參加過反動組織，同反革命組織有過關係，或同反革命分子有過政治關係，或平素有反革命言論，當組織上還未查清他們這些問題時，就極易影響着對他們更好的團結使用。每當運動到來，常常因為這些人的敵我界限不清，而牽掛了他們。有一些人則背着歷史包袱，對革命組織懷有戒心，存有隔閡，工作情緒不高，在機關中形成一個所謂落後層。而正因為他們有這樣、那樣政治上歷史上的污點，也就常常成為敵人利用活動的對象，他們也就容易上反革命分子的當。這樣的事實在運動中揭發了不少，如何使這些人劃清界限，放下包袱，擴大我們的團結範圍，縮小敵人的活動基礎，堵塞反革命分子進行破壞活動的漏洞，是急待解決的問題。這次肅反運動把這一問題解決了。當查清了他們的問題，對他們作出正確的結論後，使他們放下了包袱，很多人政治進取心空前提高，對黨和政府表示感激。如沙河縣孔芳齋說：“我原來既不贊成國民黨，也不贊成共產黨，因為我認為共產黨什麼時候也不會相信我。現在我才認識到黨對人民的關懷與愛護，我決心把晚年貢獻給社會主義。”再如峯峯市女教系統袁子良的血債嫌疑，經查清予以否定後，袁感激的說：“共產黨真英明，我的問題不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是不能弄清的。”總之，這樣就消除了以前存在的一些消極因素，調動到積極方面來。這是運動中根本的積極

的方面。当然有些人在运动中曾經被斗争过，有的还斗得厉害了一些，一度伤了感情，但我們相信，經過必要的解釋工作，他們是会明白这些道理的，他們是会更加向党靠攏的。

几年来，我們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处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某些机关政治思想工作薄弱，存在右傾麻痹思想和不問政治傾向，使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在机关的某些角落中找到了市場，甚至一些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在机关中公开散布反动思想。对此，我們平时麻痹，觉察不够，在肃反运动中广大群众提高了觉悟，擦亮了眼睛，揭露了机关内部的一些所謂“阴暗角落”，发现了一些反动的流氓的小集团。这些小集团在我們革命队伍中起了很大的腐蝕与破坏作用。他們散布反动思想；有的拉攏落后，打击进步，对抗领导；有的两面态度，利用弱点，制造流言蜚語，挑撥离間，兴风作浪；有的发展低級趣味，追求下流生活，以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来腐蝕干部。从斗争的經驗中可以看出，这些小集团活动曾是敌人欢迎的，有的就是反革命分子組織的。我們在揭发这些小集团的斗争中，从中也确实找到了反革命，比如：張家口市原华北地質局以反动地主反革命子弟陈柳屋为首的“社会革命党”反动組織，自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五年七月已发展了七人，其成員有反革命子弟，也有犯过錯誤的及其他思想落后的分子。当然，这些小集团的成員不都是反革命，但小集团的骨干分子多数却是反革命分子或坏分子。对这些反动的流氓的小集团活动，給予严肃的批判，这是非常必要的。这对提高群众觉悟，增进内部团结，打击邪气，提高正气，都起了很大作用。

总之，肃反斗争是一次历史性的偉大胜利，清查了反革

命分子，純化了革命隊伍，使廣大群眾受到了一次實際的階級鬥爭的鍛煉，提高了覺悟，積累了經驗，因而運動的結果，大大地鞏固了人民民主專政，進一步保障了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發展。

如上所述，肅反鬥爭是完全必要的，成績是巨大的，運動的發展基本上是健康的。這個正確的論斷，是無論怎樣也推翻不了的。當然，在肯定成績的同時，我們還必須看到在具體工作上確實是發生過一些偏差和錯誤的，主要是在一九五五年秋天肅反鬥爭的高潮時期，部分地區和單位，曾經一度產生過鬥爭面過寬的偏差，錯鬥了少數好人，就全省來說，大約占當時的肅反清查對象百分之五左右。一九五六年的運動，錯鬥好人的現象就大大減少了，今年開展運動的單位，基本上杜絕了這種情況。

在運動中還有這樣的情形，有一些人本身確實存有一些問題，群眾對他們的行為有所懷疑和不滿，在群眾發動起來之後這些人受到清查或鬥爭，雖然最後定案不算反革命分子，但清查或鬥爭他們是應當的。為了便於了解當時的情況，我可以舉出這樣兩個例子：石家莊市華新紡織廠助理技術人員孫汝林，一九五〇年在唐山中學時曾參加反革命組織“三民主義建國黨”，一九五一年該案被破獲，孫潛逃。後來隱瞞歷史混入革命陣營，肅反中經群眾小組幫助，交代了這一問題，最後定案時，考慮當時孫年紀還小（十六歲）又不是該組織的骨幹分子，參加工作後再無其他活動，不以反革命分子論處。又如省人民出版社的編輯周敬儕，因偽造歷史，工作中散布落後言論，肅反開始時公開為胡風的反革命罪行辯護，並寫匿名信謾罵省文聯編輯部，因而一度被確定

为肃反清查对象并且被群众斗争了。这些人经过反复查证，甄别定案，最后都实事求是的做出了恰当的结论。这对国家对他们自己难道不都是有好处吗？在群众运动中这些人被清查或被斗争，难道是不应当的吗？

当然，错斗了好人，确实给运动带来了一定的副作用，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这是应该有足够认识的。但这个错误，一经发现，我们都做了纠正，有的还正在深入反复的检查和采取各项善后工作的措施。我们相信，由于这个错误而引起一些人的不满，是完全可以消除的，产生的某些不良后果，也是完全可以弥补的。

在我们的工作中，也有漏的错误。一些单位由于发动群众不够充分，或者调查研究工作不细致、不深入，以致有少数暗藏较深的反革命分子没有被清查出来。在大放鸣中，少数反革命分子，乘机兴风作浪，更加证实了这种情况。这个方面我们也正在采取必要的措施，使肃反斗争进行彻底。

为着彻底纠正我们肃反运动中的缺点和错误，更好的巩固成果，根据“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根据中央的指示，我省从一九五六年四月份就提出了复查善后工作，并相继数次召开了专门会议具体进行了部署，强调领导干部亲自阅卷，弄清问题性质，做到定案有据，处理适当，强调及时处理申诉案件，作出实事求是的恰如其分的结论。然后根据不同情况，分别进行处理。除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一律依法交司法机关处理外，对于那些在运动中被错斗过的好人，都诚恳地分别向他们进行了赔礼道歉，恢复了名誉。取得他们的谅解。事实证明：肃反运动即使在个别地区单位发生了比较严重的缺点和错误，一经复查，缺点错误都得到了纠

正，損失也得到了彌補。我還要說明，在幾次复查和善后工作中，不僅查出了錯案，也查出一些被漏掉的反革命分子。因此，在堅決糾正缺點錯誤的同時，仍然要貫徹有反必肅的精神，不能有絲毫麻痺。那些別有用心之徒的右派分子，抓住個別案件的錯誤缺點，就加以片面夸大，企圖從個別的少數的事實中引伸出肅反運動搞糟了的結論，從而達到否定肅反運動的巨大成績，動搖人民民主專政的惡毒的目的。可是這只是右派分子的理想，他們的論調，是經不住駁斥的，因為他們既沒有事實的基礎，也沒有群眾的基礎。他們的材料和它的來源是可疑的，他們是站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立場上替反革命分子說話。毛主席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指示我們說：“有些人不了解我們今天的政策適合於今天的情況，過去的政策適合於過去的情況，想利用今天的政策去翻過去的案，想否定過去肅反工作的巨大成績，這是完全錯誤的，這是人民群眾所不允許的。”我們正告那些攻擊肅反運動的右派分子，應當從毛主席這個指示中，得到教育，徹底轉變反黨、反人民、反對人民民主專政的立場。

為了把肅反工作做得更好，繼續糾正錯的和漏的這兩個方面的錯誤，我們熱誠的擁護毛主席提議的由人大常委會和政協常委會主持在今年或明年對肅反工作全面檢查一次的指示，這對改進工作，正確地處理反革命分子和健全我們的法制有很大好處。

河南省肃反运动的胜利

賈心斋的发言

我完全拥护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和周总理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完全同意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彭真副委员长兼秘书长所作的各项工作报告，我愿意認真的学习和贯彻执行这些报告的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建設而奋斗。

現在我仅把河南省的肃反工作情况向大会报告一下，以鉄一般的事实来駁斥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向人民进行恶毒进攻的荒謬言論。

一九五五年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时候，殘余的反革命分子又瘋狂地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建設，在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我省开展了肃反斗争，对那些罪大恶极、坚决与人民为敌、繼續进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和那些有組織的隱蔽的反革命集团依法逮捕了一批。太康县捕获了以刀鋤、火燙、剖腹、割舌、挖眼等殘酷手段，杀害我干部和群众一百二十八名的反革命匪首郭馨坡。安阳公安处捕获了伪“灭共卫隊团长团长吳兰田，該犯一九四零年至一九四五年間，~~在~~滑县一带即杀害共产党员、干部和民兵一百六十余名。新阳县一九五六年二月破获了反革命組織“中国农民联合党”，~~他們有党綱~~

党章，流窜于南阳、唐河、新野三县结合部，发展反革命組織，企图占据唐河、泌阳、新野、襄阳、樊城等县，声言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许昌公安处破获了“中天道”的組織，道首張自成、張永安等在商城、上蔡、西华、临颍、郾城等县地区秘密发展道徒一百八十余名，阴谋进行暴乱，此外还捕获了一些长期潜伏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特务、間諜分子，如蔣特“內調局”派遣的樊家源、王若萍，他們于一九五五年四月冒充夫妇打入我开封市花紗布公司工作，曾多次向匪住南越特务头子报告情况，并且指示其妹与我炮校軍官結婚，企图搜集我軍事情报，在逮捕时查出該犯修理电台工具和电台密碼罪証。又如“蔣特中委会”派遣的“平汉路南段行动縱隊長”，所謂“万能特务”扶平，他于一九五六年潜入我省信阳一带，企图制造雷管炸药，破坏我京汉铁路南段的桥梁。在破案中繳出他用化学藥品浸透过的褲头、袜子等罪証。

一九五六年根据敌情的变化，我們开展了政治攻势，进一步实行了宽大政策，号召反革命分子自动向政府投案自首。一年中投案自首的反革命分子，其中有不少是罪恶严重、民憤很大的漏网和新进的反革命分子。同时在政治攻势中还繳获了大批武器和反动証件，据統計共繳获机枪十六挺，长枪一千一百二十九枝，各种子彈八万零七百五十七发，其他反动物資証件七万余件。

在去年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以后，国内政治形势已經发生了根本变化。根据这一情况，一九五六年我省按照全国农业发展綱要中的規定，結合整頓农业合作社，发动群众对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进行評議，把

他們納入社內監督改造，在勞動改造中多數向好的方向轉變，摘掉地主、富農帽子，改變成分的一天天加多。

河南去年在內部開展的肅反運動也取得了很大成績，查出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其中有特務分子、民憤很大的殺人凶犯和品質極端惡劣的流氓分子等。如鄭州紡織機械廠技術員張錦玉，是“蔣特中委會”“自由中國勞工同盟”派遣的特務，混入該廠後，表面偽裝積極，暗地則挑撥離間，策動工人離廠，並且將該廠生產、設備、人員等情況，向香港特務機關匯報。鄭州鐵路管理局，查出以段雙印為組長的一個七人中統特務小組，全組從解放隱蔽至今。段雙印曾混入我青年團擔任團支部委員。信陽煤建公司秦會祥，曾經任閻錫山的暗殺團團副，是殘殺十五條人命血債累累的反革命分子。治淮機械總隊程少璠，一九四零年叛變後擔任日寇情報員，國民黨還鄉團分隊長，曾打死我區長、縣府科長等三人并縱火焚戶，奪槍二十餘枝，該犯因民憤大在鎮反時潛逃，群眾即扎一紙人代替程犯槍斃。洛陽專區宜陽縣第一初級中學教員李岑濤是三青團區隊長，一貫奸污玩弄男女學生共達四十七人，屢教不改。類似以上例子很多，不能一一枚舉。在大專學校中也搞出一批証據確鑿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在歷史上有反動罪惡行為的就更多。除此之外，在運動中還繳出大量武器和彈藥，根據初步統計：交出各種槍五百九十二枝，炮兩門，炮彈一箱，機槍十挺，子彈一萬三千五百一十發，及大量反動証件。

以上成績和事實，雄辯地回答了右派分子所謂：“肅反搞的糟呀”，“鄉間革命過火”，並且誣蔑積極分子“偵察情況是特務”，誣蔑肅反運動造成了“秦始皇時期偶語棄

市”等謬論，右派分子的這些荒謬言論說明了他們昧着良心，閉着眼睛抹殺肅反成績，突出地表現出他們的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本質。我們的肅反運動結果是良好的，不僅基本上肅清了反革命分子，反革命案件和破壞事故較前顯著的減少，社會秩序更加穩定了，同時也純化了內部，把一部分同志多年來懸而未決的問題弄清了；群眾的覺悟也提高了，因而出現了團結生產、積極工作的新氣象，更進一步的鞏固了人民民主專政，事實證明了肅反運動是完全必要的。我們能夠取得肅反鬥爭的勝利，是由於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正確領導的結果。

首先，是認真地貫徹執行了“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我們除了對罪惡嚴重、民憤很大和進行現行破壞活動的反革命分子予以懲辦外，凡自動投案自首坦白罪惡的反革命分子，均進行了寬大處理。

其次，認真執行了毛主席提出的“提高警惕，肅清一切特務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個好人”的方針，對每一個反革命案件均進行了調查研究，貫徹執行了依法辦事的精神。

再次，貫徹執行了群眾路線，廣泛的開展了宣傳工作，對廣大工人、農民、幹部、知識分子是一次極其深刻的政治教育，在運動中使他們劃清了敵我界限，提高了警惕，提高了識別反革命分子的能力和對敵鬥爭的積極性。群眾熱烈的檢舉了許多罪惡重大，隱蔽很深的反革命分子，在運動中證明專門機關與廣大群眾緊密的結合起來，才能戰勝一切狡猾的敵人。

在肅反運動中也發生過一些缺點和錯誤，曾捕了少數雖有罪也可以不捕的人，也鬥了雖有一般歷史問題但不應該當

作反革命分子來鬥爭的人，在鬥爭中間也曾經發現一些過火的現象，但在這些現象被發現以後就及時糾正了。當然，在肅反中所發現的缺點和錯誤，雖然是極少數和個別的問題，也必須引以為戒。

由於三大改造的勝利，經濟基礎的變化和幾年來肅反運動的勝利，反革命殘餘勢力已經基本上肅清了，但是還有反革命分子，仍不斷的進行破壞活動；特別是帝國主義與蔣介石集團，仍積極地派遣特務間諜，來破壞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因而，我們還不能放鬆對敵鬥爭的警惕，進一步的加強工作，貫徹執行“有反必肅，有錯必糾”的方針，認真執行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指示，劃清敵我界限，繼續同反革命分子作鬥爭，以保衛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和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而奮鬥！

以上發言是否有當，請指正！

決不能放鬆警惕

劉永生、林一心、李質忠、侯振亞、

鄭依憐、謝雪紅的聯合發言

我們完全同意周恩來總理、李先念、薄一波副總理和張鼎丞檢察長、董必武院長、彭真副委員長、烏蘭夫副總理的報告。現在我們就肅反問題發表一些意見。

福建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同全國人民一道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勝利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

就。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群众觉悟空前提高，社会秩序十分安定，各项建设事业欣欣向荣。我們不会忘記：在解放前国民党反动統治下的福建，是民穷财尽、灾难深重，那时土匪猖獗，特务横行，尤其是蔣介石集团在其退出大陆之前作了周密的“应变”部署，潜伏特务和特务武装散布极广，妄想以福建作为其反攻大陆的基地，不断地进行各种反革命破坏；福建之所以有今天的新面貌，是与我們在解放后进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进行了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分不开的，肃反斗争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繼一九五〇年社会大鎮反之后，为了保卫我們社会主义的偉大事业，从一九五五年以来的两三年中，我們分批地开展了群众性的肃清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坚决貫徹了“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的方針，运动結果証明，这个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

肃反运动的成績是十分巨大的。第一、从我們机关内部和社会上清查出一大批反革命分子，并从这些反革命分子中繳获到机枪二挺，长短枪八百一十八枝，各种子彈三万八千余发，手榴彈三百八十三顆，其他反革命証件五万余件及無線电台等物。此外，也有一批反革命分子在党和政府的寬大政策感召下，向政府投案自首。这就給了敌人以致命的打击。从福建处于国防前綫和当前对敌斗争的具体情况來說，有其特別重大的意义。第二、查清了一批工作人員的政治、历史問題，給他們做出了公正的結論，使他們安心工作，进一步靠攏党和政府，更好的發揮其积极性，加强了人民内部的团結。第三、通过运动的实际斗争，鍛炼和教育了干部与

广大群众，大大地提高了干部和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政治警惕性，学会了在新的情况下正确解决敌我矛盾的本領。在肃反运动中群众检举揭发反革命分子的材料即达六万余件。由群众协助政府侦破的案件，占破案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左右，敌人派遣偷渡登陆或空投的特务分子，很多在广大群众协助下当天即被发现，或在三两天内即被破获。第四、进一步纯洁和巩固了党和国家机关的组织，粉碎了敌人企图从内部来破坏我们的阴谋，原隐藏在我内部的反革命分子，现在则暴露在广大群众的监督之下，有利于帮助他们重新做人；机关、企业的政治事故，也因之而大大减少了，这就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我省经过肃反运动，残余反革命势力已基本肃清，人民民主专政更加巩固，虽然处在国防前线，面临金门、台湾等敌占岛屿，加一九五六年还有灾荒，但社会秩序却十分安定，这就最雄辩的证明了我们的肃反斗争是成功的，证明了群众肃反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由于肃反运动是一个群众性的运动，是与隐蔽的敌人作斗争，加之运动开展之初经验不足，工作中也发生过某些缺点错误，主要是：在运动中控制不严错斗了少数不应当作为反革命分子斗争的人，在逮捕和审判工作中曾发生少数的错案，也漏掉了一些反革命分子，根据晋江、龙溪等九个地区和单位复查的结果，在九百九十九件反革命案件中，查出错定为反革命分子的有十三人，占反革命案件总数的百分之一·三。漏掉的情况则更严重，全省今年上半年复查了六万七千二百个案件中，发现漏掉的反革命分子有二百零七件，反革命嫌疑分子一百四十一件；龙溪专区在一、二、三批运动

中，查出漏掉的反革命分子有九十六人，竟占該专区已定案的反革命分子总数二百三十四人的百分之四十一。对这些缺点錯誤均本着“有反必肃，有錯必糾”的精神，有的已經在运动过程中及时发现糾正了；有的在一九五六年檢查肃反案件中得到了糾正，有的現在正在糾正中。

但是，这些缺点、錯誤和整个肃反运动所获得的巨大成績比較起来，仅占极其次要的地位，那些認為肃反运动搞錯了，否定肃反运动的巨大成績，把肃反运动說成“尽是錯誤偏差”、“胡鬧”、“糟糕透頂”，这是一种毫無根据的誹謗，显然是別有用心的。人民群眾是看得清楚的，他們对于这种反动論調已經表示了無比的憤慨。

肃清反革命分子是一个长期的斗争，我們絕不能絲毫松懈斗志。目前残余反革命势力尚未完全肃清，而內外肃反运动中也漏掉一些反革命分子。如龙溪专区在复查工作中，已經查出漏掉的反革命分子九十六人。該专区的海澄县，有个刘丕洽，是反共救国軍第九縱队第六支队的联络员，混入了中共党内，和特务分子保持密切联络。也还有反革命分子隱藏得更深而未被发现，美蔣特务机关还在不断地向福建地区派遣特务間諜。如不久前在厦門破获的蔣帮国防部二厅潜伏特务胡春和案件，胡于一九五五年十月由泰国到台灣，受过伪国防部二厅的特务訓練，一九五六年三月由台灣到香港，用归国华侨的名义潛入我省，先后活动于詔安、漳州和厦門等地，先后多次送出軍事、政治情报。美蔣特务机关并利用波匈事件及我們工作中的某些空隙，施行其所謂“心理作战”，以反动傳单、信件等形式，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宣傳。国内少数残余反革命分子仍不断地进行破坏活动，三明县雪

峯鎮殘余反革命分子伍裕軒，于今年四月十八日晚，糾眾吃大刀符，企圖組織刀會暴亂；晉江專區已發現有五個地主分子向農民反攻，將土改時分給農民的房屋及房屋地基等抽回。上述這些事實告訴我們，決不能放鬆對反革命分子的警惕，只要有反革命分子存在，我們就必須堅決、徹底、干淨地肅清它。有人說：現在階級鬥爭基本結束了，天下太平了，用不着再搞肅反鬥爭了，這種論調是毫無根據的，是極端荒謬的。

福建是國防前綫，面對敵人的各種侵擾，我們應隨時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不要以為反革命分子不多了，而把自己麻痺起來，那就會上大當、吃大虧的。必須認識：反革命分子雖然為數不多，但他們的反革命活動對國家和人民的危害是極大的。因此，今後必須繼續貫徹“有反必肅，有錯必糾”的方針，繼續進行肅反工作，進一步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堅決和反革命分子鬥爭到底。

目前一小撮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進行惡毒的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陰謀活動，他們企圖利用肅反鬥爭和其他工作中的個別缺點、錯誤，發動對黨和政府的進攻，我們堅決反對他們這種罪惡活動，我們福建全省人民和全國人民一道決不讓其陰謀得逞。他們倘能徹底交代，從新作人，人民還可以給其寬大的出路，如果堅持反動立場，執迷不悟，那就必將自絕于人民，招致可恥的結局。

肃反对誰來說“糟得很”，

陈成义的发言

我衷心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完全同意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烏兰夫副总理、張鼎丞檢察长、董必武院长和彭真副委員长的报告。現在，我想就甘肃省的肃反工作講一点意見。

在解放以前，甘肃的反革命势力是相当雄厚的。早在国内战争期間，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对陕甘宁边区进行破坏活动，就在甘肃建立了龐大的特务机构。兰州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特务据点。同时，甘肃的解放，在時間上來說，是比較迟，許多地方的特务反革命分子都逃到甘肃；而从解放战争的进展速度來說，又是比較快，除了少数的特务头子逃跑以外，大部分反革命分子都就地潜伏下来。加之，甘肃又是我国的一个新的工业基地，美帝国主义和蔣介石集团不断派遣特务前来进行破坏活动。在美帝国主义和蔣介石集团看来，甘肃經濟文化落后，民族关系复杂，封建势力濃厚，所有这些，都是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有利条件。因此，解放以来，甘肃地区的反革命活动曾經是比較囂張的。

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方式，总的說来，是既有公开的，又有隱蔽的。不过，在解放初期，反革命分子以为人民政权还不稳固，活动比較方便，較多地采取公开的顛复活动。特务反革命分子勾結反动会道門头子、反动的地主階級分子和其

他反动分子，进行武装暴乱，袭击人民武装部队和人民政府，杀害干部和群众；组织反革命集团，如所谓“黑头仁义军”、“抗共复蒋仁义军”、“中美联合革命党”、“中国反共救国军西北区军事委员会”等；反革命分子甚至公然自称“皇帝”，要坐“龙廷”，前后有七人之多。在这些公开的反革命活动遭到失败以后，就转而更多地采取隐蔽的方式。利用暗藏在我們国家机关、团体、厂矿、学校、合作社、商店内部的反革命分子，进行各种各样的破坏活动。他们放火放毒，造谣煽惑，破坏生产建设，破坏机器，偷窃情报，散发反动传单标语，挑拨离间，甚至凶杀报复。显然，对于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如果不给予坚决的打击，人民政权就不能巩固，社会秩序就不能安定，人民的安全就得不到保障，生产和建设就不能顺利进行。因此，坚决进行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完全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的。右派分子把我們的肃反工作說成“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扰之”，企图否定肃反工作的必要性，这是彻头彻尾的歪曲事实。

八年来，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甘肃地区的肃反工作获得了偉大的成績。特別是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五年的两次大張旗鼓的群众性的肃反运动，成績更大。經過肃反斗争，比較彻底地肃清了公开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安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加强了民族之間和民族内部的团结，解放了生产力，保障了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同时，广大人民在肃反斗争中受到了教育和锻炼，提高了政治觉悟和革命警惕性，取得了向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經驗。現在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果沒有一九五一年肃反运动的胜利，

各項民主改革和經濟恢復工作就難以順利進行；同樣的，如果沒有一九五五年肅反運動的勝利，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就難以順利進行。八年來肅反工作的實踐證明，堅持黨的領導，堅持群眾路線，堅持“有反必肅、有錯必糾”的原則，堅持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是肅反工作取得成績的基本因素，也是肅反工作的基本經驗。

我們的肅反工作，採取群眾運動的辦法，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確的。因為肅反鬥爭是一場極其尖銳複雜的階級鬥爭，反革命分子是狡猾的、頑強的，必須發動一個千軍萬馬聲勢浩大的群眾性的攻勢，才能有力地打擊反革命分子的活動。特別是群眾的檢舉、揭發，對於反革命分子更是沉重的打擊。在甘肅的肅反運動中，從一九五五年八月到一九五六年七月，單是群眾檢舉機關、企業內部反革命分子的材料，就有四萬九千多件。這些材料，經過反復查對，絕大部分是符合事實的。這樣，在四面楚歌的情況下，再加我們展開了政治攻勢，號召一切反革命分子投案自首，反革命分子內部就開始發生動搖、分化，單是一九五六年一年內反革命分子自動投案的就有三千四百三十二人。同時，有領導的群眾肅反，還可以保證工作進展得比較健康，可以少發生一些錯誤，即使發生了也比較容易糾正。肅反工作，但其他一切工作一樣，必須使領導與群眾相結合，才能獲得成績。右派分子的所以反對我們採取群眾運動的方式去進行肅反，正是因為我們通過群眾性的肅反運動比較徹底地肅清了反革命分子，這在右派分子的內心裡確實是有難言之痛的。

肅反運動的成績，是必須加以肯定的。廣大群眾和干部的革命積極性和警惕性是必須加以保護的。這是基本的主要

的方面。至于在运动过程中，在具体工作上也曾經发生过一些偏差和錯誤。一方面有少数案件是搞錯了，有的可以不捕的逮捕了，有的量刑偏重了。某些地方在执行政策中，也有“左”的現象。对于这方面的偏差和錯誤，在过去几年中，我們曾經进行了几次的檢查和糾正。例如在一九五六年，我們就对从一九五五年一月到一九五六年九月的案件作过一次全面的檢查，对于有这类偏差和錯誤的案件，都分別进行处理。另一方面，也有些反革命分子漏掉了，有的應該逮捕的沒有逮捕，有的量刑偏輕了，有的不該釋放的釋放了。在执行政策中，也有右的現象。这方面的偏差和錯誤，过去我們注意得比較少，因而还没有得到应有的糾正。这是需要今后加以改进的。总的來說，我們党和政府对于肃反中的偏差和錯誤，态度从来是严肃的，本着“有錯必糾”的原則，随时发现随时糾正，这里，应当說明，在肃反运动中，要求完全不发生偏差和錯誤，那是不切实际的。特别是在面对面的斗争中，反革命分子狡猾抵賴，群众激于义憤，某些地方难免发生一些过火的行动，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右派分子則不然。他們抓住了肃反工作中个别的偏差和錯誤，借題發揮，大做其“翻案文章”，装出一副悲天憫人的样子，喊叫肃反运动“搞錯了”，“錯誤是主要的”，有人甚至主張組織不要共产党領導的“平反委员会”。右派分子这样叫囂，实际上是有他們不可告人的目的的。揭穿了說，無非是想否定党和政府对肃反运动的正确領導，打击广大人民和肃反工作干部的积极性，抹煞肃反运动的偉大成績，替反革命分子撐腰而已。当然，肃反斗争的成績，在右派分子看来，确是极大的“失敗”的，确是“精得很”。但是，在人民心目

中，这是偉大的胜利，是好得很。广大人民坚决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意志和力量，决不是右派分子所能动摇的。

最后，我特别指出，右派分子的所謂“階級斗争过火了”的謬論，不但是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种严重的歪曲，而且还包藏着一种險恶的政治意图。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中說：“革命时期的大規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階級斗争基本結束，但是階級斗争还没有完全結束。”事实正是这样。就肃反工作來說，反革命分子虽然已經被比較彻底地肃清了，但是还有。就在今年五月二十一日，甘肃正宁县就破获了所謂“創造国家人义軍国防部”的反革命組織，就是証明。右派分子这种說法，实际上是想麻痹我們的革命警惕性，解除我們思想上的武装。而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以来，在甘肃地区确有不少同志滋长了一种新的麻痹右傾思想，对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沒有保持应有的警惕，这是很危險的。我們必須記住毛主席的話：“如果我們喪失警惕性，那就会上大当，吃大亏。”我們必須进一步提高政治嗅觉和革命警惕，正确地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不管什么地方出現反革命分子搗乱，我們就把他坚决消灭。

肃反成績是不容懷疑的

朱光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大会的各项报告。

一九五六年广州市和全国一样，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

义建設都取得了偉大的胜利，基本上改变了广州市的面貌。同样，在肃反工作中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右派分子企图抹杀我国几年来的光輝成就，尤其是对肃反工作肆意誣蔑，因此，我就广州市一九五五年以来肃反工作的情况作一个发言。

一九五五年展开肃反斗争，是完全必要的。当时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前夕，广州市人民和全国人民一起，在为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而斗争。但是，残余的反革命分子和帝国主义、蒋介石集团的特务分子，却积极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他们针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各项措施，进行造谣，涂写反动标语，进行所谓“心理作战”，仅七月份一个月內，全市发生的反动谣言就有二百七十七宗。他们制造各种事故，破坏生产，破坏社会主义建設，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五五年全市工厂企业发生破坏生产和破坏嫌疑事故二百五十三件。他们互相糾合，企图煽动騷乱，进行暴乱，例如中統特务吕薄冰糾合外省逃亡的反革命分子三十余人，企图伪装乘客劫夺民生公司的民俗輪駛去台湾；同时又指派反动組織成員王慈正、王家昌混入稅务局，图謀拉攏炊事員毒杀負責干部。他们积极刺探我各种軍事、政治、經濟情报，并企图在我要害部門、高級机关、高級民主人士中，寻找所謂“失意、失勢、失寵”的干部及“有政治野心和高官厚爵欲望的人”，进行“策反”。这些情况說明，特务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是猖獗的，情况也是严重的。而当时我們的队伍內部不純，制度松弛，广大干部右傾麻痹思想有所滋长。针对这些情况，我們遵照中央的指示和第一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會議的決議，在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又发动了一次全市規模的鎮反运动，同时在全市机关、学校、工厂、企业、人民团体內部，

开展了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斗争。

肃反斗争的成绩是巨大的。这一斗争沉重地打击了特务反革命分子的阴谋破坏，有效地保卫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行。由于发动并依靠了群众与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一些隐蔽的较深的反革命分子被揭露出来了，这就进一步肃清了残余的反革命势力。例如曾在一九四七年任伪第七清剿区军事处长及副司令的反革命分子丘宇生，他在山东等地制订“反共”计划，执行“三光”政策，主谋策划围剿我游击队，杀害我革命干部、群众多人，解放后拒不坦白，就是在人民群众检举下，经调查证实依法逮捕了。我们还积极地打击了帝国主义蒋介石特务间谍，侦破了一批案件，及时粉碎反革命阴谋活动。如一九五六年十月，敌人准备在广州制造大规模恐怖骚乱事件，以配合他们在九龙的暴乱，陆续派遣了一批经过训练的特务分子和偷运了一批美制定时炸弹、各种炸药及大批反动传单，阴谋于国庆节前后在主要戏院、茶楼、旅店、公园、百货公司、油库、车站等四十多处进行破坏。其中吴满安、麦忠、陈金、周汉勤等几批特务负责爆炸和焚烧中山等五家戏院，中央、海幢、越秀、海珠等公园；黄永仁、周世民、黄就、陈英等几批特务在南区、北区等处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煽动骚乱。香港特务机关并派遣特务黄合携带照相机准备摄取爆破和骚乱的现场照片，作为进行反革命宣传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到，特务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是疯狂的，他们为了达到目的，不惜采取一切最卑鄙最狠毒的手段。但在全市广大群众积极支持和配合下，经过市公安机关缜密的侦察，完全粉碎了敌特的这一阴谋，捕获了敌特行动暴乱凶手，缴获了一批敌特的定时炸弹、纵火

器、黄色炸药和数以千计的反动传单，给了这批行动破坏特务以摧毁性的打击。

机关内部发动群众展开的肃反斗争，也清查出一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其中有的已经鑽进了我们的首脑要害部门，个别的甚至窃踞了领导工作岗位。内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同社会上的特务分子相呼应，也进行了各种阴谋破坏。例如北区税务分局練儒松，一九五五年十二月被由香港潜返广州活动的特务分子所收买，参加了国民党“中委会”特务组织，一九五六年初先后三次密写情报送给香港特务机关。在中共广州市委会当炊事员的特务分子潘初，曾搜集了有关军事情报及机关组织人员情况供给香港特务机关。肃反运动把这些暗藏的敌人清查出来，消除了心腹隐患，进一步纯洁了我们的队伍。

肃反运动显示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体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威力，也促进了敌人进一步分化瓦解。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政策的感召下，反革命分子纷纷向政府投案自首。一九五五年反革命分子前来投案自首的有一百七十七名，一九五六年一年又有二百一十名。投案自首的反革命分子中，不仅有一批罪恶严重的有血债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而且有现行特务分子。对于城市残余反革命分子（包括投案自首分子），我们遵照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宽大处理和安置城市残余反革命分子的决定”，给予从宽处理。已被改造好的分子，大多数获得了公民权利，并有一部分得到了安置就业。获得宽大处理的反革命分子对政府普遍表示感激。这对分化瓦解和争取改造反革命分子起了很大的作用。

肃反斗争进一步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革命警惕和识别反革命的能力。两年来，市民检举了反革命和反革命嫌疑分子的材料五千九百九十七件，经公安机关侦察证实确是反革命分子需要依法逮捕的就有一百九十九名，在去年国庆节前后的保卫工作中，更充分显现出广大群众反特斗争的高度积极性，他们不只积极参加了值班、巡逻、防范保卫的工作，并且主动检举、监视、跟踪反革命分子，协助公安机关打击敌人，在这场一个多月的斗争中，光是由于群众检举而破案的就有六起，依法逮捕了特务七人。如北区有一个年近六十岁的老太太梁婉文和一个有眼病的妇女刘贵，在去年十月十日晚上发现了散发反动传单的特务，自动跟踪到其住地后报告派出所，因而破案，有的群众不愿自己的亲人出卖祖国，危害人民，向政府检举，如中区某大酒家的职工检举其堂弟阴谋发展他参加特务组织，经侦察后捕了三名现行特务；东区工人新村工人王某，发现其姨由香港回来后，行动可疑，便到派出所检举，侦察结果，其姨是一个现行特务分子。

仅就上述情况，已可以充分说明一九五五年以来在广州市开展的肃反斗争成绩是巨大的。肃反运动的结果，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社会秩序更加安定，从而保障了全市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我们肯定成绩是主要的，但我们并不掩盖缺点和错误。在肃反运动的激烈斗争中，曾经错捕了个别好人，也捕过极少数可捕可不捕的人，这就政策上来检查是有缺点的；在机关内部肃反斗争初期，有些单位的斗争面宽了一些，斗错了少数好人，有些单位在肃反运动以后，对若干遗留问题没有及时妥善解决。同时也还有一些反革命分子漏网。这些缺

点，有些是在这样一場复杂的斗争中难以避免的。而且，上述的缺点和錯誤是局部的、暫時的，是可以糾正的，事实上是已經糾正和正在糾正中。我們組織了多次清案檢查，各單位也進行了肅反復查工作。案件檢查結果証明，一九五五年以來的肅反運動是健康的、正確的，捕錯的好人是個別的，并都已認真作了糾正和處理。對於被錯捕錯鬥的好人，向其作了檢討，承認錯誤，恢復其名譽，原來有職業的人，大多數已復職；生活有困難的，給予適當的社會救濟。例如去年四月市公安局西區分局因調查材料不深入，輕信檢舉材料，錯捕了一個曾經檢舉過反革命分子的群眾馮源，於去年五月間發現後，即行釋放，在群眾中公開道歉，恢復其名譽，給予了物質上的補償。馮源表示滿意，工作積極，常說：“政府這樣處理是對的。”

現在殘余的反革命勢力已經基本肅清，反革命分子內部的分化有了新的發展。但是，還有少數沒有肅清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仍會伺機搗亂。加以廣州是邊沿城市，毗鄰港澳，帝國主義者和蔣介石集團必將繼續派遣特務潛入進行破壞活動，如今年六月七日晚特務龍沛強攜帶美制定時炸彈投放在廣州文化公園，企圖大量殺傷參觀群眾（經群眾發覺，當場由公安人員逮捕，炸彈未爆），就是活生生的例證。敵人除了積極準備行動破壞外，還積極進行“策反”活動和搜集各種情報，特別是軍事情報以及廣泛展開“心理作戰”的活動，妄想挑撥起所謂群眾性的“抗暴運動”。這些情況說明，我們必須提高警惕。因此必須堅決貫徹執行毛主席的指示：不管什麼地方出現反革命分子搗亂，就應當堅決消滅他。

由此可見，那些右派分子說肅反運動搞得很糟，偏差很

大，是毫無根據的，這不外是由于他們和反革命分子血肉相連，聲氣相通，鬼死狐悲，物傷其類，而發出別有用心的詛咒罷了。

現在讓我們看看攻擊肅反運動表現得最猖狂的黃紹竑是怎樣為他的反動言論找根據的吧。去年十二月十八日，黃來到廣州，共住了八天。在視察中，他最熱中于挑剔政法各部門在執行法制方面的錯誤，並想從各方面尋找公安機關的違法材料，公安部門爭取向其匯報工作，黃卻表示不願听取。他不願听取全面的工作情況，專找岔子，找錯案，只看樹木，不看森林。原來他要的就是這些個別的偏差，個別的錯誤，把它加起來，並加以夸大，說成是全面的嚴重錯誤，作為向党、向社會主義、向人民民主專政進攻的“材料”。

黃紹竑是怎樣利用人民代表的身份，在視察工作中煽動罪犯“伸冤”的呢？有下列對話為証。

黃紹竑在視察第一看守所提審海外特務機關派遣進來的特務分子莊玄時，問：“你認得不認得黃紹竑？”莊犯點頭表示知道。

黃說：“我也是國民黨的人，你有什么思想搞不通的，你看到了大陸各方面，共產黨有什么不好，可以告訴我。”

黃紹竑就是站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立場，鼓勵反革命分子講共產黨的壞話，以便積累“材料”，準備向共產黨進攻。

代表們，這就是黃紹竑的真面目！這就是黃紹竑的立場！這就是黃紹竑的活動！

黃紹竑等右派分子存心抹煞各項工作的成績，夸大錯誤，說成漆黑一團，暗無天日，妄圖煽動人民反對共產黨，破壞社會主義，恢復資本主義，顯然是白費心機的。廣州市

人民永远記得，一九二七年广州起义之所以失利，一个重要原因是沒有坚决彻底肃清反革命，結果几千革命者和人民群众遭受了反革命的屠杀，我們不会忘記历史的教訓，也不会忘記这笔血債！对任何反革命活动，我們必須給以严厉镇压。对于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我們坚决予以回击。我們必須进一步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而奋斗！

不許右派推翻肃反成果

谷志标的发言

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几項报告我完全拥护。我現在就四川省的肃反工作发表一些意見。

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及周总理报告中对我国肃反运动所作出的总結性的論断，从四川的肃反工作看，是完全正确而符合于实际情况的。

自一九五五年秋开始，四川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斗争的发展基本上是正常的、健康的，获得了巨大的成績。我們肃反的巨大成績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首先是查出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截至一九五七年四月止，全省清查出来已經最后定案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共五千三百多名。同时，在去年开展的政治攻势中，至十二月底，据不完全统计，全省投案自首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有一万多人。在查出的一大批反革命分子中，有一批是隐藏較深，血債累累，罪恶和民憤极

大的。如在重庆航運部門中查出来的职业特务夏惠中，是双手沾滿鮮血的“上饒集中营”的“夏区队长”。成都查出的陆剛，是貴州盘县长长期通緝在案的匪“中国反共抗俄同盟軍滇桂黔縱队”大队长。平武县卫生院潜藏着的一个人重大反革命分子，是蔣匪委任的青海“綏靖司令”，这次才被查了出来。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查获的这批反革命分子中，有些已混入共产党內或共青团內，有的且已窃据了领导职位。如曾任簡阳县人民檢察院檢察长、中共簡阳县委委員、监委書記等职的雷丕荣，原来是一个在一九三七年即殘杀过农民的惯匪。又如一九五二年即任中共荣县县委組織部副部长的李会坊，这次查清了原来是一个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出卖了五个黨員、为日寇搜集我八路軍情报的叛徒、汉奸。經過肃反运动，把这一大批劣凶极恶的暗藏的敌人清查出来，大大純化了革命組織，同时教育了广大群众，提高了他們的社会主义觉悟与政治警惕，划清了敌我界限。这不仅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而且大大推进了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发展。

一九五五年秋开展的大規模的肃反运动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来进行的呢？它是在五大运动取得胜利、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前夕的情况下进行的。即是說，过去的五大运动，特别是过去的社会鎮反运动，虽然曾經直接給了反革命分子以严重打击，但不少隱藏較深的反革命分子是漏了网的。而这一批反革命分子眼看中国革命就快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时候，他們为着进行其垂死前的掙扎，于是从各方面来进行瘋狂破坏。因此，当时的情况是面临着这样的一种課題，就是必須彻底解决敌我矛盾，打击和粉碎敌人的破坏活动，为三大改造鋪平道路，为順利地推进和完成社会主义

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奠定基础。因此，一九五五年秋开展起来的肃反运动，实际是以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猖狂进攻为开端，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次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这是一场严重的解决敌我矛盾的阶级斗争。运动是以人民获得了巨大胜利，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力量被基本肃清而结束。

如上所述，四川的肃反运动和全国其他省区一样，获得了巨大成绩，但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偏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有个别斗争过火的情况，即是捕了某些可捕可不捕或完全不应该捕的；另一方面，也有应捕应判应关而未捕未判未关的。必须指出：以上这种缺点和偏差的发生，虽然严格地从肃反工作要求讲是有损失的，但总的说来，成绩是非常巨大的。而且关于前一种性质的缺点和偏差，有的在发现后即已及时作了纠正，特别是经过去年的大检查，绝大多数存在问题的案件都已作了处理，或继续在复查处理。后一种性质的缺点和偏差，只要我们不麻痹大意，一些漏网的反革命分子，终究是逃不出人民法网的。总的说来，成绩是主要的、巨大的。这一事实是毫无疑问和不容否认的。可是，我们对于中国肃反运动成绩是主要的、基本的这一实事求是的结论，是否能与少数右派分子如章伯钧、罗隆基及其在四川的代理人潘大逵等在看法上取得一致呢？从过去，特别是从最近一个多月来，在四川所揭发出来的右派分子的思想言行看，却得出了两种完全相反的看法和相反的结论。这种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结论表现在那些地方呢？

首先是我们认为我们几年来的肃反成绩是主要的、巨大的，而潘大逵等右派分子们则认为搞糟了、搞错了，不知错

捕、錯关、錯杀了多少人，因而他們認為肃反工作中的錯誤与偏差是主要的，而且是带全国性的。如罗隆基在成都視察工作时即曾对潘大逵、范朴斋等說过“胡风案件搞錯了，胡风并不是反革命”等話。罗隆基这样的看法，潘大逵、范朴斋等是同意的。四川省民盟常务委員韓文畦同样在指責和誣蔑我們肃反工作的許多作法是“違反”宪法的。如他說历史运动都是凭一部分有权力者的“大胆怀疑”、“随心認定”，而对“自己不相信的公民”（包括反革命在內）擅行扣押、侮辱，侵犯人身自由。“只有一部分拥有特殊权力、可以疑人而不受疑的人，才能免于这种惶恐”。因此，他們要求对肃反运动的成績“应作重新估計”。

其次是我們認為肃反运动之所以搞得比較彻底和能够获得巨大的成績，主要是采取了在党和政府的統一领导下，将公安、檢察、法院等业务部門同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綫相結合。而这一路綫之所以比較正确，在运动发展中少发生偏差，这不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特別聪明，而主要是他总结和发展了中国近几十年来革命斗争中的肃反經驗。但潘大逵等右派分子，則認為党领导肃反工作是不合法的，对肃反运动和肃反工作中的群众路綫，他們也是反对的。而且有的人認為肃反工作之所以容易发生偏差和錯誤，主要是由于群众“無知”（意指沒有法律知識，有的人認為“干部沒有相当文化基础，不能分別好人坏人”）和易于发生“偏激”的情况所造成的。而他們的所謂偏差和錯誤，不仅是認為某些群众性的斗争“过火”了，“扩大化”了，而且把群众性的小組說理批判、小組思想檢討等看成是“私設公堂”，或把群众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对于被批判的人进行善意的临时

性的陪同居住叫做是“私設監獄”。这种种恶毒的誹謗和造謠的目的，不仅在于企图使肃反运动离开群众的依靠和党的领导，使运动展开困难，斗争無力，不能准确、有力地打击敌人，而且也在誣蔑群众，誣蔑党，并企图挑撥党与群众、党和政府等三者互相之間的正常关系。右派分子这种用意是十分險恶的，我們决不要上当。

再次是对于肃反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偏差，我們曾經是一再的肯定要进行复查糾正，而事实上也是完全本着党和政府“有反必肃，有錯必糾”的方針，并通过有关部門进行不断的檢查和糾正的。而且特别是經过去年对肃反工作进行了全面大檢查之后，过去肃反工作中所存在的問題，已經基本上获得解决。但右派分子对于这一問題的看法怎样呢？他們是完全处于恶毒反对者的地位。他們不但不相信党和政府能“有錯必糾”，而且他們既認定肃反工作中的缺点和偏差是主要的，那么他們的另一个阴谋詭計，即关于組織“平反委员会”的問題，就必然要随着提出来。四川右派分子潘大遠把罗隆基所設計的“平反委员会”在四川翻版，而且更有創造性地把“平反”的范圍扩大了，他不仅主張要为一九五五年在机关肃反工作中所謂被“冤屈”了的人“平反”，而且主張对于在“三反”、“五反”及历次运动中所謂被“冤屈”、被打击和被斗争錯了的人都要“平反”；他不仅主張对话的人要“平反”，而且对于死了的也要“平反”；不仅对于被镇压者要“平反”，而且对于畏罪自杀者也要“平反”。以潘大遠为首的四川民盟中的右派分子們，为着要达到其否定成績，并促其“平反委员会”組織的实现，潘大遠是非常羨慕和称赞黃紹竑在浙江檢查肃反工作中否定成績、扩大缺

点的办法，而且决心要效法他，也要在四川检查出有关肃反工作的严重错误来。特别是潘大逵等认为否定肃反成绩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他们就趁着党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的机会大放厥词，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为借口，来掩盖他们反对过去我们解决敌我矛盾的种种措施，在这个企图下，他们布置了一套所谓“摘帽子”“解围”“保险”等口号；并采取个别访问、请客吃饭和召开座谈会等方式来专门发动对党对政府有意见的人进行大鸣大放，并把他们不满的意见汇集起来，传扬出去；同时发动这些人起哄，用种种手段孤立、打击过去肃反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形成所谓社会舆论的压力，来企图孤立党和损害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并达到潘大逵所谓“平反机构一定要成立”的目的。罗隆基在四川民盟中的一些心腹，专门在各大专科学校收集了这一类性质的“检举”和“控告”信一百多件，这就是他在党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所提出来的组织“平反委员会”的依据的一部分。而在最近所揭发出来的四川民盟右派分子的赵一明、舒军和李康等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就是根据罗隆基、潘大逵等这种意图来部署工作和进行工作的。

以上种种，就是四川右派分子同我们对于肃反问题的一些完全不同和对立的想法。为什么有这两种不同的看法呢？同时右派分子企图抹杀事实，夸大缺点，否定成绩，反对肃反运动中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以及主张成立“平反委员会”的目的和意图又是些什么呢？很显然，任何思想、主张与言行，都是一定阶级立场和阶级观点的反映。全国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和一切爱国人士之所以积极赞成和拥护党和政府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政策，并实事求是地

承認肅反成績的巨大，主要是因為他們過去曾經長期受過地主、官僚和特務反革命分子的嚴重壓詐摧殘與迫害，所以他們能夠明確地站穩無產階級和人民的立場，同一切違反人民利益的思想言行作鬥爭。鬥爭的目的也是非常明確的，即主要是為了保衛人民革命的果實，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和保衛社會主義建設的利益。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之所以要否定肅反成績，夸大缺點，並要為所有所謂被“冤屈”被“鬥爭”的人“鳴不平”，雖然他們在表面上裝起一付“悲天憫人”的偽君子面貌，但是他們背後所隱藏的階級立場，即代表右派集團利益來進行反黨反人民和反社會主義的反動階級本質，實際上已經完全暴露出來了。正是由於右派分子們的反動的階級立場是站得非常穩的，因而他們對於黨、政府和人民的肅反政策的勝利，實際是採取極端仇視的態度的。他們很清楚地知道人民民主專政的日益鞏固和一切殘余反革命分子的被肅清，實際是意味着資本主義復辟的社會基礎的被毀滅。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右派分子們的企圖否定肅反成績，並主張進行全面“平反”的目的，主要在於保護少數右派分子所代表的階級利益來反對黨、反對人民民主專政，企圖代之以資產階級的民主和資產階級的專政。因此我們對於右派分子企圖否定肅反成績和提出“平反委員會”的主張，不能把它孤立起來看，實際也就是章羅聯盟的政治綱領中所提出的“政治設計院”以及所謂“兩院制”、各民主黨派輪流執政和取消學校黨委制等的許多荒謬主張的組成部分之一。

最後，我還要簡單談一談目前敵人活動的情況。我們四川也同全國各地一樣，三大改造雖然已經基本完成，剝削制度已經基本消滅，所有殘余反革命分子，在經過幾次肅反運

动之后，虽然他的主要力量已經基本被肃清的估計是正確的，但是这不等于沒有反革命了。根据最近各个地区的情况看，無論在城市或农村，敌人的破坏活动仍是在不断发生着。如去年沐川县利店乡在肃反运动后不久，就有几个反革命分子糾合十余人組織“大刀会”，发劲暴乱，侵入五馬坪农場，杀死两个干部，并在利店乡杀死杀伤干部、群众三十多人，燒毀房屋数十間。巫山县反革命分子陶发藻伙同其弟，把檢举过他的陶惠达全家四口活活打死。今年春天梓潼县金龙乡还破获了反革命分子涂南亭糾合四百余人阴谋組織暴乱，妄想打到北京来当“皇帝”案。目前有些地区又发现反动会道門的复辟活动，刑事犯罪活动亦有增加，派遣特务和新出現的反革命分子也有所发现。特别是自整风运动以来，各地漏网殘存的反革命分子，以及部分未获得改造的地主富农分子，也在利用大鳴大放的机会来进行造謠破坏，农村中且有个别反动地主开始向农民进行倒算和企图收回已分的土地。鉴于敌人以上的种种活动，不仅証明了过去的肃反运动完全是必要的，而且也証明了自去年三大改造完成之后，虽然人民内部矛盾突出来了，但是絕不能因此而对敌人的活动与破坏丧失警惕。目前在我們思想上存在的主要傾向，不是对于敌人打击得够了，而且由于松懈麻痺，对敌人打击得不够。根据以上情况，我認为在目前肃反工作中，必須認真地注意解决以下两方面的問題：第一是“有反必肃”的方針必須坚持与貫徹，絕不能因为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放松了对敌人的斗争，特别是某些利用人民内部矛盾出現，而实际是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极其狡猾的敌人，更要善于区别，而加以准确的打击。第二是为了更好地巩固肃反运动的

成績，通过整風檢查工作，特別是我們必須响应和执行毛主席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国务會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講話中有关肃反工作，应在一、二年內进行一次大檢查的指示。通过大檢查深入一步地揭露我們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偏差，这对于更好地貫徹“有錯必糾”的方針是有利的，我們必須坚决地加以貫徹的。

各位代表，五大运动的胜利，为三大改造鋪平了道路。肃反运动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主要組成部分。不能設想，沒有肃反运动的巨大胜利而能够順利完成三大改造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設。右派分子今天利用肃反問題来向党向人民进行攻击，企图达到他們动搖革命运动成果、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目的，这是絕不可能的。目前，右派分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阴謀已經大暴露，全国人民同仇敌愾，坚决向右派分子进行斗争，我們必須乘胜追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我相信，胜利是屬於人民的。彻底粉碎了右派分子的阴謀，扫清这些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社会主义建設就将更加大踏步的前进！

肃反运动的偉大胜利

欧百川的发言（摘要）

我省肃反运动，由于坚决貫徹执行了“有反必肃、有錯必糾”的方針，充分发动了众群，已取得了偉大的胜利。在肃反斗争过程中，由于群众对反革命分子的义憤，斗争了极少数虽有罪恶，但可斗可不斗的人，甚至錯斗了个别完全不

应斗争的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同时，一经发现就坚决作了纠正。但是，在已经结束肃反运动的地方，有的单位还发现了有漏掉的反革命分子，据贵阳市市級机关的检查就漏掉了十三个反革命分子，如贵阳市粮食局反革命分子張連安，解放后当土匪营长，杀害革命干部三名，于一九五二年鎮反时改名換姓，伪造历史，混入粮食局做工人，假装积极，后被提为干部，該局在肃反运动结束后，才发现他的真实姓名，經調查证实他是一个有血債、有民憤的反革命分子；省化工公司反革命分子賀鈺河，抗战时曾参加我游击队，后投敌叛变，充当日伪汉奸和密探，由于他告密致使革命干部和农民七人殘遭日寇杀害，也是在肃反运动结束后才发现查出来的。又如省統計局反革命分子何运寿，解放后参加土匪，刺探軍事情报，搶劫粮食仓库，任意毆打农民，群众极为憤恨，肃反斗争结束后錯誤的将其平反，平反后引起了机关干部和当地群众极为不滿，最后才經司法机关依法进行处理。这就充分說明了，經過肃反斗争，反革命分子虽已基本肃清，但是，事实証明反革命分子是非常狡猾的，还有漏掉的反革命分子未完全彻底肃清，建議中央公安、檢察有关部門，对这种情况要特別重視。我們应当繼續保持高度警惕，繼續貫徹执行“有反必肃、有錯必糾”的方針，彻底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保障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順利进行，在肃反斗争中，有些右派分子大喊大叫，他們說“肃反搞錯了”，“大部分斗錯了”，甚至說“百分之九十以上斗錯了”。这完全是顛倒是非的胡說，我要問这些右派分子，你們为什么对漏掉的反革命分子一字不提？难道你們想要多保留点反革命分子才好嗎？你們居心何在？你們不可告人的陰謀，我們各族人民

是絕不能容許的，對於反革命分子，我們要堅決全部徹底肅清，鞏固人民民主專政，保衛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事業。

社會主義司法制度在健康地成長

劉文輝的發言

我完全同意周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以及李副總理、薄副總理、張檢察長、董院長、彭副委員長的各項報告。

這次我在四川視察的是有關司法的各個部門，先後視察了司法廳、高級法院、檢察院、公安局、法律顧問處、公證處以及看守所、監獄、勞改印刷所等處。現在把視察所得的真實情況和自己的——點體會作一個簡略的報告。

在視察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人民陪審制度。人民陪審員絕大部分由人民群眾直接選舉，少部分由機關、團體、企業、工廠等推選。四川一省現已發展到四萬零七百二十九人，成都市現有一千一百七十四人。他們在兩年的任期中，每年輪值，城區十五天，郊區十天。他們的代表性是非常廣泛的，代表着各階層各種不同的職業，直接參加法院的審判工作，協助法院有力地打擊了反革命，制裁了刑事犯，保障了人民的正當權益。根據我們實際觀審與召開陪審員座談會的反映，不僅陪審員得到應有的尊重，實現了與審判員同等的權力，並且各陪審員都能勝任愉快。雖然其中有的文化較低不能閱卷，但經法院和審判員的幫助，都能明了案情，提出意見，並且因為他們來自民間，熟悉民情，與群眾有密切

联系，便于了解情况，調查事实，不特使审判更加正确，同时在群众中扩大了遵守法制的影響，教育了群众对法律的認識，減少了群众的犯罪和糾紛，起到了預防犯罪和糾紛的作用。这些都是有活生生的事实为証，为了节省時間，我只举一个例子。成都东城区的一个地段，在短時間內接連就有七个离婚案。陪审員找到当地調解委员会、邻居和群众詳細了解，再同审判員分析研究，認為主要由于生活情况引起，加上法律观念不强，夫妇間稍有爭執，便告到法院要求离婚。因此陪审員建議，选择一案就地公开审判，并进行教育。审理終結，認為条件不够，不能离婚。当时参加的群众有二、三百人，大家都滿意，認為处理恰当，其他六案自动撤回。另外有些夫妇不和的居民也就从此和好了。

其次，人民律师的职务，現由初办的法律顧問处来担任，不特便利人民，帮助提高审判力量，并且也是对公民守法宣傳教育的有力助手，也是減少糾紛、防止犯罪、加强人民內部团結的有效方法。例如成都市去年就有四百一十五件詢問的当事人，經過解答后，即自动地不进行訴訟了。在預防糾紛方面，公証处也发生了一定的效力。

各級法院、檢察院、公安部門在互相制約、互相監督上，基本上完成了各項組織法和逮捕拘留条例所規定的任务。如公安部門除及时打击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使一年来的破坏和破坏嫌疑事故下降百分之八十二，各类刑事案件下降百分之四十三点六外，一般做到依法办事，接受檢察院的偵察監督。檢察院在实行各項監督的职务上，也能实事求是。例如去年四川全省公安部門提請批准逮捕者为二万七千三百九十五人，檢察院根据政府肃反工作的更加寬大的政策，

仅仅批准逮捕九千二百四十人。高級法院对死刑复核八十九人，也因为根据新的宽大政策，只核准十九人。这就一方面說明互相制約、互相監督的認真实践，另一方面說明各級有关司法的机关貫徹了实事求是的法制精神。我們目睹高級法院对于死刑复核各方面都表现出非常慎重的态度，案情的一枝一节都經過反复推敲，务求达到于事、于理、于法皆不違背。

就劳动改造來說，主管監獄及劳动改造机关的同志，基本上是根据“教育第一，生产第二”的原則来进行改造，并且按照具体的可能性来分配劳动。关于老、弱、病、殘、女犯等不能劳动的，四川于去年底給予假釋、提前釋放、保外就医、監外执行的已达三千六百六十人。我們此次所見的各監獄及劳改印刷所，在医疗卫生及生活待遇等方面都是真正得到妥善的照顧。而劳改的人犯，不仅由不会劳动而变为熟練劳动的比例很大，并且經過懲办与改造相結合和劳动生产与政治教育相結合的措施，絕大多数都認識了自己的罪惡，放棄了反革命的立場，除揭发反革命綫索，交出隱藏的武器而外，还紛紛提出生产上的合理化建議，經有关部門向全省推广的就有三十一件。还有不少的犯人，刑滿后申請仍然留在原劳改单位作为职工，这就可見劳改的人犯都是很愉快地在进行适当的劳动。

自从宪法、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逮捕拘留条例等等法律先后頒布以来的短时期內，有关司法各部門的机构和制度都已迅速地建立起来，并且生气勃勃地在逐漸成长。以上种种成績，除了別有用心的人而外，無論何人，都是不会加以否定的。

但是同时也还存在着一些缺点。例如有些干部还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四川全省司法干部受过法律专业训练的只占百分之三十六点二。全省检察干部二千四百五十九人中，受过专门法律教育的只一百八十六人，受过短期业务训练的仅四百六十人。一般感觉到业务生疏，法律知识缺乏，因而影响到审判的质量，例如高级法院受理上诉的已结案件：维持原判的刑事案仅占百分之二十六点五，民事案占百分之四十四，处理申诉案发回再审判的刑事案占百分之四十六点六，民事案占百分之三十点七，再审案件刑事改判无罪的占百分之三十。并且审判的速度也不太高。所有这些缺点都是应当努力改善的。

尽管我们的人民司法工作还存在着一些缺点，但是如果拿来和旧社会的司法情况相比，那就真有天渊之别。“衙门向南开，有理无钱休进来”，这两句话就把解放前几千年的司法情况给予了一个总的评价。不说剥削阶级的法律，本来就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只说当时司法机关的贿赂公行，官官相卫。今天贪污卖案的情况已经完全绝迹，就是我们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这个铁的事实。过去很多律师的唯利是图，择肥而噬。今天的律师们已经基本上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成为加强法治的有力助手。过去监狱里黑暗残酷的情况，这是人人尽知的。而今天我亲眼看见一般监狱和劳改的人犯，一个个不但精神饱满，体格坚强，并且没有文化的还学到文化，没有技术的学到技术，大家都说：“我们不是在坐监，我们简直在住学校。”至于今天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精神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更是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事情。

但是目前，整风运动中出现了一股逆流。有些右派分子

故意在找寻司法工作中的一些錯誤，故意在夸大司法範圍內的一些缺点，說成是“無法無天”，形容成“一團糟”，這簡直是對全國辛勤誠懇的司法工作者進行挑釁式的誣蔑。這些人的意見，不是從六億人民的利益出發，不是從黨群團結的願望出發，不是從客觀存在的事實出發，而是別有用心，企圖否定一切成績，削弱黨的威信，以便取消黨的領導，把人民從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拉回頭去走向資本主義的死胡同。這不但為絕大多數的人民群众所不容，就是去問勞改犯人，他們也會異口同聲堅決反對的。我對於這些右派分子，沒有別的話可說，只是希望他們“臨崖勒馬”，不然就“後悔莫及”了。

至於有些同志從改進工作的願望出發，提出應當加強法制的意見。我認為這種意見基本上是正確的，而且是適時的。但是如果過分強調地說，我們國家機關幹部——首先是黨員的缺点和錯誤都是由於沒有完整的成文法律和司法制度所產生的，好象在建國之初，如果早有一套完整的成文法律和司法制度，也許絕大部分的缺点和錯誤都將不會產生。我認為如果有這種看法，那是很不正確的。

首先，我認為黨員干部的缺点和錯誤產生的原因主要是兩種：一種是舊社會遺留下來的非工人階級思想不斷地向他們侵襲，一種是他們自己的努力不夠，不能適應客觀新形勢太快的發展。至於沒有完整的成文法律和司法制度却絕對不是產生缺点和錯誤的主要原因。

其次，我們應當知道，在建國之初，就不可能有一套完整的成文法律和司法制度。大家都知道，法律制度是上層建築，新的上層建築是隨着新的基礎——生產關係的總和的發

展而发展的。我国在三大改造沒有基本完成以前，新的基础还没有完全奠定，因此只能依据客观情况陸續制訂各种法規，如土地法、婚姻法等，不可能产生整套的完备的成文法典。这些上层建筑也不能象变戏法一样眨个眼睛就可以变出来的，都有它們各自产生和成长的条件和規律。现在就我这次視察到的人民司法工作有关各部門的情况来看，我認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正在健康地逐漸成长。至于完整的成文法典，在不久的将来也会逐步地和全国人民見面。当这些新的上层建筑一旦产生和成长起来，它就要成为最大的能动力量，积极帮助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也就是說积极帮助社会主义的經济基础很快地形成和巩固起来。因此，我对于司法工作和法律科学对于社会主义建設的前途，都是满怀信心和非常乐观的。

駁斥右派分子污蔑肃反 的謾言

評肃反“糟得很論”

石小租

肃反运动是大鳴大放中右派分子攻击得最凶的一个方面。好象有誰触破了他們头頂上的疮疤一样，特別有股勁兒，面紅耳赤，厉声嘶叫，罵肃反运动“糟得很”，“根本談不上成績”。有的人干脆說：压根兒搞肃反运动就是“錯誤”的。

好个右派分子！按照你們的“邏輯”，好象根本就沒有什么反革命分子。既然如此，搞这么大个运动，岂不多事？

“搞了这么久，有的单位也不过查出几个来，有也微不足道。”这种調兒，我們的馬哲民先生、艾瑋生先生，在大鳴大放中唱得特別响。

誰都知道：我們革命，反革命分子反对革命。这是势不两立的两家。我問你們——打扮得十分“善良”的先生們，查出来多少反革命分子为多？难道反革命分子破坏革命事业，能用百分比計算嗎？一顆炸彈并不多，可是它能結束多少人的生命。你們右派分子也不多，却在這次鳴放当中兴风

作浪，魚龙混雜，几乎鬧昏了一時晴朗的天氣。我們清楚：這個淺鮮的道理，你們決非不懂，不過一件事情兩種看法，你們別有用心罷了。

在人民看來，全省肅清了數以千計的各類反革命分子，純潔了國家內部，保障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安全，這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的事情；肅反運動中，將一部分人的政治歷史問題弄清楚了，使國家和人民更加信任他們，這也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的事情；有個別的单位，沒有查出反革命分子，弄清了機關的政治情況，這是合乎情理的，也是好得很的事情。當然，運動中有缺點，甚至有某些錯誤，問題是如何認識這些缺點和錯誤。右派分子撇開成績不談，一味誇大這些缺點和錯誤，血口噴人，說“搞錯了很多的好人”說“六親不認”了等等。先生們！真的是這樣嗎？你們作過分析沒有？什麼叫錯？難道說對有些按照國家懲治反革命條例，應判定為反革命分子，只是後來因為政治形勢起了變化，政策界限放寬，而沒有作為反革命分子處理的人，運動中鬥爭了他們就算錯了嗎？難道說，對某些在平素言行十分反動，運動里又有人檢舉、揭發他們，群眾批判了他們的反動思想，審查清楚他們的問題，不應該嗎？難道說，對有些反革命歷史，運動前他們沒有交代或沒有交代清楚的人，運動中嚴格審查他們的問題，最後實事求是的給他們做結論，算錯了嗎？這就是“搞錯了很多人”嗎？為什麼這些事實你們避而不談，而那麼熱中于誇大、捏造工作中的某些缺點和錯誤，居心何在？不是一戳即穿嗎？“六親不認”，好吧，我倒要問你們，“親”應不應分個界限？“認”該不該有個立場？倘若老子是反革命，兒子革命，“不認”

有何不好？我看，不但不認，而且还应檢舉他。

“高貴”的先生們！說老實話，你們這套“邏輯”並不是什麼新奇的東西，人民一下子就識破了的，人民和你們並不陌生，也共過事的。在你們當中，有人昨天還腰掛指揮刀，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今天看到了反革命分子的魔爪被斬斷就兔死狐悲起來。怪不得有的人要為反革命分子“招魂”，為反革命分子“含淚控訴”，“爭自由”，“爭民主”，口口聲聲喊着要“雪仇”，原來如此。

你們的狐狸尾巴露出來了。前些日子不是還翹得很高嗎？怎麼現在又想夾起來了。休想！把你們葫蘆里藏的葯全倒出來，讓大家看個明白，究竟你們在搞什麼鬼。

（1957年7月15日湖北日報）

肅反運動搞糟了嗎，

高炳文

最近，有一批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借口幫助共產黨整風，發表了不少反黨反人民的謬論，說什麼“肅反運動搞糟了”，“肅反不知冤枉了多少好人”，“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我參加過肅反運動，而且是搞肅反的工作人員。我不準備從理論上來駁斥右派分子的這種謬言，我要以鐵的事實來反擊右派分子對肅反運動的污蔑和攻擊。

“肅反運動搞糟了嗎”？“沒有成績嗎”？從杭州市人民委員會房地產管理處的肅反運動情況來看，就有力地駁斥了右派分子的這種謬論。

房管处在肃反运动中，清查出了三个暗藏得很深的反革命分子。如前材料组组长虞洪兴，就是一个现行的反革命分子。解放前，他充任伪乡长，强征暴斂，积极参加圍剿我四明山区三、五支队的战斗，强迫群众修建碉堡、了望台，阻撓我軍解放贵古林。解放后，繼續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参加国民党“浙东行署鄞西区署”，任联络情报站站长，搜集我軍、政情报向匪部汇报，并要匪部搶劫宁波貿易公司运往宁波的軍粮。鎮反前夕，虞洪兴改名潜逃上海、杭州，做菜販和油行跑街，后来混入浙建公司当工人、中队长，一九五二年又混入了房管处。肃反运动中才将他清查出来。

又如前房管处副处长周庆紹，是鑽到我們肝脏里来的反革命分子。他在一九四三年曾充任伪乡公所乡丁、敌人官墩据点的負責人，依仗敌勢，毆打农民，强搶民粮，霸占有夫之妇，奸污妇女，勾結敌人逮捕我地下党员。群众极为愤恨，在当地有“小朝廷”之称。一九四五年假造历史，混入革命組織，伪装积极，窃取了专署基点乡乡长、杭州市环境卫生管理处清卫大队长、房管处副处长等重要职务，暗地里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包庇、安插反革命分子。这个罪恶累累的反革命分子也是在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中查出来的。

运动中，也确实有少数人一度被群众怀疑和追查过政治問題，但这是因为他們的政治历史問題沒有向政府交代清楚。經過調查以后，都給他們做出了恰当的結論。这些同志看了結論后，激动地說：“国民党把我引入罪恶的火坑，共产党挽救了我，党的恩情，終身难忘。”有的甚至感动得流泪。

事情象清水一样，肃反并不是搞糟了，也决不是庸人自扰，清查出来的是一些有罪恶、有民憤的反革命分子，也就

是蔣介石吹噓要“反攻大陸，大陸上還有那麼幾百萬部屬”的那些人，並不是那些為反革命喊冤的先生們所謂的“好人”。真正的好人並沒有受到冤枉，而是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敵我教育，敵我分清了，警惕提高了。

有的人說：“幾個毛孩子，還會不出偏差？”的確，房管處的肅反幹部中大部分是“毛孩子”，不過這是經過了黨八、九年來的教育，立場堅定、愛憎分明的“毛孩子”，比起那些嘴上長胡子，信口雌黃別有用心的右派分子，却懂事得多哩！共青團員章美霖是一個從工廠中新提拔起來的工人幹部，是個“毛孩子”。他在肅反中調查反革命分子虞洪興的案件時，從一個微小的線索中，跟蹤追查，發現了反革命疑點。在嚴冬大雪飄飄的日子裡，爬山涉水，下鄉調查，終於將反革命分子的身份和罪惡全部清查出來。由於他工作中的艱苦與負責，受到了群眾的愛戴，並且今年被評上了杭州市機關青年積極分子。

上面所講的是本單位的一些事實，事實究竟是事實，就象在白紙上寫了黑字一樣。人們都清楚地看到：沒有一九五〇年的鎮反，人民政權就不能鞏固；沒有一九五五年的肅反，國家的建設就不能順利地進行；不肅清反革命分子，人民的幸福生活就沒有保障。那些夢想一筆抹煞肅反成績的右派分子，將在事實面前碰得頭破血流。

從這些事實里，也粉碎了那些開口“肅反搞糟了”，閉口“冤枉了好人”的右派分子的謠言，把他們假借幫助黨整風來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人民民主專政，反對社會主義的真面目揭露無遺。

（1957年7月9日杭州日報）

对反革命分子必须实行专政

辽宁省司法庭 尹惠统

右派分子为了从根本上否認肃反工作的必要，竟恶毒地說什么肃反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扰之”！意思是說：本来没有什么反革命，偏要来个肃反运动，岂不是糊涂蛮干嗎？因此，到底有無反革命分子可肃？是必須回答的一个根本性問題。我是从一九四九年开始做人民司法工作的，曾經参加过两次大规模的群众性镇压反革命运动。一次是在一九五一年；一次是在一九五五年。据我体会，所以要搞这两次鎮反运动，是敌我斗争形势的客观需要所决定的；也可以說是由于当时敌人的破坏活动十分猖狂，逼得人民要求政府給他們撑腰，向敌人实行专政，镇压反革命分子。一九五一年的鎮反运动的前夕，正是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朝鮮战争，台湾蒋介石反动集团大叫“反攻大陆”之际。当时潜伏在我国大陆上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分子，妄想美蒋“卷土重来”，乘机从地下伸出头来，到处糾集一切反动残余势力，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活动。东北地区公安部門一九五〇年仅破获美蒋特务武装匪团分子就有三千七百九十四人，剿灭了政治股匪、散匪一千七百四十九人，繳获长短枪支六百五十二支。……这些土匪特务爆炸放火、放毒暗害、伺机叛乱、搶劫杀害人民，無惡不作。我还記得当时农村中有不少恶霸地主，又“拿起文明棍，抖起威风”，明里暗里向农民翻把倒算、

杀害农会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也乘机造謠，煽惑群众，发展反动組織；有的竟“定出国号”登极坐殿，自封“皇帝”，組織武装，待机叛乱。試問：在人民的天下敌人竟如此明目張胆地进行破坏活动，怎能叫做“天下本無事”呢？人民政府为了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安全，保卫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运动的顺利进行，根据人民群众的要求，对反革命分子依法逮捕、惩办，又怎能叫做“庸人自扰”呢？

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正在我国处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时期。这时一切反革命残余势力看到：一旦讓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城乡资本主义剝削制度，就把反革命分子賴以生存的社会基础根絕了。所以敌人又重新抬头，针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标，無孔不入地进行暗害活动；而且是采取两面派手法，更加隱蔽、更加暗險、更加狡猾。这就出現了一九五五年反革命破坏活动十分囂張的局面。例如：在农村有不少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鑽入合作社内部，用两面派手法，挑撥离間，造謠生事，杀害牲畜，毀坏庄稼，杀人放火，企图瓦解合作社。众所周知的沈阳市西郊大榆树村反动富农邢德昌等惨杀合作社干部李景云全家八口人命的血案，不是明証嗎？在城市工矿企业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在生产中故意以配錯料，使产品报廢，拆毀机器，破坏生产計划和設計图紙，以及放火、爆炸等手段，破坏生产上的重要設备、重要部位，来阻撓国家工业化事业的进行。例如：复县人民法院判处的反革命分子陈耀輝，一九四八年当蔣匪警察巡官时曾捕杀我軍担架队員一名，一九四九年隱瞞罪惡，混入华銅矿，騙取信任后，披着“技术員”外衣，多次惡意利

用技术破坏生产，损害国家财产甚巨，并险些造成工人伤亡事故。类似上述反革命破坏案件是不少的。根据辽宁省各级人民法院受案统计，可以看出：一九五四年全省各级法院受理反革命案件只占同年全部刑事受案的百分之三·七，而一九五五年则上升为百分之十九。一九五五年比一九五四年平均增涨五倍多。这些反革命案件中虽然不完全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有严重罪恶、民愤很大、拒不坦白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但这也足以证明敌情是严重的，反革命活动是比较猖狂的。法院收理的上述案件经过审判查明，绝大多数都是证据确凿、罪该判刑的反革命分子，这有保存在法院的案卷可做凭证。试问右派分子：全国人民针对敌人如此猖狂活动的事实，开展了一个肃反运动，再给敌人一个狠狠地打击，以保卫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这怎么能叫做“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呢？右派先生们！难道你们果真不了解这些铁证如山的事实吗？你们不是故意歪曲事实、恶毒的辱骂党和人民政权又是做什么呢？

彭声汉等右派分子说什么：肃反是“没有人性”“不人道”“向人类道德进攻”真是说得振振有词。到底是谁“没有人性，不人道，向人类道德进攻”呢？恰恰是那些双手沾满鲜血、罪恶滔天的反革命分子！让我举一个例子：就在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六日，沈阳市皇姑区辅仁街南三巷十号住宅，有一个特务分子名叫高振鹏，干了不可告人的特务活动。一日他妻子翁振良看他可疑，劝他“你要有事就赶快向政府坦白吧！”高犯怕露出马脚，竟下了毒手：先砍死了正在酣睡中的他的“至亲骨肉”——两个小女孩，又砍死了平素体贴和关怀他无微不至的妻子翁振良！看！反革命分子的

心是多么狠毒！他們为了反革命不惜杀妻灭子，灭绝人性！人民政府对这样反革命分子逮捕惩办，怎么叫做“沒有人性，不人道，向人类道德进攻”呢？当地人民群众一提起高犯杀妻灭子的惨状，都说：“把他千刀万剐也不解恨！”这说明在善良的人民大众看来，反革命分子危害国家，杀害人民的罪行，才是灭绝人性，惨无人道；肃清少数反革命分子，保护大多数人的幸福生活，才是真正体现了广大人民的人性，是革命人道主义的表现。記得在一九五一年鎮反运动中，我到营口县看到几百人集会高举着紅旗，敲着鑼鼓，給人民法院送上一面錦旗，上写“感謝人民法院鎮压反革命，为民除害，为民作主！”这不很明显嗎！为什么同样一个肃反运动，在广大人民群众看来是“有人性，講人道，为民除害”的好事，而在右派老爷們的眼里却变成了“沒有人性不人道”的坏事了呢？問題在于所謂“人性”“人道”，在階級社会里不同的階級有它不同的主張和看法。一切反动統治階級、地主、恶霸、官僚、軍閥向来把剝削、殘害人民的勾当，叫做有人性，講人道。他們講的是“仁义道德”干的是“男盜女娼！”而人民大众向来把反抗剝削者的压迫、人民之間的友爱团結，看成是自己的人性和人道。这就說明一件事情是否合乎“人性、人道”，决定于你是站在那个階級立場上来看待。右派分子站在反革命立場上来看肃反工作，当然就会得出“不人道，沒有人性”的結論了。

大家知道，蔣介石反革命集团，为了反共反人民，曾經采取“宁肯錯杀一千，也不放掉一个”的政策来血腥地鎮压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而我們人民政权对待反革命分子并不是一律杀掉，而是实行“惩办与寬大相結合”的政策。經人

民法院判处死刑的只是那些少数罪大恶极非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对反革命分子中的多数人，是依其罪恶大小、坦白悔改程度、分别判处徒刑、管制、教育释放或免于处刑。对判处徒刑和管制的分子强迫劳动改造，给予重新作人的机会。所以人民群众说：“人民政府对反革命分子该崩的崩（杀），该关的关，该管的管，该放的放，真是清如水，明如镜！”难道我们对待反革命分子采取这种“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不正是体现了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吗？要不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谁能以这种伟大的政策来对待和自己有“不共戴天”之仇的敌人呢？

右派分子说什么：“镇反、肃反都是用暴力维护革命果实，这与我国著名的‘爱民如子’，‘以德治国’……的传统思想是背道而驰的……”这是要我们对反革命分子应当“爱之如子，以德治之”，应当实施“仁政”不应当对敌人实行专政。可是人民群众从斗争中体验到：对反革命分子绝不可讲“仁政”非实行专政不可，非以“暴力”镇压不可。道理很简单：革命与反革命是势不两立的敌我矛盾，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个敌我性质的矛盾只能用专政的方法，用暴力来解决。“对敌人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

（列宁说）敌我斗争的客观事实证明了这个真理。我记得在一九五〇年由于我们不少做司法工作的同志错误地认为：

“我们革命胜利了，反革命分子还能敢怎么样！判他几年徒刑、教育一番，他们就干不了什么坏事了”。在这种“轻敌”和“仁慈”的思想支配下，对待反革命分子该杀的不杀，该办的不办，重罪轻判，犯了“宽大无边”的错误。结果反革命分子借机兴风作浪、疯狂地进行破坏活动，有些干部和群

众遭到敌人杀害。因此人民群众批评我们是“灭自己志气，长敌人威风”，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政府对反革命分子讲宽大！”人民对我们的这个批评是公道的。当我们纠正了“宽大无边”的偏向，正确地执行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政策，对坚决的反革命分子实行镇压之后，反革命势力削弱了，反动气焰下沉了，社会秩序安定了，人民的生命财产有了保障。阶级斗争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一切反动统治阶级都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和不甘心死亡的，他们必然要向人民作拚死的斗争，梦想恢复其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反动统治地位。这是由于反动残余势力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我有一次在审案中遇到一个反革命分子说了这样几句话：“你们革命真是革了我的命，过去我有钱有势，作威作福，今天我下了台，要靠劳动吃饭，我怎能甘心啊！”这个反革命分子倒很真实地说出了一切反革命分子所以要仇恨人民，仇恨革命进行反革命破坏的根源所在。因此，革命人民要想制止敌人的反抗和破坏活动，就必须对敌人实行专政，只准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事实上经过了两次肃反运动，镇压了敌人的反抗，分化瓦解了敌人，才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保卫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同时也教育了人民分清敌我界限，提高政治觉悟，解放了生产力。这些巨大成就也证明了对敌人实行专政是非常必要的，正确的。证明了对敌人是不能实行“仁政”的。

(1957年7月25日辽宁日报)

右派分子为什么攻击肃反

鳴 邦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右派分子企图在肃反問題上，从根本上抹煞成績、夸大和捏造錯誤来反对党的领导，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反对社会主义建設。在这个問題上，引起一切正直的人們的憤慨，那是很自然的事。

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使我省社会鎮反、内部肃反获得了巨大成績，仅就内部肃反而言，到目前为止，从各党政机关、各企业部門、各人民团体中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已經甄別定案的有五千七百七十多人，同时，尚有一部分人正在进行查对和甄別。在这批反革命分子中，有历史反革命、也有現行反革命、有长期潜伏的职业特务、也有血債累累的罪魁屠夫。如郑州鉄路局清查出的段双印七人中統特务小組；信阳煤建公司清查出的秦祥在抗战期間曾殘杀我革命干部达十五人；省木材公司查出的杜应山，解放前当伪鎮长时主謀杀害我农会长王結山及翻身队二十余人；省工业厅清查出的王仲一（系閩匪錫山的少将司令）曾殘杀干部、人民群众二百余人。同时，在清查内部反革命分子中，还繳出了大量的武器和証件。根据初步統計，繳出各种枪五百九十二支、机枪十挺、各种子彈一万三千五百一十发，以及許許多多各种反革命証件。所有这些鉄的事实是有目共睹的。这些成績，难道

能够抹煞嗎？难道能够毁灭嗎？

但是，对于上述事实，两种不同立場的人，有两种不同的看法；自然就会得出两种相反的結論。

站在工人階級、社会主义的立場上看，經過肃反，內部組織进一步純洁了，正氣發揚了，民憤也平息了，国家政权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加强了。一句話，这样就保證了新的社会秩序的安定，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可見，肃反是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这是不言而喻的，凡持有这种基本观点的人，自然会实事求是的估价肃反成績，从而为肃反已获得的巨大成績感到极大的滿意。而且肃反的巨大成績也极大鼓舞了广大群众建設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創造性。因此，我們應該庆祝肃反战綫上的偉大胜利。在庆祝这个胜利的时候，我們要感謝肃反战綫上的积极分子，如果没有积极分子的带头作用和骨干作用，肃反战綫上胜利的获得是不可能的。这是勿庸置疑的。

相反的如果站在反对工人階級、反对社会主义的立場上看，持有这种立場的右派分子就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他們把偉大的肃反运动視为“殘無人道”，把肃反的胜利視为“根本錯誤”，把肃反斗争視为“世界上第一流的酷刑”，把对反革命分子的懲办視为“違犯宪法”，把在肃反中党团员和积极分子誣蔑为“血手起家”，等等。这些右派分子从內心深处发出的狂言謔調，其用意不正是妄想保护反革命分子嗎？不正是旨在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嗎？！不正是要把人民仍然拉回到灾难深重的反动統治时代去嗎？！完全不錯，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这些右派分子在光天化日之下，竟說什么“肃反是根本上錯了，不是下边錯誤了，而是上边錯了”，說什

么用“肃反成績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不知掩盖了多少惡罪和錯誤”；說什么“正氣被挫傷，歪風滋長是肃反的結果”，等等。這些右派先生們的猙獰的政治面目即反共反人民的反動言行，是任何具有群眾觀點、具有愛國心腸的人都是能夠一眼看穿、能夠識別清楚的。

在肃反运动中，有沒有缺点和錯誤呢？我們的回答是：有的。缺点和錯誤，在一个廣泛的群眾运动中是不可避免的，任何時候也是不可避免的。“至善”的事、“至善”的人，今天不會有，明天不會有，永遠也不會有。但是，我們決不是以此來原諒自己，恰恰相反，我們是採取了十分嚴肅的態度，即什麼時候、什麼地方發現缺点和錯誤，就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採取措施糾正缺点和錯誤；並且一貫地力求把缺点和錯誤糾正在萌芽狀態中。我們不只隨時發現缺点和錯誤並隨時糾正，而且我黨還開展了整風運動來系統地清算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思想作風。這樣嚴肅地對待缺点和錯誤，除了共產黨以外，是任何資產階級政黨永遠不能作到的。我們對待缺点和錯誤，一向是按照變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的精神，使我們的同志在鬥爭的風雨中增長知識才干。正如毛主席指示我們說：“做得正確，得了做得正確的經驗，犯了錯誤，也得了犯錯誤的經驗”，（“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而右派分子呢？他們只是把缺点和錯誤抓到自己手里作為大肆攻擊共產黨領導的“資本”，這不是政治上別有用心又是什麼呢？！

右派分子的惡毒的攻擊，主要是集中在那些堅決保衛社會主義利益而向反革命分子積極鬥爭的同志們身上。這是很自然的。前邊說過，沒有忠於黨、忠於人民的積極分子同志

的辛勤努力，堅持斗爭，而要取得肅反戰綫上的偉大勝利則是不可能的。這一點，右派分子也很明白。正是因為如此，所以他們拼命地攻擊積極分子，謾罵積極分子，甚至要進行“反斗爭”，說什麼“血手起家”呀，“政治資本是整人”呀“違法亂紀”呀，“卑鄙無恥”呀，“血債要用血來還”呀，等等。這種對積極分子的惡意謾罵、誣蔑和攻擊，無非是要疏遠積極分子和黨的關係，無非是要打擊積極分子的斗爭銳氣，使積極分子灰心。從而進一步削弱黨的領導，削弱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這不是很明白的嗎？但是，右派分子的如意算盤是完全打錯了。他們這樣做的結果，除了使積極分子眼睛更亮，覺悟更高，在階級斗爭戰綫上更勇敢、更堅強以外，還會有別的什麼結果呢？當然，黨對積極分子的缺點和錯誤也不是因此就不聞不問了。黨還要在首先檢查責任之後，再在愛惜和保護積極分子的熱情的方針下，採取說服教育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即整風的方法，幫助他們認識糾正缺點和錯誤，接受教訓，取得經驗，增長見識。

肅反戰綫上還有沒有其他缺點和錯誤呢？還有。這就是毛主席所指出的反革命分子還有“漏掉的”這一條錯誤，右派分子沒有提出來，他們不願意提出來，也不可能提出來。這是為什麼呢？不用說，是盡人皆知的。

為了加強共產黨的領導，保證逐步建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逐步提高人民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必須向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反共反人民的反動言論開展尖銳的說理斗爭，徹底粉碎他們的猖狂進攻。這個目的若不達到，誓不罷休。

（1957年7月19日河南日報）

揭穿右派分子把肃反运动 說成是“庸人自扰”的阴谋詭計！

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于洪洋

右派分子在向党、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中，曾經大肆攻击全国人民拥护的肃反运动。他們把肃反运动說成是“庸人自扰”，說什么“反革命沒有了，你們还搞什么肃反运动，这是自我麻烦”。事实真的如右派分子所揚言的那样嗎？現在，我就法院在处理肃反案件以及肃反前反革命分子的猖狂活动等情况，与右派分子明辨这样一場大是大非：肃反运动究竟是不是“庸人自扰”？肃反运动究竟是糟得很呢，还是好得很呢？

南昌市和全国各地一样，在肃反运动中，从机关、企业内部和社会上，清查出来了一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在这批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中，有的是过去漏网、犯有严重罪恶、民憤很大而又死不悔悟的反革命分子；有的是进行各种現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有的对人民政府抱有敌意，进行以反革命为目的的破坏活动的敌对阶级分子。这些反革命分子隐藏的都很巧妙，进行破坏活动的手段也很毒辣。如参与迫害方志敏烈士的罪魁之一——反革命分子柯常琳，解放前夕就混入了民主党派，解放后，披着“进步”的外衣，隱瞞了全部罪恶历史，騙取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信任，但暗地里却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包庇和資助有严重罪恶的反革

命分子，和阻止其子坦白交代。反革命分子謝元父，解放前曾杀害过两个农民（当时未死）和杀害了三个不愿当伪兵而逃跑的人民群众；解放后，隐瞒了全部罪恶历史，冒充失业工人，混入了我市第一公費医疗門診部工作。日寇汉奸姜荣善，参加日伪特务組織，搜集八路軍情报，和搜捕我軍、民干部，并敲榨民財。解放后，他隐瞒了全部罪恶历史，改名換姓，于一九五一年三月混入我水电施工所任副主任。英帝国主义的間諜分子姚維新，在頤中公司南昌办事处任职期間，积极蒐集江西省的政治、軍事、經濟和交通等社会情报，按周、按月逐次向頤中公司上海总公司汇报，直到解放后一九五二年底，該公司被我接收始停止。中統特务罗紀綱在解放前夕，曾三次飞往台灣，領取枪支，空运四川成都，供特务分子何××等組織反革命武装，阻撓我軍解放事业。解放后，他又隐瞒特务身份，化名王华亭，以开燒餅店为掩护，与軍統特务吳华春（已枪决）等互相勾結，拒不坦白。并积极地在新建县屬西山和永修县屬涂家埠等地，寻找特务綫索，企图組織武装匪特。美蔣派遣的現行特务罗炳生，自一九五五年二月到八月，在台灣受了“策反”、“爆破”、“密写”、“印刷”和“通訊”等訓練后，今春以探亲为名，潜来南昌，搜集“八一”大桥等处情报，并借与饒××談恋爱为名，企图将饒帶往台灣受特务訓練后，再回南昌建立电台。审讯中，在人証、物証面前，該犯仍不認罪伏法，并揚言要与审判人員拚命。伪国民党高級職員徐天民，糾合20余人組織反革命造謠集团，針對我党、政各項重大政治、經濟措施，进行造謠破坏。反动会道門头子杜春秀，服刑期間因病保外就医后，仍不悔改，到处找旧关系，秘密糾集

20多个反动骨干分子，大肆造谣进行破坏活动，并再行发展组织。

总之，在1955年上半年，我市的社会治安情况相当复杂，前面所提及的那些反革命分子，乘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到来的前夕，疯狂进行各种破坏，使社会治安受到很大影响。如当时本市一度流传着“青岛失守，食盐来源断绝，很快就没有盐卖了”、“第三次世界大战马上就要爆发”、“马上就要成立以黄河为界的两个中国”、“将来会饿死人”……等等谣言，都是特务分子散布的，致使一部分后进群众害怕将来没有粮食和食盐吃，纷纷争购食盐储存，引起市场一度混乱和人心恐慌。

显然，在这样一些罪恶昭彰的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面前，为了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和保卫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坚决地发动群众开展肃反运动，把反革命分子清查与揭发出来，依法予以处理。右派分子有什么根据把肃反运动说成是“庸人自扰呢”？显然，他们持这种论调的目的，就是企图解除人民群众的政治警惕性，给反革命分子猖狂破坏以可乘之机，从而达到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目的。

此外，在运动的深入开展中，在我宽大政策的感召下，共收到反革命分子坦白自首的材料84件，有19个反革命分子主动到政府坦白交代了问题。在肃反运动中，共收到群众检举材料35,000件，进一步分化瓦解了敌人。通过典型案件的公开审判，以生动的事实教育了群众，更加提高政治警惕性。正因为我市开展了肃反运动，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从而自1956年以来，社会秩序得到了进一步的安定，保障了工业建设、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

农业合作化高潮的順利进行。以上的事实表明：肃反运动是完全必要的，成績是巨大的，肃反运动不是什么糟得很而是好得很！

同时，应该指出的是：肃反运动是在1955年，敌人活动一度很猖狂，同时是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声势浩大，任务紧迫，运动中产生个别的偏差、缺点，也是难免的。但即便是这些个别的偏差和缺点，我們在贯彻中央“有反必肃，有錯必糾”的方針下，也已进行了認真細致的檢查和糾正。并根据实际情况，适当的給了生活補助和安置了释放人員的职业和参加生产的問題。因而根本就不存在右派分子所說的“肃反运动糟得很，不知道有多少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情况！我們認為，右派分子发表这种謔言的用意在于混淆視听，企图煽动群众起来反对肃反运动，使得反革命牆脚稳固，便于反革命政权恢复他們的反动統治。

有些右派分子还把肃反运动說成是“共产党杀人的邏輯”，这更是一种恶毒的污蔑。我們無論对社会鎮反或内部肃反所判处“死刑”的，都是极个别的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憤的反革命分子。对于这些罪大恶极而又死不悔悟的反革命分子，如果不严厉地鎮压，讓他們恣意进行破坏活动，我們能够有安定的社会秩序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設和社会主义改造嗎？显然，我們这样做，無論对国家对人民都是有好处的。事实上，我們并没有錯杀了好人，而且对只要有改造可能的絕大多数的反革命分子，均分別情况适当給予了徒刑或管制处分，使他們能有从新做人的机会。所有这些事实，难道能說是为了杀人而展开肃反运动嗎？显然，这是因为挖掉了右派分子的牆脚而使他們感到痛心！

总之，肃反运动是必要的，肃反的成績也是巨大的，个别的偏差、缺点，也都作了或正在开始作实事求是的糾正，并作了許多善后安置工作。可是右派分子無視一切，高嚷着要成立所謂沒有共产党参加的“平反委员会”，为那些受了“冤屈”的人“伸冤”。其实，他們所說的受了“冤屈”的人，就是那些被处理了的反革命分子，而要为反革命分子“伸冤”，勢必要把在关在押的反革命分子統通放了出来，讓他們再去危害社会治安，破坏人民民主政权，破坏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企图改变中国政权性質！可惜，右派分子的算盤打錯了，落空了！因为人民是不会讓他們的阴謀詭計得逞的。

应当指出，这些右派分子都是吃人民的飯，站在反革命立場上，仇視共产党領導全国人民建設社会主义事业，帮助反革命講話，替反革命“呼冤”，企图从我們个别的缺点錯誤中，加以渲染夸大，进而無中生有地對我們橫加污蔑。把群众的正确批評引入歧途，以达到他們所妄想的推翻共产党領導，搞垮人民民主政权的目的是。

我們决不能忘記階級斗争还存在，决不能上这些右派分子的当！我們要認清右派分子的阴謀詭計，积极行动起来，坚决彻底地粉碎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我們要付出更大力量，把右派分子的反动思想消灭干净，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1957年7月17日江西日报)

肃反工作的成績是 偉大的，任何右派分子也否定不了

刘 公

自从我們党开始整风以来，党外人士对党的各項工作提出了不少批評意見，我認为这些批評，絕大多数是善意的，对党的整风有很大帮助。但是，少数右派分子却在帮助党整风的美名之下，到处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論，歪曲事实，否定解放几年来各方面的工作成績，向党展开了恶毒的进攻，企图模糊群众認識，籠絡人心，动摇党对人民事业的领导，以达到他們不可告人的可恥的目的。他們說什么鎮反是“制造反革命”，“百分之百地搞錯了”，“是一次大报复运动”等，力图使人們相信，好象根本不存在反革命，甚至更为露骨的叫嚣煽动要向肃反工作中的积极分子“申冤”，“报仇”，要“采取行动”，要“討还血債”等等。对这些别有用心分子散布的反动言論，其用心何在，广大人民是看得清清楚楚的，是不值得一駁的。但是，既然有人在那里大肆叫嚣，我就忍不住想談一談我所了解的鎮反工作方面的一些情况和个人的看法。

解放后到底有沒有反革命呢？当然有，而且在解放初期还不少，这是尽人皆知無人不曉的。我們还清楚的記得，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消灭了反动派的軍隊，摧毁了反动派統治人民的反动政权之后，特务、反革命分子仍然

大量存在，而且他們还在繼續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当时，毛主席指示我們：“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們的失敗，他們还要作最后的掙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們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搗乱，他們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無疑义的，我們務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解放几年来的实际情况，証明了毛主席的估計是完全正确的。甘肃的情况和全国一样，当反动的国民党政权被推翻以后，社会上遗留下来的土匪、特务、恶霸等残余反革命分子，仍然大量存在，并且利用解放初社会秩序尚未安定的情况下，繼續进行瘋狂的破坏活动。几年来，先后发现敌人組織起来的各种現行反革命案件近千件，武装土匪先后曾发展到近二百股，反动会道門头子在各地积极进行破坏活动，混入我机关、学校和企业内部的一些反革命分子也趁机进行破坏。仅发生較大的反革命叛乱事件即有：一九五〇年平凉的“五八”叛乱，反革命分子公开襲击平凉县城，賀兰一带以郭拴子为首的叛乱，同心县以馬紹武为首的叛乱，一九五一年初皋兰县的無极道叛乱，永靖县的大刀队叛乱，一九五二年西海固的“四二”叛乱，一九五三年底通渭坡兒川以周鳳岐为首的叛乱，甘南一带以馬良等为首組織的匪乱，一九五四年冬隴西鳳凰山以石明、張万虎为首的叛乱，一九五五年靖远县二条沟以陈希州为首的叛乱，会宁以雷自德、李树鵬为首的一貫道叛乱，一九五六年吳忠以刘进成为首的叛乱等多起。反革命分子杀害我干部及群众的事件，解放以来也时有发生，被杀害的我負責干部即有人民解放軍某部驻天水炮兵团长唐崑、中共甘南工委統战部部长曹学彦、碌曲工委書記杜岐、甘南自治州民政处长白忠义、正宁县工商科

长杜宗佑等同志。仅一九五三、一九五四两年，反革命分子杀死我干部及群众即达五百二十三人，杀伤五百五十七人。解放初期，各地謠言紛紛，反动标語不断出現，部分地区社会秩序一度混乱。广大人民到現在还都清楚的記得，当时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是很猖狂的。几年来，反革命从各方面的破坏，使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了很大損失，对各項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危害也是极其严重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敌人活动猖獗时，曾批評人民政府对反革命分子“寬大無边”，“有天無法”，說共产党、人民政府什么都好，就是不严厉鎮压反革命不好，說他們“还没有完全解放”。这难道能說是“沒有反革命”、鎮反是在“制造反革命”嗎？难道这些殘害人民的反革命就不應該被懲罰嗎？

党和国家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遵照共同綱領和宪法关于鎮压反革命分子的規定，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各族人民的积极协助下，开展了大張旗鼓、轟轟烈烈的鎮压反革命运动。几年来，先后打击了一大批国民党遺留下来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偵破了美蔣特务机关的派遣潜伏案件及其他現行反革命案件近千件，其中仅捕获的所謂“皇上”就有十二名之多。繳获各种武器、电台、章程、綱領、宣言、关防、派令、反革命分子名册等各种反革命重要罪証一万余件；剿灭了股匪七千余人，其中被剿灭受美蔣特务直接指揮的馬良股匪就有一千多人，彻底肃清了匪患；清查出入混入机关、企业、学校內部的反革命分子达四千多人，巩固和純洁了革命陣营。经过几年来大規模的鎮压反革命运动，充分地发动了群众，正确地貫徹了党和人民政府的鎮压反革命的政策，使鎮压反革命斗争取得了偉

大的胜利，严厉地打击了敌人，保障了全省的經濟恢复、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設等各項工作的順利进行。在鎮压反革命运动的过程中，广大人民群众訴了苦，申了冤，报了仇，他們亲眼看到，多年来压在自己头上無恶不作的特务、土匪、恶霸等反革命分子受到了应得的懲罰，無不拍手称快，普遍反映：“这才是真正的解放了”，“这才象个人民政府的样子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热情大大提高，反奸肃特、防奸防盗已成为广大群众自觉的行动，涌现出了大批的治安模范人物。这不是偉大的成績嗎？这些成績能够否定得了嗎？这当然是絕對不能的。請問那些右派先生們，如果不坚决鎮压反革命分子，能不能有今天这样安定的社会秩序？能不能順利地进行經濟恢复、进行各項社会主义改造？能不能順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設？当然也是不行的。更使人們奇怪的是，那些右派先生們的看法为什么却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看法不同？他們为什么不同情和支持人民群众的愿望，而却在那里叫嚣“鎮压反革命百分之百的搞錯了”，是“制造反革命”，他們为什么要怀恨和辱罵肃反工作中的积极分子，将积极分子比作“賀其卷”、“婁阿鼠”、“劊子手”，甚至更狂妄地提出要“懲办”积极分子，要向人民“算賬”、“申冤报仇”呢？这就不得不使人們質問这些右派先生們，你們到底站在什么立場上說話？当你們在解放前，亲眼看到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被特务、土匪、恶霸等反革命分子殘害的时候，你們同情过人民沒有？恨过和罵过反革命分子沒有？解放后，当反革命到处組織叛乱、杀人放火的时候，你們罵过和恨过反革命分子沒有？当反革命杀害了数以千計的革命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时候，你們曾为死难者伤

心过沒有？恨过反革命罵过反革命沒有？当广大群众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起来与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的时候，你们协助人民镇压过反革命沒有？但是，当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镇压和基本肃清了大量的反革命分子，彻底解放了人民的时候，你们却感到伤心悲痛，到处喊叫肃反“百分之百的錯了”，是“一場大报复运动”，要为反革命“申冤”啦！“报仇”啦！要“惩办”积极分子啦！你们到底居心何在？为什么这样同情和关切反革命而怀恨人民？到底与反革命有些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否則，你们却为什么与反革命分子站在一起，向党和人民进攻，为反革命分子辯护呢？

我們要严正的告訴那些右派先生們，镇压反革命是为了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几年来的鎮反工作已經取得了有决定意义的偉大胜利，这是任何人否定不了的。不管你们如何千方百计的替反革命辯护，企图使反动統治复辟，但反革命已被基本肃清了，你们的梦想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不管你们如何憎恨社会主义，但广大人民群众建設社会主义的思想信念已成为不可动摇的力量。千万件事实教育了人民，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不彻底镇压反革命，就不可能順利的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沒有社会主义建設的胜利，就不可能有祖國的独立、富強、自由和幸福。我們不但不会因为那些右派分子的叫嚣而放松对反革命分子的镇压，而且相反，今后还必须繼續坚决地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以进一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障社会主义建設的順利实现。

最后，我希望那些右派先生們，立即清醒过来，不要自

絕于人民。如果你們仍不悬崖勒馬，回过头来，站到人民方面，人民将会永远地拋棄你們。

(1927年7月12日甘肅日報)

駁右派分子对肃反运动的各种謬論

任光椿

不久以前，我到衡阳去了一趟，参加了衡阳专区各县的肃反座谈会，訪問了专署的几个单位和衡山县，接触了各方面的人士、包括党的工作者、非党民主人士、机关和企业的干部，以及医师和中学教員等等。在专区和县，实地看到的肃反运动情况，以及从人民群众那里听来的肃反运动的道理，和最近以来在报纸上不断看到的，少数右派分子以帮助共产党整风为借口，针对肃反問題，发出的許多誣蔑和破坏性的言論，截然不同。用事实来对照一下这些右派先生們的言論，是可以使我們明白很多問題的。

右派分子說：“肃反运动是不必要的”，是“庸人自扰”。可是，事实是怎样的呢？事实是：通过这次运动，不仅从各方面都查出了大批反革命分子，說明了的确有一批暗藏的反革命存在。而且，事实表明，在这次运动前，暗藏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是相当猖獗的。仅以我最近到过的衡山县为例，据該县在中学方面不完全的統計，自一九五三年鎮反运动結束以后，到一九五六年肃反运动开展以前，即先后发现反动标語十三起、爆炸二起、呼反动口号二起，以及各种造謠活动。該县第四中学，在一九五五年贯彻粮食“三定”政策期間，曾經連續发现八次反动标語，誣蔑設罵党和政府，

煽动群众，破坏粮食“三定”。该县南岳电厂有一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贛世蕃，曾在“中美合作所”受过特务训练，自解放以来，直到这次运动前，他先后五次破坏机器，使工作和生产受到不少损害。試問把这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清查出来，坚决制止他們的破坏活动，难道这是不必要的嗎？

右派分子还特別反对：“肃反运动成績是主要的，缺点、錯誤是次要的。”他們把一切公正地肯定肃反运动成績的人都罵为：“教条主义者”、“公式主义者”和“保守派”。从这次各方面揭发的右派分子的活动情况来看，許多事实証明，否定成績，夸大缺点，已成了他們反对党、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反对社会主义的共同的手段。可是，事实又是怎样的呢？从衡阳这个专区肃反运动的结果来看，通过这次运动，共清查出了二百二十一名反革命分子和其它坏分子，这里面，有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刚从台湾蔣介石特务机关派遣进来的特务分子伍松柏；有在一九四零年曾杀害过我共青团湖南省負責人刁牧夫等同志的中統特务組长李洪烈；有在一九五三年上半年組織所謂“中国反共义勇游击队”，发展了十多个人，并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四年間，在零陵县城关三次散发大量反动标語傳单，企图煽动群众、上山为匪的現行反革命分子蔣时学；还有不少血债累累，罪恶重大的反革命分子，如祁东县藍佐庭，曾当过日伪的警长和剿共班长，一九四六年曾帶領日特，向我抗日根据地進行扫蕩杀害群众二十余人，燒毀民房四間，一九四三年又杀害农民十七人。通过这次肃反，把这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清查出来了，斬断了美蔣特务机关伸进来的魔爪，清除了危害国家人民的破坏分子，为死难的烈士报了仇，为被害的群众平了憤，有些罪

惡重大的反革命分子被清查出來後，當地群眾和被害苦主紛紛聯名寫信，感謝政府。黨和人民群眾一道，在短短的不到一、兩年的時間內，查出了這麼一批反革命分子，作了這麼多的好事情，難道這成績還不算是主要的嗎？一切愛護我們的國家、愛護我們的黨、愛護我們偉大社會主義事業的人，都會正確的估計到，查出這些反革命，即使數量是很小的，這對鞏固我們的黨和國家也該有多麼重大的意義。有的單位，即使沒有查出一個反革命分子，但是通過這次運動，發動了群眾，鍛煉了幹部，提高了群眾的警惕，擦亮了群眾的眼睛，這不管是給我們革命組織的機體普遍注射了一次抵抗反革命分子侵襲的、有效的“抗毒素”；而且，在廣大群眾中劃清了敵我界限之後，基本上解決了敵我矛盾，也就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提供了先決條件，這些成績也是必須予以充分估計的。至於那些對社會主義事業早已喪失了責任感、甚至恣恣不忘於資本主義制度、一心幻想資本主義復辟的右派分子，站在他們自己的立場上，戴着他們黑色的眼鏡，盡可以大肆污蔑肅反運動，否定肅反成績，可是，他們的唾沫，却怎么也淹沒不了肅反運動已取得巨大成績的巍然如山的事實！

右派分子還惡毒地咒罵肅反積極分子是“魔鬼”，是“出賣良心的人”，是“阿諛逢迎的人”。他們向黨、團員、積極分子噴射了大量污蔑的毒涎。可是人們只要稍微看看下面的一些事實，就可以看出，這些毒罵別人的，他們本人的靈魂，該是多麼的卑鄙和無恥。就我這次到衡陽地區親自訪問和近年來陸續聽到的許多情況來說，在肅反運動中，廣大群眾和積極分子的許多事迹，是十分感動人的。長沙市利華橡膠廠的青年工人解慶瑚，發現暗藏在該廠的一個

反革命分子的可疑行迹后，便自动经常注意其行动，及时向公安机关反映，终于协助公安机关，查清了这个反革命的面貌。长沙县土桥乡农村妇女宋淑云，曾连夜步行三十多里，向政府检举，并协助公安机关破获了一个干了二十多年的特务活动，并有血债的军统特务。湖南省森林工业局衡阳分局干部、共产党员周兆英，身怀有孕，仍一天步行九十多里路，去查清一个反革命嫌疑分子的问题。零陵县中学教员艾福生，检举自己的儿子一九五三年曾在零陵县城关三次散发反动标语传单。资兴中学李默君检举他的丈夫长期隐瞒特务身份并私藏武器。安乡县粮食局干部熊宜萍检举他父亲是个长期未暴露的中统特务分子。衡阳市手工业管理局干部朱一坤检举并协助政府取出了他哥哥长期隐瞒的两支手枪。类似事例，不胜枚举。人民群众积极检举反革命分子，甚至大义灭亲；而右派分子却以敌为友，公然为反革命作辩护。人民群众把肃清反革命当作与自己切身相关的事情，和党一道，对反革命分子进行坚决斗争；而右派分子却指手划脚地诬蔑群众的革命行动。党、团员、积极分子，为了清查反革命，有的昼夜辛勤、跋山涉水，不避艰苦；而那些坐在自己的书斋里，整天镂空心思、寻找机会来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又有什么资格来谩骂积极分子呢？当他们忘记了人民群众多少年来的血海深仇，忘记了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为了替反革命分子辩护，而恶毒地咒骂这些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为肃清反革命而辛勤工作的积极分子的时候，他们的“良心”，如果不是“出卖”给反革命分子，又是放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右派分子还诽谤肃反运动是“恐怖运动”。他们说：肃

反是“殘酷的”，是“粗暴的”，是“对人类道德的进攻”，是“大规模地破坏宪法的运动”。这些先生們，从“道德”說到“法律”，对肃反运动也真算是极尽污蔑詆毀之能事了。可是，事情真是这样的嗎？不。他們这是彻头彻尾的誣蔑。由于人民群众在解放以来几次大的运动中受到了很多鍛炼，組織性和自觉性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次运动是健康的，既体现了党的“坦白从寬、抗拒从严”的政策精神，又貫徹了合理合法的斗争。第一、从对反革命分子的处理上看。在这次肃反运动中，中央的方針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捕”，全国沒有杀一个人。衡阳专区清查出的二百二十一名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其中給予刑事处分的，四十七名，給予行政紀律处分的有八十八名，免于一切处分的即有八十六名。这就是說：有百分之七十八以上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都未予刑事处分，繼續留在机关工作。在衡山，我訪問了第四中学，这个学校查出的两名反革命分子，其中有一个在解放前曾謀杀过我地下党员賀民秀等同志，充任过伪国防部新聞处上校督察专员兼主任秘書等反动职务，一九四九年春还曾指使人組織反共义勇总队，企图抗拒解放。另一个是伪乡长、青年党县筹备委員，长期隱藏枪支彈药，在肃反运动开始后还張貼过反动标語。象这样两个反革命分子，尽管他們过去的罪恶是相当严重的，但只要他們能幡然悔悟，痛改前非，老老实实地向人民坦白交代，国家就給予他們这样寬大的处理，使他們有在工作和劳动中贖回自己的罪恶和改造自己、重新做人的机会。这难道还不是充分显示了劳动人民的“雅量”嗎？如果右派分子所謂的“殘忍”，是指的国家对某些罪恶大、民憤深、拒不悔改的分子，依法給予了处理，那末

我們認為這種“殘忍”倒是完全必要的。不久以前，人民日報刊載的山東館陶縣反革命分子殘酷殺害共產黨員一家數口的事實，這就是一個血的教訓。這個血的教訓，告訴一切革命者和進步人士，必須牢牢地掌握住人民民主專政的武器；它告訴人們，對那些堅決與人民為敵的反革命分子的寬容，就是對人民的殘忍！本來嘛，“道德”、“法律”等等，也都是有它的階級性的。按照地主和資產階級的立場、觀點來看，莫說是肅反運動，連土地改革鬥地主、分田地，也是無法無天的事情，而對人民來說，肅清反革命和消滅地主階級，却都是大快人心，既合情、又合理、又合法的好事情。為千千萬萬人民除害去惡，使千千萬萬人民免除反革命分子的殘害和地主階級的剝削，想想看，哪一個剝削階級又能夠有這樣崇高的“道德”標準和這樣公正合理的“法律”呢，這是歷史上所從來沒有過的；第二、從運動的秩序來看，在這次這樣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中，絕大部分單位均未發生過火行為，對反革命分子的鬥爭，都是“先禮而後兵”，耐心進行思想工作，交代政策。廣大群眾在這次鬥爭中，表現得那樣有理有節，也是很令人嘆服的。在衡山，我訪問了一位木材公司經理、一位縣政協委員、一位醫師、一位中學教員，其中只有一個是共產黨員，其餘都是非黨人士，並且還有兩名在運動中曾被審查和鬥爭過。可是，在我和他們的談話中，他們一致認為，這次肅反運動是健康的，沒有發現過什麼過火行為和違反政策、違反紀律的現象。衡山縣政協委員、人民醫院醫師、非黨人士李德正，在和我交談的時候，還很激動地把新舊社會作了對比。他說：“我們都是在舊社會生活過的人。那時候抓住了一個逃兵都要槍斃。反動派要是懷疑誰

是共产党，那末跟着来的就会是失踪、毒打、送集中营、枪毙和活埋。那时候，一个青年往往因为說了几句进步的話，就会忽然失踪，生死不明，永远不知下落。今天人民对待反革命和反革命嫌疑分子，都是反复交代政策、反复調查研究，一个不杀，大部不捕，問題查清以后，大部分仍然留在机关工作。人的心都是肉做的，把新旧社会对比一下，对共产党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寬大政策，我們只有感激。”李德正先生这样說，是有很多历史的和事实的根据的。远的不提，只說自馬日事变以后，蔣介石政权在对共产党和非党进步人士所施行的白色恐怖和瘋狂迫害中，該是采取了多么毒辣的手段。很多人都看过“上饶集中营”那本紀实的書。那里面記戴的反动派对被捕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殘酷暴行以及对他們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和虐待，真是令人发指的。可是，在那时候，沒有看見这些右派先生們拿出他們“女人总是反现状”的“笔杆”，替人民說說話；而今天人民只是动动手把这些解放七年来仍然长期隐瞒、不肯暴露的反革命分子揭发出来，清查他們的面貌，也許在斗争中有些人情緒激昂了一些，声音大了一些，这些右派分子便忍不住站出来大嚷大叫“殘酷”起来了。写到这里，人們不得不借用李德正先生的一句話，問問这些右派分子：你們的心，难道只是对反革命分子才有血有肉，而对人民來說就不是“肉长的”嗎？

右派分子还叫囂：“肃反运动搞糟了”、“百分之九十几搞錯了”。他們看見有些单位，在运动中曾經一度出現过某些缺点，就象抓住了寶貝一样，大喊大叫，向党进攻，并且一心想挑撥某些在运动中被斗争或审查过的人們，产生不滿情緒。当然，我們知道，在肃反运动中不是完全沒有发

生过一些缺点和錯誤的。运动中，在极少数单位，过火的或漏掉的現象都是有的。可是誰又能担保在任何工作中絲毫不出一点兒錯誤呢？古往今來，有这样的事情嗎？何況肅反是和暗藏敌人作斗争，这里面情况是很复杂的。例如衡山县第三中学教員周德，在这次运动中，有人从敌伪时期留下来的原档案上，发现有他解放前亲笔填写的“三青团团员总甄核表”，表上注明他是三青团区队长和中央团部助理干事。該县人民銀行肖云軒，也有人提供他解放前用过的名片上注有伪宪兵营长的职銜。人們認為，既然这些都是他們亲笔填写、亲手使用的东西，当然这物証應該算是确凿的了，而他們两人，自解放以来，对上述身份又长期沒有交代，因此便對他們进行了清查。直到最后，經過反复調查研究，才发现原来上述反动身份和經歷，都是他們本人在解放前为了鑽营地位、夸耀自己而自己捏造出来的。此外，这次运动中还发现了好几个与反革命分子同名、同性、同乡、甚至連妻子的姓都相同的人。象这样复杂的情况，在运动迅速发展过程中，要一下子分清是非，显然是不容易的。在运动中，錯斗个别人，这也是很难完全避免的。对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來說，問題不是幻想一切工作都絲毫不犯一点錯誤，重要的是對一切錯誤、缺点都应分清性質，找出原因，并采取严肃的、坚决及时改正的态度。而在这方面，我在专区和县，看到各級肅反领导机构所采取的态度，則是十分严肃認真的。为了避免和糾正某些缺点錯誤而反复采取的各种措施，也是十分細致的。对每一个肅反清查对象的問題，都經過反复調查研究，最后給他們作出正确的結論。每个人的結論都給本人看过，听取本人的意見，只要本人意見是正确的，都进行修改。

有的反复修改过六、七次。对运动中被清查过、而最后查明不是反革命、坏分子的，都給他們恢复名誉和工作。真正斗错了的，还由领导出面向他們道歉。这些工作，大部分都已经作了，有的正在作；运动中的缺点錯誤，有的已經改正，有的正在改正。大家都知道：蔣介石为了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曾經采取过“宁可錯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个”的政策；美帝国主义曾經不顧全世界人民的抗議，杀害过無辜的罗森堡夫妇，蔣介石和美帝国主义不知屠杀了多少好人，欠下多少血債，試問在人类历史上、在当今世界上，又有哪一个政党、哪一个政府，象今天人民的政府和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这样实事求是、明辨是非、敢于承認、同时也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錯誤呢？右派分子要想抓住某些缺点，挑撥某些人的不滿，来破坏人民的团結，这也是徒劳的。我发现有不少人由于自己的問題查清了，作了結論，放下了“思想包袱”，思想上更加靠攏了党，工作积极性也有了很大提高。就衡阳专区零陵县这一个县的情况来看，即有十一名在运动中被清查过的人，在查清問題之后，由于工作积极，已被評选为先进工作者。該县集材場王祖虞，运动中是肃反清查对象，后来給他作了正确結論，他十分感激，特地在結論上写了一首詩：“往昔形穢自羞慚，縮手躡足怕主張，运动开展获教育，沉昔幸运有良方，多动脑筋多流汗，一分热发一分光，化雨春风共产党，沐恩戴德永勿忘”。运动后，由于他工作积极，不久前也被評为先进工作者。事实证明，右派分子妄想人民群众中进行挑撥离間的阴谋，这只能說明，他們是低估了人民的理智；低估了人民的覺悟水平。而这些右派分子，当他們挑撥是非的丑恶面孔在人民群众

面前一旦被揭穿之后，則終于是逃不出被人民所唾棄的。

拿事实和右派分子的謬論作了上面这样一番对照之后，人們不禁要想到一个問題，这些右派分子的思想言論，为什么和事实、和人民群众的看法、态度之間，总是这样背道而馳，存在着有如天淵之別的距离呢？这个問題，归根結底，是不能不从立場問題上来找答案的。这里，人們不能不警告那些右派分子迅速放棄他們那种资产階級右派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立場、放棄他們那一套企图用資本主义的陈腐貨色来偷換和代替社会主义制度的“美妙幻想”，赶快向人民請罪，老老实实地接受工人階級的領導，接受社会主义的改造，不要頑抗到底，自絕于人民。

(1957年7月15日新湖南日报)

斥右派分子对肃反运动的攻击！

薛 坦

自从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以来，各方面的朋友对我们党提出了許多善意的批評，提供了很多宝貴的意見，这是值得欢迎，應該感謝的。但是，资产階級右派分子，却打着帮助党整风的幌子，利用大“鳴”大“放”的机会，发动了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的猖狂进攻。在右派分子的进攻中，对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开展的机关、学校、企业内部肃反运动，进行了特別恶毒的攻击，把肃反运动說得無一是处。右派分子既然以肃反运动为題，对党进行了恶意的攻击和無耻的誹謗，那么，我們对此就决不能保持沉默，必須給以应有的駁斥。事实胜于雄辯，肃反

运动到底是好是坏，指望用信口雌黄的伎俩，颠倒黑白，欺蒙群众，是绝对办不到的。

解放以来，在全国范围内曾经进行了镇反运动，有力地配合了社会改革，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保障了社会秩序的安定。但是，当时的镇反运动，主要是把大部分公开暴露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至于暗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就没有来得及进行彻底的清理，他们运用欺骗手段，混入机关、学校、企业内部，甚至混入共产党内部。一九五五年，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进展，全国劳动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热情高涨，积极要求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然而反革命分子和一切反动势力，却积极地从各方面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的关头，阶级斗争尖锐化了，那个时期连续发生的高岗、饶漱石事件，潘汉年、杨帆事件，胡风事件，以及反革命分子对农业合作化，对工业建设和对其他方面的破坏事件，都是阶级斗争状况的具体反映。当时必须坚决地打击反革命分子和一切反动分子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反抗，为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到来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在这种形势下，如果对社会主义一切敌人的镇压，软弱无力或者徘徊不前，势必就要迟滞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就必然犯历史的错误。由于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于一九五五年下半年适时而又坚决地开展了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肃反斗争作为一条战线，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地配合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历史事实证明，在机关、学校、企业内部开展肃反运动是绝对必要的，十分适时和完全正确的。这是阶级斗争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当中不可缺

少的一項重要工作。

我們湖北地區在這次肅反運動中，查出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已經定案的有五千五百一十名。其中有現行破壞活動的反革命分子就有一百四十九名，同時還破獲了十數起反動組織。例如：蒲圻縣糧食局清查出來的潛伏特務分子洪斌，解放初期曾數次向香港特務機關報告我軍事、經濟情報，一九五〇年還親自到香港特務機關接受指示。武漢大學清查出來的軍統特務分子吳鴻志，曾任偽國防部駐滬調查組“二〇四諜報組”上校副組長，負責搜集蘇聯使館、中共上海市委辦事處及一些民主人士的有關情報；後來又任江蘇省鹽城縣地主惡霸分子組織“流亡漁會”的理事長，曾組織策劃該漁會武裝進犯解放區，抓走我鄉村幹部、共產黨員八名，搶走新四軍藥品百餘箱，軍裝數百套，罪惡嚴重。解放後隱瞞罪惡混入武大，擔任了圖書館學系講師。荊門縣清查出來的反革命分子鄭復初，歷任偽湖北省保安團少校團副、上校團長、保安副司令及縣長、代理專員等職，從一九三一年至解放前，在漢川、米鳳、隨縣等地，前後殺害革命幹部和群眾一百六十九人，其中有中共縣委委員、區委委員、游擊隊員等。隱藏在中南財經學院學生中的反革命分子楊世聚，原來是惡霸地主還鄉武裝中的骨幹分子，他親手活埋殺害的我鄉村幹部、共產黨員即達十五人，其中我農會副會長共產黨員楊建訓一家六口被他一次活埋，解放後偽造歷史混入我高等學校，並且混入共產黨內竊取了共產黨員稱號。黃陂縣破獲的反動組織“中國人民大同黨”，已發展至一百多人，盜竊槍支，企圖炸毀我區公所，暗殺我幹部等等。鬥爭的實踐表明，確有一大批反革命分子隱藏在革命的

隊伍內部，其中有一批反革命分子，一直在進行反革命活動，只是當他們被清查出來之後才被迫停止了罪惡勾當。還有相當多的反革命分子曾經在解放以前積極從事反革命活動，有些人作惡多端，血債累累，解放以後，雖然沒有發現現行反革命活動，但是肅反運動查明，有些是暫時潛伏下來以待時機；有些則是捏造歷史、隱瞞罪惡，拒絕登記、拒絕坦白交代，並沒有悔悟表現，仍然堅持其反動立場，在一定的條件下，他們就會變成現行反革命分子。因此，把他們清查出來是絕對必要的。

經過肅反運動，不僅清查出大批的反革命分子，而且弄清了很多人的政治歷史問題。在運動中全省弄清政治歷史問題的約有十一萬人，基本上澄清了革命隊伍內部政治情況。大家知道，每一個革命組織成員都應該將自己的政治歷史情況向所屬的組織交代清楚，這是應盡的政治義務，但是有很多人由於覺悟不高沒有履行這一項義務，他們偽造歷史，隱瞞主要政治歷史情節，或者交代不徹底，自己給自己背上了一個沉重的包袱。由於他們對黨和國家不忠誠，使自己的面目模糊起來，妨礙了組織上對他們的了解。既然在政治上有隱瞞，當然就存有戒心，甚至常常流露不滿情緒，這樣往往容易被反革命分子所利用，客觀上便利了反革命分子的活動。所以，只有弄清了這些人的真實政治歷史，劃清敵我界限，才便於徹底肅清潛藏的反革命分子，同時也才能信任他們，卸掉他們的歷史包袱。因此，在清查反革命分子的过程中，查清很多人的政治歷史情況也是有重大意義的。

肅反鬥爭是一個廣泛的群眾性運動，我們貫徹執行了領導與群眾相結合的工作路線。實行這樣的工作路線的結果，

不仅比較彻底地肃清了反革命分子，而且深刻地教育了广大干部和职工群众，进一步的提高了他們的階級覺悟和政治警惕性，必須看到这一方面的成果是有深遠意义的。在肃反斗争的怒潮中，我省十多万干部和职工群众检举了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检举案件有九万五千多件，为内部肃反和社会镇反提供了大量有用的线索，对肃清反革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运动中也出现了不少大义灭亲的事例，有些原来敌我不分或認敌为友的人，通过运动提高了覺悟，他們站在人民的立場和社会主义的立場上，检举揭发了反革命分子的罪恶活动。例如鄂城县涂鎮小学教师管宗澤的族兄管宗学，是一个“軍統”特务分子，解放后曾潜藏在广州等地，1954年潜回鄂城涂鎮，在地洞里隱藏了二年多，在这次肃反运动中管宗澤把他检举出来，依法逮捕了这个反革命分子。广大干部和职工群众，由于提高了警惕就时刻地注視着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前不久，大冶矿山分公司公務員范助同志，机警地发现了反革命分子曹新田放下的二十五支雷管，粉碎了反革命分子阴谋炸毁办公楼、炸死分公司經理的罪恶企图，制止了这次破坏事件。經驗証明，当群众擦亮了眼睛，分清了敌我界限，积极行动起来与反革命进行斗争的时候，敌人就会無藏身之所，千百万双有力的手会随时制止反革命的破坏活动，敌人打入我内部或从内部发展特务的可能性大大縮小，这种群众自觉的警惕性，对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障社会主义建設的安全，保卫社会主义成果，是無窮無尽的力量。

綜上所述通过肃反运动，查出了大批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純化了革命队伍，巩固了国家机关；弄清了很多人的政治历史問題，澄清了内部政治情况，加强了内部團結；

教育了广大干部和职工群众，提高了阶级觉悟和政治警惕性，有力的配合了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保卫了社会主义建设。这些事实，难道不是证明开展肃反运动是恰合时宜和十分必要吗？这样明显而重大的成绩，凡是站在人民立场和社会主义立场上的人，对这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对于这样大是大非的问题，人民是能够分辨清楚的。然而右派分子，象马哲民、艾瑋生之流，却与人民持有绝对不同的态度和看法。他们从骨子里就反对肃反斗争，肃反运动一开始就遇到了这些右派分子的反抗和污蔑，他们利用党和人民给予的政治地位，阻碍肃反运动的进展，由于党中央英明正确的领导，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决斗争，打垮了右派分子的抵抗，才胜利地开展了肃反运动。两年来，我们不得不在同反革命分子进行激烈斗争的同时，击破右派的抵抗和进攻。现在，当着肃反斗争已经取得巨大成绩，作为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运动将要结束的时候，右派分子又利用帮助党整风之名，向党进行猖狂的攻击，否认开展肃反运动的必要性，硬说肃反斗争是犯了什么“教条主义错误”，“历史的错误”。尽人皆知，开展肃反运动，完全是从我国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总结了我国肃反斗争的经验，而做出的决定，根本没有“教条主义错误”，肃反斗争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根本谈不到有什么“历史的错误”。右派分子歪曲历史事实，不仅不承认肃反的巨大成绩，反而一口咬定，说肃反运动是根本错了，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道理非常明显，最本质的问题是阶级立场问题。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和反革命分子的关系密切，反革命分子就在他们

“六亲”之内，也许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原来就干过反革命的勾当。既然如此，右派分子当然不愿意看到反革命分子被肃清，肃反斗争获得的成就，在他们眼里，也就变成了“罪恶”，变成了“错误”，这正是仇视人民，仇视社会主义的本质的反映。中南财经学院院长、民盟湖北省主任委员马哲民说，肃反是“杀人的逻辑”。他只讲“有错必纠”，“不讲“有反必肃”。从本月六日湖北日报登载的材料来看，原来马哲民也同反革命分子的界限不清的，难怪他不愿意承认肃反的成就。可以想象得到，如果不肃清反革命，倘若在我国出现了类似匈牙利的事件，革命的人民群众将不知有多少人惨遭杀害。所以反对我们肃清反革命的逻辑，才是真正的“杀人逻辑”。还有华中师范学院副教授艾璋生，他说肃反犯了“教条主义错误”，“损害了中国五千年的民族文化传统，使大家六亲不认”，“共产党有無遵守宪法的诚意”等等。他为什么对肃反斗争这样深恶痛绝，厉数肃反的“罪状”呢？原来他在历史上曾经长期在帝国主义主办和资助的机构中任职，与帝国主义分子来往密切，解放后，还曾到香港同帝国主义分子贝约翰联系。问题不是很清楚吗？他的所谓“六亲”、所谓“民族文化”究竟指的是什么！

坚决的右派分子，不容易一下子就认罪的，也是不愿意轻易认输的。他们也许会狡猾地提出质问说：“你们不公不啊！你们掩盖了缺点哩！”大家知道，共产党人向来不允许抹杀人民的革命成就，同时从来也没有隐瞒过缺点，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我们认为任何工作都不会没有错误和缺点，何况千万群众的运动，总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缺点。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要以批评自我批评的精神总

結自己的工作，肯定成績，以吸取經驗，信心百倍地前進；檢查缺點，得出教訓，避免重犯錯誤。

肅反運動有缺點，而且也有暫時的個別的錯誤。有那些缺點？缺點又是怎樣發生的呢？發現了缺點，採取什麼措施呢？對待這個問題也必須實事求是的加以分析。

我省肅反中的缺點和錯誤，正如毛主席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所指示的那樣：“我們的肅反工作，成績是主要的，但是也有錯誤。過火的、漏掉的都有”。我們的方針是：“有反必肅，有錯必糾”。在一九五五年的肅反鬥爭中，有些地方確曾一度發生過過火的行為。在群眾鬥爭中有少數單位曾一度出現過打人、罵人、態度粗暴的現象，對待反省的人也有方式不妥當的地方，這些缺點和錯誤，一經發現就很快地糾正了。在一九五六年基本上清除了這方面的缺點。這些缺點是怎樣發生的呢？肅反鬥爭是屬於解決敵我矛盾的範疇，是一場極其複雜而又激烈的階級鬥爭，如果不採取發動群眾、依靠群眾的工作路綫，就不可能在一個比較短的時間內清查出大量的反革命分子，倘若是讓大批反革命分子長期暗藏在我們的“肝臟”里，對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就有着極其嚴重的危險。人民群眾永遠也忘不了反革命分子的滔天罪行，反革命分子對於覺悟了的人民群眾說來，是不共戴天的仇敵。在揭發、清查和群眾鬥爭的過程中，又有一批堅決的反革命分子抗拒、抵賴，這就激怒了群眾，某些過火行為也往往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這是很難避免的事，我們決不能夠、也不應該因噎廢食，怎麼能夠把群眾束縛起來而讓反革命分子逍遙法外呢？！在肅反鬥爭中鬥錯好人的現象也曾發生過，但是為數很少，

而且发现后，也坚决进行了纠正。有些人经过审查和斗争查明不是反革命分子，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应该具体分析。必须记住，我们是同隐藏的、反革命分子作斗争，他们是用伪装的面貌暗藏在革命队伍当中的，而有些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人也欺骗了党和国家，有些还有反动言行。这样复杂的情况，只有经过一系列的工作，才能把他们和反革命分子界限分辨清楚，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以某些人清查的结果是否算作反革命分子，作为斗争的唯一依据，是不合理的，是脱离实际的。譬如在一九五五年的肃反斗争中，有一部分人根据惩治反革命条例是应该按反革命分子论处的，只是由于一九五六年进一步实行宽大政策，才没有把他们当做反革命分子，这种人虽然最后没有算做反革命，群众审查他们，斗争他们，怎样能说是错了呢？当然是对了，而不是错了。还有一批人，历史上有反革命的问题，他们虽然作过些交代，政府也没有予以追究，可是他们交代不彻底，隐瞒了某些情节，或隐瞒了重大情节和罪恶，对这样的人在运动中根据群众检举予以追查也是错了吗？当然也不错。不仅没有错，有严重罪恶民愤的，还应该依法惩办。对于参加过特务组织，与特务分子或其他反革命分子来往密切，或平日有反动言行的人，进行了追查或思想批判，也是有根据的、有理由的，也是不能算错误的。就我们所知道的情况，根据较为广泛的材料，不应追查的人，在被审查的人当中，也只有百分之几。右派分子对肃反斗争这样复杂的问题，不作具体分析，抓住一点夸大事，大喊大叫，说肃反斗争搞的“糟得很”，有百分之八十甚至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被审查的人都错了。他们这样歪曲、污蔑肃反斗争的真实目的在于煽动这些人对党和

政府不滿，利用這些人的不滿情緒，以實現其卑鄙的政治野心。右派分子的這個陰謀詭計，是值得人民警惕的。那些在肅反運動中被審查、被鬥爭過的人們，更要提高警惕，不要上當。

經過肅反運動，也還漏掉了一些反革命分子，也是一個缺點。少數堅決的反革命分子，巧妙地偽裝起來了，並沒有全部清查出來。大冶礦山分公司反革命分子曹新甜的反革命案件，就在肅反運動之後發現的。我們必須牢牢記住毛主席說的話：“還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首先還是有反革命……必須懂得，沒有肅清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不會死心的，他們必定要乘機搗亂。帝國主義者和蔣介石集團經常還在派遣特務到我們這裡來進行破壞活動，原有的反革命肅清了，還可能出現新的反革命分子”。我們在糾正缺點和錯誤的同時，必須注意追查漏網的反革命分子，並且永遠保持警惕，堅持不懈地和反革命分子進行鬥爭，什麼時候發現了反革命分子，就把他們隨時交付司法機關依法處理。當然右派分子唯恐反革命分子被肅清，多漏掉幾個反革命分子，正是他們所希望的，搞得徹底一些，他們就如喪考妣，這就是他們的立場。

右派分子還張牙舞爪地說“你們違反了憲法，違反憲法者，法辦”，好一個“忠誠衛道者”！可是這些“仁人君子”連事實也不願意看一看。誰不知道肅反運動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一場群眾性革命鬥爭，怎么能說違反了憲法呢？憲法十九條明明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保衛人民民主制度，鎮壓一切叛國的和反革命活動，懲辦一切賣國賊和反革命分子”。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

次會議通过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决议”中第四项也规定：各级国家机关和全国人民必须充分地提高革命警惕性，肃清一切公开的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粉碎国内外敌人，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破坏活动”。这一场大规模的肃反斗争，正是宪法原则的具体实施和人民代表大会决议的贯彻执行，根本谈不上违反宪法的问题。右派先生们的眼睛是看不见宪法十九条的，他们也故意的忘记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决议。至于说肃反的某些具体措施没有执行国家法律和法令，这也不是事实。凡是涉及法律的问题，都是由司法机关依法办理的，虽然有过的个别法律程序不完备的现象，也是在群众运动斗争紧张的阶段中，激于群众的义愤或个别单位控制不严而发生的。就是这种个别现象一经发觉也就及时纠正了，有什么违法可言呢？“醉翁之意不在酒”，右派先生所真正关心的不是宪法，而是他们的资本主义复辟的美梦。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反对肃反，为反革命分子辩护，反对共产党领导，公开号召“杀共产党人”，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甚至阴谋煽动群众，制造混乱，又作何解释呢？他们这些反动言论和阴谋行径，没有那一点合乎宪法规定，却完全违反了宪法的基本原则，如果一定要争论是否违反宪法的问题，好吧，由人民群众来公断！看看到底是誰违反了宪法！

我们遵循着党中央的教导，贯彻执行了“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一贯坚持严肃慎重，实事求是的原则。当肃反运动开始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我们采取了各种防止偏差的措施，当发现缺点和错误时，都及时地提出纠正办法，进行了善后工作，因而没有造成不可纠正的错误。给每

一个被审查的人做出了正确的結論。缺点和錯誤虽然是暫时的个别的現象，但是我們都作了認真的糾正。为了慎重起見，在运动后期，还專門划出一段時間进行全面檢查，凡是錯了的，一經发现都进行了平反，結論大都經過群众討論，反复征求了本人意見，其他如工作安排，損失賠償等需要解決的問題，基本上也都解決了，直到現在有些地方还在深入、細致地进行這項工作，以便彻底地克服缺点，消除錯誤。总的說来，我們基本上做到了既清查大批反革命分子，又沒有冤枉一个好人，保證了肅反运动的健康发展。馬哲民之流所說的有“錯必糾……似乎未这样做”，只不过是撒謊而已。真理是顛扑不破的，事实是不能任意抹煞的。右派分子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丑恶咀臉已經大白于天下，他們攻击肅反运动的真实目的已經完全暴露，讓我們在社会主义的共同立場上，更加紧密地團結起来，彻底打垮右派的进攻，百倍地保持警惕，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安全和繁荣而斗争。

(1957年7月24日湖北日报)

肅反运动推不翻

張少康

大鳴大放中，对肅反运动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絕大多數人認為肅反运动搞得好，成績是主要的、巨大的，应当首先加以肯定，运动中的缺点、錯誤是其次的；但另有一些人則怀疑运动的成績，甚至否定其必要性，說什麼肅反运动“無成績可言”、根本不必要”，或者說反革命分子固然应

当肃清，但是不該搞“运动”，等等。我認为这些人的这种說法是完全錯誤的，現在我来談一談我的認識。

一、說“肃反运动不必要”是錯誤的。

我認为肃反运动非常必要，沒有肃反运动，反革命分子会造反，社会主义事业会遭受破坏。

首先，我們回忆一下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五五年的情况吧：那时候正是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前夕，各阶层人民正在为迎接这个偉大高潮而积极准备，就在这个时期，反革命残余势力积极活动，企图死灰复燃，他們进行些什么活动呢？就本市情况来举例：反革命分子乔兰春（已逮捕）接受了蔣匪特务机关“內政部調查局”的委派，充当“內調局西安分站主任”，积极刺探本市工业建設和飞机場的情报，那个时期先后8次往香港报送。蔣匪特务机关“行动委员会”派遣来的特务黄克明（已逮捕）两次从本市向香港特务机关联络，要扩大活动。逃亡反革命分子李福来（已处决）一九五三年开始成立其反革命暴乱組織“中国派遣軍”，一年多的時間发展了几百人，并且把他們的骨干分子紀俊周、晋德猷等投入我建筑工地做工，掩护活动，待机暴乱。一貫道首施培德（已逮捕）也在这个时期开始在本市西郊挖掘地洞，共挖了九个地洞，并且屯集粮食，布匹、食盐，准备暴乱；至于反动标語、反革命謠言那个时期也是逐漸增加的；有一些原已逃散的反革命分子又复聚攏起来，有一些原来表現似乎已經安分了的反革命分子却又蠢蠢欲动了，按照他們自己的想法和說法，他們要迎接第三次世界大战，他們要“迎接蔣总

統回南京”。能够容許这种現象存在下去嗎？能够听任这些事情发展下去嗎？显然，决不能容許存在，决不能听其发展。非常清楚：如果放松了对反革命分子的镇压，就是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不負責任和犯罪。

再就肃反运动的結果談一談：一九五五年七月以来本市肃反运动中一共搞出来多少暗藏反革命呢？肃反运动是在两个战綫上进行的，即社会鎮反运动和内部肃反运动。通过社会鎮反运动共清查出来反革命分子1972名，通过内部肃反运动共清查出来1091名，合計为3063名，如果把从駐市省級机关内部查出来的算到一起，一共超过4千名。这是一九五五年七月至一九五六年底的数字，这是經過調查核对最后定案为反革命分子的数字，而且运动前已經处理过的和运动前已經基本交代了問題的反革命分子都沒有計算在內，曾經一度認定为反革命后来又平反了的也沒有計算在內。請想想吧！在我們西安市这块地方暗藏着4千多名反革命，其中两千多名鑽到了我們机关、学校、工厂、企业的内部，这能說肃反运动“不必要”嗎？如果不把他們清查出来，我們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有保証嗎？我們的人民民主政权能够巩固嗎？我們人民的安全有保障嗎？或者有人說，数字虽然4千多，不一定是重要反革命。当然，絕大多数是历史反革命，而且他們的絕大多数在坦白交代問題之后，在表示愿意悔改的情况下得到了寬大处理，不但免去了刑事处分，有許多还是免去了一切处分；可是其中也确有現行反革命分子，还有不少是罪惡很大的，有的則是血債累累。例如从西安畜牧学校查出的在該校充當“管理員”的刘字光，系軍統特务，河南伊川县人，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九年一直在蔣軍里做政治工作

和特务工作，充当过团的中校政工主任、政治副团长，师的政工主任和政工处长，經他直接、間接殘杀的共产党员和善良人民实在太多了，仅以一九四六年在山东胶县的两个多月內就殘杀了我地方干部、民兵和农民等40多名。其中有一次在胶县大行村，說是群众給解放军通了风，竟將該村农民宋守成、宋柳氏一家大小5口由屋內拉出，枪杀在院中，又有一次先在馬店乡将我一个部队干部韓泉綁在树上用繩勒死之后，又到罗丰乡农民吳恒运家，将我胶县县委3人、农会干部一人打死，随后又将农民吳恒运、王書城、吳云亭等7人帶至匪部，用尽了灌凉水、針刺指甲、木棒通肛門等等惨刑，有的當場惨死，有的成了殘廢。这个惨無人性的反革命在我畜牧学校里一直隐瞒着他的滔天罪恶，肃反运动中我們畜牧学校派了两个干部在山东、河南进行了半年多的調查工作，终于把他調查清楚了。从交电公司查出的反革命分子王安家，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九年一直在閩錫山特务系統干事情，先后充当过县的“政卫团长”“政卫特派員”、保安司令部的“上校审訊員”，由于他瘋狂地杀害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劳动人民，一九四七年曾受到閩錫山的“傳令嘉奖”，太原解放前夕經過他的“审訊”与“报請”还活埋过13个人。社会鎮反运动中捉到一名王琪川，化名袁岐山，解放后曾化用过6个名字，河南修武人，日寇占领期間充当过日伪軍的班长、排长、自卫队长，日寇投降后又当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保长、区队长、軍統特务机关新乡站的少尉交通員，他的其他罪恶就不說了，单說一九四六年有一次他率領匪徒把我修武县北張村村长王有智全家6口一并杀害，那种残忍凶过是难以笔墨形容的，当把村长王有智夫妇殘杀之后，他

說“斬草必須除根”，于是把王有智的4个孩子一个个活活地用繩勒死，其中一个是正在吃奶的一岁多的嬰兒；这还不算，他又命令把这6人的屍体投入枯井中，再用高粱杆子等物扔下井去来洩他的“憤气”；最后搶了王有智家里的东西，拉走了王有智的两头牛，变卖后大家分了脏；現經查明的該王琪川的血債已有十八条，其殘杀过程都是和上述情况相差無几的。再举一个一貫道首作惡的案例吧：大道首李良佐等一九五二年从沈阳逃来西安，伪造戶口証，組織假家庭，繼續进行罪惡活动。在沈阳时，北宁鉄路的火車司机張国圣夫妇被騙入道，張国圣全部家产被騙光，并且随同来到西安，到西安后被禁止夫妇同居，一九五四年張国圣想到政府檢舉，李良佐等遂把張国圣装入一木箱內，在房中挖了一个八尺深的坑，把張国圣活活地悶死之后埋了进去，还威胁其妻不准声張。这个案子也是社会鎮反中破获的，破案时屍体已被挖掘出来了，事情发生在本市西大街路南一百二十二号。

够了，例了不再举下去了，被殘杀了的革命干部、劳动人民，他們含冤于九泉之下，早已等待我們給报仇雪恨呢。多亏有了肃反运动，不然这些囚犯們一定仍然在我們机关內部和社会上隱藏着，說不定他們在这次“大放大鳴”中，还要装出一付正經臉孔和右派先生們同声喊叫“共产党下台”、“肃反运动不必要”呢！

自然也有这样子人，他們是看到一点就推翻全盘的。譬如，有的人看見某个单位或者某个街巷在肃反运动中沒有发现反革命，他們便断言整个肃反运动“不必要”；如果他們又发现了这个单位、街巷在肃反运动中有缺点的时候，他們又把整个肃反运动說成“糟得很”了。且不說这个单位、街巷肃

反运动的真实情况如何，即令真的是这个单位、这个街巷沒有查出反革命，而通过运动提高了思想觉悟和政治警惕性，沒有漏掉反革命并且把原来被怀疑的人的各种問題弄清楚了，加强了相互間的信任和团結，仅此一点，难道不是很大的胜利和成績嗎？可見他們这种片面的看問題的方法是极其錯誤的，从这种錯誤角度去看肃反运动，必然要得出錯誤結論。还有一些人所以持有这种錯誤看法，則并不是因为什么不了解情况或是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而只是因为他們是別有用心而已。

二、說“肃反不该搞运动”是錯誤的。

肃反搞群众运动是正确的和必要的，沒有这一条便沒有肃反战线上如此巨大的胜利；正因为搞了群众运动，才能够在一半年的时间里基本肃清了残余反革命。有的人說，社会鎮反可以搞运动，内部肃反不可搞运动。但是我們大家都認為，内部肃反同样必須搞运动，因为正是在群众运动中，批判了麻痹思想，擦亮了群众眼睛，我們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取得胜利的；一句話，正是依靠群众运动才把隱藏于我們内部的反革命分子搞出来的。我們且来談一点为什么内部肃反也必須搞运动的理由吧：首先，反革命分子是借着人民群众麻痹大意和警惕性不高而存在的，他們是运用两面派的手法来进行活动的，沒有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擦亮人們的眼睛，克服麻痹思想，識破他們两面派的手法，是不可能迅速使运动开展起来和深入下去的，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政治警惕性的提高，肃反斗争經驗的取得也只有經過群众自己行动起来即群众运动才有可能的。不仅如此，搞肃反必須依

靠材料。也只有群众思想觉悟和政治警惕性提高，才能解决材料问题。内部肃反运动中，市和区級各单位計有一万一千余人检举了反革命问题三万三千多件，加上赴外地调查工作中外地群众供给的材料，何止数十万件。这几十万件检举材料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的呢？难道不是因为有了群众运动才能出现的吗？而这便是暗藏反革命分子在群众运动中不能继续暗藏下去的根据。在群众思想觉悟和政治警惕性提高的基础上，才有群众性检举活动和群众性的调查活动。在这次内部肃反运动中，调查工作规模之大，投入的人力之多，以及调查工作中深入细致顽强的情况，可以说是相当的壮阔、艰巨、广泛的了；调查工作同志常常为了调查一事实奔跑几个省市，为了弄清一个问题几次往返地反复查对；在群众的合作帮助之下，他们的足迹遍及全国，他们调查了每一件可能调查的事实，就是在这样群众性的调查活动中，几十万件检举材料一件一件地作出了交代，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个一个地露出了他们的原形，把有一些多年作不出结论的悬案作出了结论，有一些反革命分子在这种情况下只得坦白投案向人民低头的了。以上说明什么呢？群众力量是伟大的，群众路线是非常重要的，群众运动的方法是一定应当采取的。设想不走群众路线、不采取“运动”方法而交由专门机关单独干，肯定的说，无论如何不可能有如此巨大的收获。

群众性的肃反运动诚然好，但是因为群众运动，如果掌握不好，难免发生一些偏差，即使掌握得好也难以保证一点偏差不发生；这次运动中虽然出现过某些偏差，但是运动仍然是好运动，因为它基本上肃清了残余的反革命分子，大大有利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

設的順利進行。我們說運動是基本健康的、成績是主要的，就是這個道理。暴風雨往往會傷害一點禾苗的，割治瘡癤難免要觸動一些好肉的。何況肅反運動是打隱蔽仗，稍有不慎易出偏差；領導運動應當十分警惕，發現了偏差要迅速糾正，但是不應當因為擔心可能出偏差而不搞運動，不應當看見某些偏差就否定運動的成績和它的正確性。

三、成績不容抹煞，偏差不可夸大。

肅反運動是基本健康的，它的成績是主要的、巨大的。西安市肅反運動的成績不僅只是搞出了四千多名反革命，運動中還教育和鍛煉了廣大群眾，群眾的警惕性提高了，同反革命作鬥爭的知識增進了；有個特務分子向他們的主子報告說，他們是處在千萬隻眼睛監視之下了，稍微動一下就會遇到危險的。請看我們的敵人是怎樣的駭怕肅反運動呀。肅反運動還糾正了機關內部和社會上的歪風邪氣，鼓舞了廣大幹部職工和各階層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熱情。肅反運動使得所有的領導機關了解自己的隊伍，搞清了很多人歷史上一些問題，這對於以後統籌使用自己的隊伍增進內部團結有莫大好处。總之，在社會主義革命高潮的前夕，經過肅反運動，基本肅清了殘余反革命，大大鞏固了人民民主專政，鼓舞了人民群眾社會主義熱情，所有這些鉄一般的主要的基本的事實，應當首先把它肯定下來。

肅反運動中是有一些偏差的，這些偏差，一方面是把某些本來可以不鬥爭的有些大大小小問題的人鬥爭得過分了一些，以及對某些人的處理上有偏輕偏重現象，另一方面，泥掉

反革命的現象也是有的。应当認真地對待運動中的偏差，同時還必須恰當地認識這些偏差，應該分別對待，不應當一概而論。比如說，有的人散放反動言論、有的人隱瞞政治歷史問題、有的人過去同反革命分子過往親密、有的人歷史上有過反革命問題等等，固然可以不必那樣鬥爭他，但是鬥爭了他也不能說完全沒有理由，他沒有責任嗎？應當說他在運動中受到群眾的懷疑與批判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當然，錯鬥了沒有任何問題的人的現象也是有的，這是一種完全的錯誤，然而這一種的人數是很少的。這樣講並不是說偏差就不算偏差了，不是的，偏差仍然是偏差，不過把偏差分別一下，把完全的偏差和部分的偏差、把可以避免的偏差和難以避免的偏差區別一下是必要的，有好處的。

所有這些偏差，或者在復查案件中发现，或者在被處理者申訴時发现，不論怎樣，一經发现，就要根據“有錯必糾”的原則平反、糾正，事實上善後工作已經做了，有新发现的正在進行。經過善後工作之後，絕大多數被錯鬥爭、錯處理過的都已經消除了隔閡，愉快的工作了，但是個別無理取鬧的現象也有，他們只說是被鬥爭了，只覺得自己“冤枉”，他們沒有想一想為什麼會被鬥爭；只覺得鬥爭他們的人如何如何不應該，卻沒有反躬自問一下他們那些對不起人民的事情，人民應該不應該過問一番，我以為這些人也應當回頭想一想吧！也還有這樣子人，他們的思想並不糊塗，只是他們的立場是反動的，他們故意地抹煞運動的成績，夸大運動的缺點，從挑撥的角度出發來反對肅反運動，這是種別有用心的人，他們所反對的實際上不只是肅反運動，而是整個社會主義；一切善良的人民包括所有的具有糊塗思想的人們應當

和这些人划清界限。

以上是我对肃反运动的粗略看法。

现在肃反运动已经结束了，国内敌我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了，大家都在讨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了；应当注意的是，就在这个当儿有些人似乎完全忘掉了反革命仍然存在，这种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应当怎样认识目前形势呢？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完成，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随着整个政治形势的变化，肃反斗争的形势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就是说经过一九五五年七月以来肃反运动之后，反革命残余势力已经基本肃清，反革命分子更大的减少了，反革命赖以生存和活动的社会基础从根本上有了很大削弱。毛主席说“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这便是目前国内敌我斗争的基本形势。反革命残余势力基本肃清了，但是还没有完全肃清，而且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尤其从海外派来的特务分子还会继续发生；反革命分子赖以生存和活动的社会基础很大地削弱了，然而还没有根本消灭；这种情况不容许我们高枕无忧。事实上，肃反运动结束之后，有一些漏网的反革命分子看见风头过去，又在蠢蠢欲动了，有的还很猖狂，最近本市公安机关破获的报纸上已经登载过的两件反革命企图暴乱的案件便是明证。两个案子告诉我们什么呢？还有敌人存在，并且敌人在镇压压力稍微放松的时候他们又开始活动了；因此，现在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莫要忘记敌我矛盾只是基本解决还没有完全解决，应当继续提高警惕，留神反革命分子在我们讨论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当儿他们做些什么。

（1957年7月21日西安日报）

肃反运动在兰州

甘肃日报記者 兰坪

肃反运动的真相如何？这是很多人关心的問題。記者为此走訪了有关部門，閱讀了有关档案和材料，并且征求了群众的意見，下面就是这次訪問的記錄。

兰州市的肃反运动是在一九五五年八月下旬开始的。在此以前，反革命分子利用各种机会，采取各种阴險手段，破坏社会主义建設事业，暗杀，放毒，制造謠言，涂写反动标语，組織各种反革命集团，企图顛复人民政府。有許多过去血債累累的反革命分子，仍然逍遙法外。这激起了广大群众的义憤，紛紛要求肃清反革命罪犯。請看八月份报纸上的一些标题：

三日：政协省市委员会、各民主党派、科学教育界人士举行座談，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保卫建設。

五日：甘肃省广大人民連日举行座談会，决心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十一日：省工商联第二次执监委联席会议通过決議，肃清暗藏在工商界的一切反革命分子。

十八日：兰州市各界人士繼續来信，决心把一切反革命彻底肃清。

二十日：兰市八区五乡居民举行座談会，决心协助政府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

二十一日：兰州广大群众来信，决心提高警惕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

二十二日：兰州市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决议，坚决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

.....

以下不用再引了。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数字：从八月中旬到十月底，仅兰州市就收到群众来信九千二百四十七件，信中都是要求镇压反革命分子和检举反革命罪犯的。甚至于连现在说对反革命罪犯需要施“仁政”和要求惩办“犯错误”的肃反干部的水梓先生，也在当时的省人民委员会第二十四次扩大会议上说：“为保障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进行，为我们将来的福利和我们子孙的幸福，就一定要提高警惕，坚决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这样，在各族各界人民的要求下，兰州市人民代表大会才一致通过决议，责成兰州市人民委员会立即广泛深入地动员全体干部和群众，坚决、彻底地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就在这种情况下，肃反运动开始了。

记者到兰州市公安局，借阅了一部分在肃反运动中被逮捕的人的档案。在这些档案里，包括审讯记录、亲笔供词、证物、判决书等等。下面就是根据已经定案的档案，摘录的几个反革命分子的“事迹”。

卢秉林国民党反动派的新疆监狱官，亲手杀害革命领袖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和进步民主人士三百多人以上。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解放后拒不悔过，混入兰州工人电影院担任对号员，长期隐蔽起来。

郭翰章等八人组织“反共青年救国军豫西办事处”，企

图与台湾香港蒋帮取得联系，在豫西建立“游击根据地”，并在河南、山西、陕西、甘肃、上海等地建立据点，以搜集情报，破坏铁路、飞机场，举行武装暴动。

· 楊国森 解放前参加閻錫山的“奋斗团”、自卫大队和特务大队，任中队长，率领敌军进行倒算活动，由他亲自主谋和杀害了两个村干部。解放后混入革命队伍，隐瞒上述罪恶，伪装积极，混入共产党内，先后担任了省城市建设局第一工程公司保卫科长，党总支書記等职务。

周家余 中統特务，一九四七年后并担任国民党区分部書記、伪乡长，曾主谋杀害共产党员及群众十四人，本人直接命案就有五起。解放后潜逃来兰，混入西区磚瓦厂，隐瞒罪恶，骗取了生产大组长职务和先进生产者的荣誉称号。

以上只是大批案件中的几件而已，但它已足以说明被逮捕法办的究竟是个什么人。总之，不外乎是反革命罪犯、特务、杀人犯、劊子手、武装匪徒等等。

这些人被法律制裁以后，在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什么情况呢？这里也有几个頗有兴味的数字：一九五六年上半年与一九五五年同期比較，在工矿企业中破坏性事故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三，各种刑事案件下降了百分之三十二点八，反动謠言从一百零六件下降到零。广大群众普遍反映社会秩序更加安定了，基层干部也觉得工作好做了。

肃反运动总的情况如何呢？是不是缺点大于成績呢？記者訪問了兰州市人民檢察院負責人，这位負責人說：“我們先看一下事实。在社会鎮反方面，从一九五五年元月到一九五六年九月，在已經处理的反革命案和刑事案中，冤案占百分之零点九，錯案占百分之二点八，在机关内部肃反方面，

共查出反革命分子二百五十五名，逮捕了五十九名，其中有十九人可以逮捕也可以不逮捕。”这位負責人說：“当然所謂錯和对，是有关部門曾先后联合檢查好几次的結果，这是我們一贯的制度，对于錯的都作了适当处理。根据这个統計我們完全可以說：我們作的是正确的，不管別人喜欢不喜欢听，成績仍然是主要的！特別重要的是，反革命分子已經基本肃清！”

这位負責人繼續說：“但是，这并不是說沒有缺点，有些缺点甚至是很严重的。發生的冤案錯案虽然很少，但对当事人來說，却是一个很严重的問題。产生这些錯誤的原因，主要是政策界限不清和材料失实，就內部肃反來說，有的单位斗争面寬了一些。这些錯誤是不好的，應該从中取得教訓，把工作作得更好些。”他說：“不过，党和国家的方針是‘有反必肃，有錯必糾’，所以能保證得到平反；不会冤沉海底。事实上，凡是最后定案的都經過了慎重的調查研究，作到証据确凿，已經发现有錯的都作了糾正，立刻釋放，并向本人陪情道歉，补发工資；生活困难者还給予救济或介紹职业！”

檢察院負責人說：“我們另外一方面的缺点，就是漏掉的反革命仍然还有。比如最近党的整风运动开始后，反革命标語又突然增多了，这應該引起我們的警惕！总之，我們要本着‘有反必肃，有錯必糾’的方針，一方面准备再次对肃反工作进行全面檢查，总结經驗教訓，彻底糾正缺点錯誤；另一方面也要繼續保持警惕，加强工作，发现反革命分子就坚决消灭他！”

六月二十三日下午，記者訪問了住在中山林的肃反积极

分子陶育英。她曾經在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六年間，檢舉和協助公安部門逮捕了各種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一百餘人。由於她對肅反工作情況了解較多，因此請她談談對肅反的印象。她一開始就激動地說：“我看到報紙上登的右派分子的說法以後，氣得滿身發抖！這是胡說。肅反是正確的，沒有肅反，我們人民的天下就不會鞏固，我們的建設就不可能這樣快！”她告訴記者，她正在準備在她愛人的幫助下，給報紙寫信，批駁右派分子的錯誤言論。

她回憶說：“過去中山林一帶居民的來源和成分很複雜，社會秩序很不好，並且窩藏着反革命分子和各種刑事罪犯，群眾對政府很不滿意，認為沒有鎮壓這些壞人。在我檢舉的一百多人中，沒有冤枉一個人。這主要是靠群眾的幫助，群眾是擁護肅反的。”

陶育英說：“那些說肅反搞糟了的人，是替反革命說話，替反革命痛苦。從那里說政府把肅反搞壞了？相反的，現在有好些群眾找政府提意見，他們也對我說：肅反還是不徹底，把壞人打的不狠！你听听這話說的多對，打敵人就是要狠的！”陶育英最後再一次對記者說：“總的一句話，肅反是正確的，我們是完全擁護的。說肅反不好的人，是和反革命分子長着一個舌頭，我們要堅決抗議！”陶育英的話，實際上代表了廣大群眾的呼聲。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里，記者認識了中國人民銀行蘭州支行的職員王宜鈺。當記者知道他在肅反運動中曾被追查過歷史問題時，就請他談談對這個運動的意見。“我在肅反中是重點對象！”他很誠懇地說，“但是，我覺得肅反運動是必需的，它對社會主義建設有很大好處。當然，肅反是有缺點

的，比方有些斗争面宽了些，可是不能因此否定肃反的成绩，不能夸大这些缺点。在我们机关里查出了五名反革命分子，这就是很大的成绩，大家思想觉悟提高了，这也是成绩”。

王宜钰解放前曾参加过复兴社担任小组长，又是三青团的中队长，以前一直没有交待，因此，思想负担很沉重。他说“以前我最怕组织上让我写履历填表格，又怕同志们知道，但又想含糊过去，心里很痛苦。这次运动以后，我认识到应该痛恨历史上的污点，同时作了结论，还在好人之列，包袱放下了，心情就非常愉快。所以我应该感谢这次肃反把我挽救出来。”

这位知识分子出身的人继续说：“经过这次运动，组织和同志们并没有看不起我。一九五六年我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而且也提了级，增加了工资；同时领导上也检查了肃反中的缺点，作了纠正。这一切都说明党是公正无私的和伟大的！”

(1957年7月7日甘肃日报)

肃反运动搞得很好

· 民革中委杨亦周先生访问记 ·

新华社记者 方 梦

肃反运动究竟是不是“一团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天津市委委员会主任委员杨亦周作了完全否定的答复。他说肃反运动是完全必要的，成绩是伟大的。

杨亦周是政协天津市委委员会副主席，天津市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最近他和七十多位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委员，对天津市的肃反工作进行了一个半月的视察。他们听取了公安、检察和司法等单位的工作报告，就逮捕、申诉和司法、检察、公安三个部门的互相制约等问题研究了三百多件反革命案件，并到监狱和劳动改造单位同正在服刑的反革命罪犯一百多人举行了八次座谈，还接见了一些在肃反运动中被斗争过的人。

楊亦周向记者引证了许多具体事实说明肃反运动的伟大成绩必须肯定。他说，经过这次运动，一九五六年在全市发现的反革命标语和传单比一九五五年减少百分之七十八点八；工厂的破坏性事故减少百分之七十七点八；公安机关缴获的各种长短枪达一百四十五只，子弹一万多发，手榴弹及各种小型炸弹七十多枚，还破获一批有现行活动的反革命案件，其中有不少是在反革命分子正在进行破坏活动时，当场逮捕的。

楊亦周说：过去我也有右倾麻痹思想，对反革命分子的危害性认识不足，总觉得人民已掌握了政权，就是天下太平。但是经过这次视察，不禁恍然大悟。例如在肃反运动后期才被清查出来的有七条血债的反革命分子黄应中，他是中统局的一个组长、国民党第五十二军补充兵团的副官。解放后，他化名张学诚混入了解放军，并且伪装积极混入了共产党。一九五四年转业以后，他被分配到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工作，并且骗取了党员的信任，当了支部委员。另一个隐藏在水利部驻在天津的一支勘测总队的反革命分子刘毓林，在群众揭发了他的罪行以后，他杀伤了积极和他作斗争的共青团支部书记王维华。楊亦周说：这些事实已足够说明我们国

家在当时是有大量反革命分子存在的，其破坏活动是严重的，因而肃清反革命分子的运动是绝对正确的。任何诬蔑，都站不住脚。

有人說：肃反对象都是共产党主观确定的，共产党员們借此进行打击报复，冤枉很多好人，甚至說全部搞錯了。楊亦周認為这种說法是毫無根据的。他說：从我对这一工作的視察来看，正如公安部罗瑞卿部长所說，肃反运动是专门机关和广大群众相結合的对敌斗争的运动。全市在一九五五和一九五六年中，群众检举的各种反革命分子的线索和嫌疑材料，达一万四千多件。在炕洞里躲藏了五年的反革命分子李少甫就是因为群众揭发而被捕的。在广大群众的压力和政府的寬大政策感召下，有六百九十一名反革命分子投案自首，如解放初期曾在海河金鐘桥附近炸毁一艘滿載軍用物資的帆船，同时炸伤八个人的国民党保密局特务袁德福，在肃反运动中自首以后，只被判处五年徒刑。

这些铁的事实怎么能說是共产党主观确定的呢？又怎么說是共产党员趁机打击报复呢？楊亦周說：在我所視察的那些反革命案件中，沒有一件不是經過反复的調查和甄別，根据确凿的証据，按照法律手續来办理的。如隱藏在新生橡胶工业社的反革命分子黄金貴，曾經参加地主“还乡团”对翻身农民进行殘酷的反攻倒算，抓捕农民和村干部十五人，进行毒打，解放后还常常造謠恐吓軍屬和积极分子。公安机关在逮捕他以前，就掌握了有关他犯罪行为的二十一项証据。在逮捕的反革命分子中，也有因証据不够充分，法院重新退回檢察机关补充偵察的。如曾在河北省献县任伪警备队大队长的崔志禹，由于他被捕后所招供的犯罪情况，同旁証及群

众检举材料有不一致的地方，法院便把它退回检察机关补充偵察。还有一个历史上有罪惡的“三青团”分子齐建华，在解放后还私刻图章，伪造証件，騙报戶口，公安机关掌握了他的証据依法逮捕以后，检察院决定起訴，但法院認為他在被捕后态度老实，坦白彻底，而且罪惡不太严重，便免于起訴，經過教育以后寬大釋放。楊亦周說：我希望那些誣蔑肃反运动“完全搞錯了”而替反革命分子說話还不自覺的人，也来看看这些無容辯駁的事实。

当記者問他在視察中是否发现一些真正被冤枉的案件时，楊亦周說：我在視察監獄和劳动改造单位时，曾和許多正在服刑的反革命罪犯交談过，他們沒有一个不承認自己的罪行的，沒有一个認為把他逮捕起来是冤枉了的。我曾多次問他們这是不是真話？他們都毫不犹豫地回答說：决不撒謊，而且当时並沒有警卫人員在場監視。他們唯一的意見，就是希望政府寬大再寬大。但是，究竟有沒有一度被錯斗或錯捕的呢？楊亦周說：有。但是，有的人是因为平常不断散布一些反动言論，或者是历史上有問題沒有交代清楚，在肃反运动中引起群众的怀疑追問而被斗争的。如南开大学生物系職員李崇熹，在肃反运动中并不是斗争对象。但是群众揭发出李崇熹曾經故意破坏过許多仪器和常說落后話等許多可疑的事实，于是群众就要他坦白那些言行的动机。后来經過調查，李崇熹破坏仪器是由于个人极端自私狹隘，思想落后造成的，並沒有反革命行为。楊亦周認為：象这种平常有許多令人怀疑的迹象的人，在肃反运动中被群众斗争是不可避免的。錯捕也是由于类似的原因。还有一些人被捕后，因实行新的寬大措施，获得釋放，于是有些人就抓住这一点来进行

歪曲宣傳，到处叫嚷肅反运动侵犯人权，随便捕人。應該承認，由于某些部門的有关人員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对一些問題不加細致的分析研究，把一般政治历史問題当成反革命罪行，把落后或反动言論当作以反革命为目的的造謠破坏，或把責任事故当成政治性破坏事故，还有的是被捕的反革命分子为了企图減罪，嫁禍于人，乱檢舉，也有根据不完全可靠的敌伪档案材料来逮捕的，因而錯捕了一些人。但是这毕竟是极少数，和整个运动的成績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而且这些被錯捕或錯斗的人，一經发觉，都得到了迅速的平反。除了立即釋放，向他道歉和对周圍的群众作解釋以外，并且恢复他原来的工作，补发他被捕时期的工資。对問題不大而經過寬大处理被釋放的人，政府还发給他生活補助費，替他安置工作，而对被斗争的“有缺点的好人”，除了公开給他作結論以外，同时还对他进行教育，帮助他改正缺点。楊亦周說，必須指出：有一些单位，对这种善后工作，处理得还不及时，这种拖拉作风已引起一些人的不滿，并且使那些誣蔑肅反运动为“一团糟”的人有机可乘，这些部門應該立即扭轉这种拖拉作风。

楊亦周說：肅反运动不仅清查出許多反革命分子，擦亮了人民的眼睛，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同时还直接帮助許多人搞清了自己的政治历史問題，博得了党和人民的信任。我們今天对党和国家的工作，能够进行公开而尖銳的批評；各个方面的事业，能够象今天这样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鳴”，同肅反斗争的成就是分不开的，这是我們的国家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又一保證，我們决不允許任何人誣蔑这一为国为民的正义斗争——肅反运动！（1957年6月24日人民日报）

誰說肅反搞錯了

· 越劇演員許瑞春訪問記 ·

新華社記者 孫傳鏞

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說：“肅反運動百分之九十以上搞錯了”。西安市越劇團演員許瑞春以親身慘遭反革命分子殺傷的事實作了否定的回答，批駁了右派分子這種謊言。

許瑞春最近學習了周總理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所作的工作報告。她認為，周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對肅反運動的估價一點也沒錯，政府對反革命分子的處理，絕大多數是正確的，偏差極少。”她非常氣憤地說：“有人認為肅反運動搞得黑漆一團糟，這分明是胡言亂語，肅反運動的成績是偉大的，有鐵的事實為証。請那些右派分子睜開眼睛看看。”

許瑞春談到這裡，改變了一貫高嗓門，以低沉的語調向記者訴述了她在上海慘遭反革命兇殺的經過。她說：“前年也正是現在一樣初夏時分，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三批材料已經公布，肅反運動剛開始的時候，我在黨的教育下，提高了政治覺悟，檢舉了劇團里的反革命分子朱桐森暗藏武器等罪惡活動，公安機關逮捕了這個壞傢伙。那里知道激起了另一個反革命分子的無比仇恨。七月七日晚上，朱桐森的哥哥朱燕森，乘我打好臉譜到服裝室更衣的時候，闖進室內，手執菜刀朝我腦門狠狠砍來，我根本沒有防備，躲避不及，頭部被砍傷，當時我穿著的白綢衫，領角、汗衫等衣服通染鮮

血，幸亏剧团团长高劍琳和职工韓千岳等聞声赶来奋勇搶救，我才免遭死于非命。当时，朱燕森还蛮橫頑抗，并用牙齿咬夺他菜刀的人的手，猖狂絕望地說：“你要斬草除根，要檢举我，哼，我就要杀你許瑞春！”“我要杀人，我准备被枪毙”。許瑞春激动的說：“請看反革命分子的嘴臉是多么阴險毒辣。朱桐森和朱燕森这两个坏蛋，他們解放前聚众賭博、械斗，到处欺压人民；解放后又在剧团里挑撥离間，散布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打起来等反动謠言。我們越剧界許多女演員过去受尽这些流氓、恶棍、反革命分子的欺侮和迫害，今天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給我們撑腰，除掉这批害群之馬，难道还有什么不好嗎？”

許瑞春列举了自己亲身經歷說：“我被反革命分子朱燕森杀伤后，戏院里許多观众都十分义憤，紛紛要求政府依法严办，有人提出要當場枪决。政府接受了群众的要求，把反革命分子朱燕森枪毙了，这难道說不是正确的嗎？这些兇恶的反革命分子不杀掉能行嗎？”

她又說：“我进医院治疗后，党、政府以广大人民群众都寄于深切的关怀，我的床头边插滿了慰問的花束，先后接到了来自各地各个崗位的七百多封慰問信，包括有工人、农民、学生以及远在边防和朝鮮守卫的解放軍和志願軍。他們来信都表示支持我檢举反革命分子的正义行动，一致要求严厉惩办反革命兇犯。”这些事情究竟說明了什么問題呢？許瑞春自己提出发問自己回答說，“这表明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正确教导下，絕大多数人民是能够明辨是非，会分清敌我的。虽然右派分子用恶毒的語句来誣蔑党的肃反政策，但我相信，右派分子的这种妖言毒語絕对离間不了我們和党的血

肉关系，全中国人民是会衷心拥护党内的肃反政策的。我们相信党，永远跟着党走。”

許瑞春对記者說，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說得很对，階級斗争並沒有完全結束，我們要繼續批判一切反社会主义思想，提高警惕，肃清一切公开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她說：“当初朱燕森在蓄意謀杀我的前些日子，虽然装得很和气，但是有时神色張慌，言談也流露出許多不正常的地方，可惜我沒有留神觉察到；因此被他砍了两刀，差一点致死。这主要当时自己思想比較麻痹，政治嗅觉不够灵敏，我恨他們沒有他們恨我来得深。許瑞春最近在报上看到共产党员申林台一家九口被反革命分子惨杀七口的新聞报道后，更激起了她对階級敌人的仇恨。这位有二十多年舞台生涯的著名越劇女演員义正詞严問道：“我要問問这些右派分子，难道你們愿意看到更多無辜的嬰兒被反革命分子处于死地？这些反革命分子难道是共产党内部圈定的嗎？”她再三表示，肃反运动中处理的反革命分子，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正确的，沒有錯，这是全国人民一致的要求。最后，許瑞春語重心长，希望記者代表她寄語全国絕大多数拥护社会主义建設的人民說：“目前反革命殘余虽然已是极少数，但是，我們不要上右派分子污蔑党的肃反政策的当。仍然要提高政治警惕，不能有絲毫疏忽麻痹，我自己的遭遇就是一个很大的惨痛教訓。我希望大家團結在共产党周圍，积极反击右派分子的反动謬論。并且正确地帮助党整风。

(1957年7月1日西安日报)

“肃反运动太好了”

· 大連造船厂老工人黃兆林訪問記 ·

辽宁日报記者 牟承启

“同志：你把我的話詳細地記下來，登在報上，讓大家看一看。右派分子說咱們搞肅反沒有人性，到底是他們說這話沒有人性，還是咱們沒有人性。絕不能叫他們把白說成黑，把黑說成白！”我去訪問大連造船厂老工人黃兆林的時候，他的臉气得刷白，一开头就向我講了這一段話。接着，他緊握着拳頭，顫抖着嘴唇，一字一句地述說了他和他的伙伴遭受反革命分子慘無人道迫害的經過。他說：

“一九四二年小鬼子統治大連那時候，我在碼頭上当搬運工人，拉家帶口，生活很困難。當時我們有幾個窮朋友，都是靠賣苦大力糊口，誰要是過不下去了就互相幫助幫助。那會想，這也成了反革命分子迫害我們的借口。反革命分子謝崇田當時在日本憲兵隊當憲補，有一天早晨天還沒亮，他帶着一群狗腿子和日本人，把我們十二個人全都抓到日本憲兵隊去了。反革命分子謝崇田硬說我們是共產黨八路軍，誰要不承認他們就嚴刑拷打。每天晚上電燈一着，就是我們到了受折磨的時候了。謝崇田和另外一群狗腿子把我們提出去，甚么毒辣刑具他們都用遍了。他們用麻繩蘸上水往我們身上抽，把皮膚都給打開，滿身都是鮮血。他們把四、五根竹板子綁在一起，掄起來往你腦袋上打，一縷一縷的頭髮帶着血淋淋的頭皮掉在地上。我們當中好幾個人后背都被打爛了，

露着白花花的骨头，叫人不忍心看上一眼。打成这样，敌人还不肯罢休，还是照样拷打、审问。我们十二个人被折磨得胳膊、腿象麻杆那样细，那还能站着走路，都是爬着到审问室去受罪。折磨这个样子怎么还能活得下去，我们当中有五个人死在监狱里了，有一个人从监狱里抬出十多天也死了，还有三个人到今天下落不明，不知是死是活。敌人看见我和朱吉坤、樊惠卿三个人也快死了，才把我们放出来，我们三个人这才从死里逃生，算是捡了三条命。但是，我已经变成一个残废的人了。原来我在码头上二百多号人当中是数一数二的体格，一次扛六块豆饼不算甚么。可是从监狱里出来以后简直变成了另一个人，当时连一块豆饼也扛不动了。我的脑子和内脏都被打坏了，害得我十四年来一直是个病人，不能干重活，只能当一名清理工人。当我从监狱出来去探望牺牲了同志的家属的时候，他们的妻子、儿女和老母亲为生活所迫已经流落到他乡去了。我看到这种家破人亡的悲惨情景，心里如同刀绞地一样，又难过，又是恨……。”

黄兆林讲到这里他的语调异常沉重，我看见他内心有着无法形容的痛苦，是语言所不能表达的。可是很快他就抑制住了，又抖起精神气愤愤地说：

“右派分子说搞肃反没有人性，不应当肃反，又说甚么肃反搞糟了，没有成绩，共产党犯了个大错误。我一听这些话真是火冒三尺，气不打一处来。我要问这些右派分子：你们说的人性是甚么人性？难道反革命分子替小鬼子帮凶，把我们毒打得死的死、残废的残废，害得我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就叫作是有人性吗？不然你们为甚么说我们把那些血债累累、罪恶滔天的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把他们肃清是

沒有人性呢？我過去接觸的每一個善良人民，他們對我們所遭受的殘酷迫害都給以極大同情，對反革命分子都咬牙切齒地痛恨，他們說：在反革命分子身上嗅不到人的味道，簡直連禽獸都不如，黨和政府作的對，該殺的就殺，該關的就關。可是右派分子不但不痛恨反革命分子，為甚么還說肅反是沒有人性替反革命分子申冤呢？我看不光反革命分子沒有人性，說這些話的右派分子也沒有人性，因為出自他們嘴里的話和反革命自己說的一摸一樣，誰敢說反革命分子那些勾當他們干不出來。

我從監獄出來那一天就下了決心：這個仇非報不可，不然死也不能甘心。但當時又一想：天下是敵人的呀，象我這樣人有何辦法呢？！我又失望了，以為這個仇這輩子也別想報了。可是解放以後天下是人民的天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辦的每一件事都對我的心，特別是肅清反革命這項工作簡直就象按照我的意見去作的似的。就拿迫害我們十二個人的那個反革命分子謝崇田來說，解放後他一直逍遙法外，並沒有向人民低頭認罪，直到這次肅反運動展開以後才被群眾檢舉出來。我們活着的三個人聽到逮捕這個反革命的消息，心里比娶妻生子還高興。我暗暗向死去的六位同志說：‘你們的仇有人給報了，應當感謝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朱吉坤還特意喝上几盅酒，表示慶祝共產黨替自己報仇雪恨了。右派分子說不應當肅反，我要問：講這話你是安的甚么心，目的何在？如果不是這次肅反我們的血海深仇能夠報嗎？難道還叫反革命分子逍遙法外仍舊為非作歹嗎，我們死的白死，殘廢了的白殘廢嗎？右派分子說肅反搞糟了，沒有成績。我說肅反搞的好，搞的對，成績太大了，要不把反革命分子肅清

人民的天下就坐不穩，過去受反革命欺壓的人今天還是抬不起頭來。右派分子說共產黨搞肅反犯了個大錯誤。我說這是共產黨給全中國人民作了一件最大的好事，我要告訴我的兩個兒子，還叫我的兒子告訴我的孫子，要他永遠記住：誰要是說共產黨搞肅反是犯了錯誤，你們就要時刻警惕他，提防他！”

（1957年7月18日遼寧日報）

保卫“肅反”成果，坚决打击 右派分子的污蔑

哈爾濱師範學院 周 齊

哈爾濱師範學院在一九五五年肅反運動中，曾經審查過我的歷史，原因是我有歷史問題，同時，平常言行也有不對頭的東西。在審查時，我的情緒上是有不舒服的地方。可是，我相信黨的方針，也確認自己是個好人。經過肅反，給我做了歷史結論，對於我政治上進步的鼓舞是極大的。同時受到深刻的階級立場的教育。在今年鳴放以來，師院的肅反專題座談中又得到不少教育。特別是在聽了毛主席的報告以後，我自己在認識上又進一步提高了。如果說過去是心情上基本是開朗的，現在就連最後的一點陰影也掃去了。

因此，我願意談談我對師院肅反問題的一些看法。

現在有一部分人認為師院過去肅反運動沒有什麼收穫；所持理由是具體的成果不大。我現在不同意這種看法。

我以為成果應該從多方面來進行估計。首先師院肅反是純潔了內部。從一九五五年下半年起，師院職工中的政治氣

氛大为增长，这应该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政治热情的增长不仅表现在一九五五年后师院的党组织和各民主党派有了相当发展；而且表现在团结关系上，无论是党群之间，群众之间都比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这是师院肃反的成绩。

其次还应当看到许多人的历史问题搞清楚了，有不少人过去多年来背着的历史包袱，现在一旦丢去，对于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谁也能体会到这种欢愉的心情的，这些人从此真是神清梦稳，对于全心全意从事社会主义建设说来，应当说轻装上路。

从上述看来，师院的收获是很明显的，是巨大的，是主要的、基本的。

师院肃反运动也有缺点，但是不用象馮玉明等所提倡的须要组织什么“平反委员会”，因为，过去肃反中处理过的，碰过的，今天都在学校，都在原有的工作岗位上，这还何平之有？肃反座谈以后，党组织也立即建立了专门小组，按毛主席报告精神正进行严肃检查。我们相信如再发现有错误，自然会有进一步的纠正。

我自己认为师院的肃反工作当时的缺点有两方面，一是领导上调查研究做的还不够，因此在方式、方法上有不当的地方，和粗暴的地方。如果领导上更仔细一些，工作可以做得更稳，若干同志感情上少一番不甚必要的挫折，这对组织及个人都有好处。另一方面，师院虽然调查研究不足，总是有的放矢的，也是按不同情况不同对待的。但是，思想建设工作做的不很及时，也应该说有的人做的早；有人做的晚一些。有人做的够；有人就很不足。思想工作自然也要区别对象，某些人，组织上少做一点，他自己能解决问题；

某些人組織上做的略晚一些，就會增加更多思想包袱。總之，無論任何人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自己要努力解決問題；另一方面也總期待着組織上的溫暖。如果在他們還沒有產生“期待”的時候，組織上先把工作做下去，那會收事半功倍之效的。從個人說，單方面的要求組織是不好的，這會產生許多消極因素。從組織上說就要更多照顧一些。思想建設工作所以晚一些，我認為我們缺乏經驗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從一九五五下半年起整個中國進入社會主義建設與改造的高潮，在高潮中師院也是不例外的，政治熱情日益高漲，是否在这种高漲的情況下有一點忽視了原先殘余下來的消極因素？我自己揣度如此，不敢斷言，只做為一點看法而已。有人對待師院肅反問題，不採取歷史主義觀點，忽略了只有從社會主義立場，從人民立場來看待肅反運動，看待自己的問題，因此，忽略了培養自己思想中的積極因素，我認為這樣有危險，容易為右派分子所利用。

實際上，在師院“鳴放”期間，在師院專談肅反問題的幾次座談會上已經看出來了，有人是在鑽這個空子，對黨進攻。馮玉明、關貴武，就是這種人。他們是利用今天“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情況，去反鳴對昨天的肅反運動。馮玉明在座談肅反問題的中間，首先從會外來打擊對肅反問題有較全面估計的發言人，其方式在下面說該發言人的發言“聽來不無授意之感”，這個問題不僅僅應該看到對發言人的污蔑；還應當從問題實質上來看，這就是對正確對待肅反問題的態度的攻擊。隨後在肅反座談基本上已經達到暢所欲言的階段，又有人，從親身體驗中提出對肅反問題的正面的、正確的看法的時候，馮玉明和關貴武先後對於這種發言

进行了打击，他们企图用“言不由衷”；“口是心非”；“色装”等等词句来曲解别人正确的，由衷的，真挚的亲身体会。应该说，这是企图利用别人的历史问题，当做他们向党进攻的政治资本。这种企图是太可鄙了！肃反问题是极严肃的阶级斗争，只有相信党，党的正确政策，“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在近两三年来，人们已经改变了一个历史时代，我们进入了社会主义！毛主席在报告中指示的清清楚楚，这和肃反的巨大成绩有关。任何一个别有用心的人想把人们拉回到另一个时代去，这种企图是太恶毒了！他们敌视人们思想中的社会主义因素，他们在制造一切埋怨党，埋怨人民的声音，假如说在过去肃反运动以前，我还不能清晰分辨这种敌视党和人民的声音，警惕不足，那么伟大的肃反运动却教会了我如何来区别这种声音了！我相信这个事例，对我个人来说，就是铁一样的事实。因此冯、关之流的诽谤，我要给以坚决的打击！

我坚决拥护党的“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并且坚定地相信在整风运动中，这个方针还能得到更大的胜利！

储安平、葛佩琦、王德周以至冯玉明、关贵武之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应该得到全国人民的更严厉、更有力的痛斥！
(1957年6月29日哈尔滨日报)

感谢肃反解除了我的思想包袱

沈阳农学院副教授 谭启林

在一九五五年沈阳农学院肃反运动中，我是被重点追查

政治历史問題的一个，現在已經作出結論，不是反革命分子。我过去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等反动組織，和一些反动人物接触过，有些政治历史上的問題沒有弄清楚，思想上背了很大的包袱。肃反前，我作事总是退三步，看到党团员在一堆談話，我就离得远远的，一方面是避免自己的嫌疑，一方面是不愿給人不方便。工作上也不大胆。有一次，我研究合作化农民生活变化，感到有必要到农村去作調查，可是想到自己的历史，怕提出来領導不批准，面子不好看，就悶在肚子里不提。上課时我也是顧慮重重，只是根据教材“照本宣科”，我犹心說錯了，人們会联系历史問題来追究。这样一来，同學們都反映，我講課生硬、教条。因为自己疑心生暗鬼，工作上感到人人别扭，事事很不开心，家庭里也常常和爱人吵架，和孩子生气。

肃反运动中，領導上經過多方对証，弄清了历史上一些疑難的問題，給我历史作了結論，长期背在我思想上的包袱消除了，現在，我遇着党委書記再不回避了，也經常和党团员一块談笑了。在教学上也不那样被动和顧慮重重了。这一学期我主动要求領導帶同学下乡作了农村調查。在講課时，我也尽量根据自己認為正确的体会并結合辽宁地区的实际来加以发揮，不象过去那样拘謹了，这些已經得到了同學們較好的反映。总的來說，經過肃反，在政治上我和党靠近了，在我科学研究方面燃起了一把火，信心高起来了。

肃反后，我对家庭的态度变了，家庭格外和睦了，我看我的孩子特別乖，我看学校的房子好象大些了，庭园美丽多了，自己更年輕了。最近一年，也不再想离开沈阳农学院了。我爱人看到这种情况也很高兴，她說：“你这一年真变了。”

学校的肃反运动对保障全校师生的安全和加强内部团结也起了很大作用。在肃反中，从学校的食堂和托兒所都清除了一些恶毒的反革命分子，那个隐藏在食堂的反革命分子，还曾在稀飯里放毒，使許多同志中毒，嘔吐、昏迷。肃反后，清查出了一些反革命分子，每当我領着三个女兒上托兒所时，我为他們感到輕松。过去她們的小生命是曾在反革命分子炊事員倪伯康威胁之下的。这难道不是肃反賜予的嗎？

据根我个人事前事后的体会，肃反运动絕不是無中生有。比如領导上对我的追查是根据国民党县党部档案上委員名单上有我的名字的事实，这也是事出有因，并不是無中生有的。追查结束后，領导上为了对我負責，又派人到貴州、四川、新疆等地調查，弄清了那个县委委員的名字是县党部書記长为了吃空額沒經過我就添进去的，这更可以看出領导上是多么实事求是。（1957年7月26日辽宁日报）

談談我对肃反的亲身感受

青島七中教师 庄本农

在本市开展鳴放帮助共产党进行整风运动的同时，有少数的右派分子和对党不滿別有用心的人，抓住了本市大、中学校在第一批肃反运动中曾經发生的个别偏差和錯誤，故意扩大事实歪曲政策，利用他們的所謂“邏輯”和“結論”公开叫囂什么“非法扣押”、“逼供信”、“違犯宪法”等等，把青島第一批肃反成績是基本的、偉大的这一結論說成是“教条主义”“公式化”借以向党进行攻击、諷刺、謾罵，

同时对积极分子加以恶毒的打击和报复。

我在中学第一批肃反运动中曾在小组中交代过历史问题，肃反集中学习结束后，我曾经留校学习一个时期（是因为组织上对我的问题进行审核），所以当中学进入鸣放的阶段时，我就曾经一度在思想上对那些所谓“逻辑”和“结论”发生过共鸣，也曾随声附和说过这些调调。但通过右派分子斗争的开展，特别在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后，使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我重新回忆了我的过去，用镜子照了照自己，不仅使我的良心受到了谴责，同时在真理和事实的棒喝之下，使我感到自己的立场已经不知不觉的同右派分子站在一起，这是多么危险多么可怕！

我认为“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政策，在肃反运动中和肃反运动后，都是认真执行的，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下面我想谈一谈我对中学第一批肃反运动所了解的一些事实和亲身感受：首先在肃反运动中被斗的人或在小组交代问题的人，是不是象某些人宣传的那样或自己标榜的那样是完全的大好人，完全没有问题呢？是不是组织上没有根据地对他们进行盲目的斗争呢？事实不允许我说假话，不是这样的。据我所知道的，有的人在历史上是有罪恶而又未作交代；有的人历史复杂没有弄清或者是长期隐瞒了自己的历史；有的同反革命分子有来往、有关系；有的是对党不满散布反动的思想和言论，打击党员团员和领导、歪曲政府的政策，等等（这些问题都有一定的检举材料）。我们看一看这些情况，嗅一嗅这些味道，这不正是暗藏反革命分子最理想的温床吗？难道在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伟大阶级斗争中，对这些人（包括我在内）进行严肃的斗争，对他们进行审核、帮助他们

交代問題，弄清他們的真面目是沒有依据的嗎？是不應該的嗎？對他們本身是沒有好處的嗎？在運動中誰都受到了一次生動的偉大的階級鬥爭的教育（當然還有個別分子是例外），只要具有階級仇恨心的同志，當面對鬥爭中所揭發出來的一些反黨、反人民的事實和言論，以及某些沾滿人民血淚的罪惡行為而又拒不交代的情況下，誰能不憤恨呢？這樣，設身處地的想一想，群眾在激于義憤的情況下，曾經發生過某些偏差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況且黨並沒有掩飾這些錯誤，黨不但在運動中反復的向群眾交代政策，而且當發現這些現象時，也及時的加以制止和糾正。在平反工作中，領導上對這些問題也作了公開的檢討。關於肅反運動中，當交代問題的人思想鬥爭最劇烈的時候，為了避免發生意外，保證他們的安全，群眾犧牲了睡眠和工作時間，對這些人進行了暫時的監護，我認為在當時的情況下，是完全必要的。正因為這樣才保護了某些人的生命安全，使他們取得自我鬥爭的勝利，使他們現在能愉快的進行工作，決不能看成是“違犯憲法”或“非法扣押”。

肅反運動中，黨為了幫助有一般政治歷史問題的人放下包袱，和搞清反革命分子的問題，確是做到了仁至義盡。為了決不冤枉一個好人，領導上對問題做到了反復的調查、研究，調動了大批幹部，花了大量的旅費外出調查。有的為了弄清一個人的歷史問題，甚至跑到四川、康藏，走遍了大半个中國。在搞清歷史問題的過程中，領導上對有問題的人的工資照發，在生活上給予同樣的照顧。運動以後，除反革命分子被依法懲辦或寬大處理外，對一般有問題的同志都是原職原薪，恢復了工作。在評資工作中領導上也是以按勞取酬

的原則進行的。我校工資最高的（二級）教師就是在肅反中曾經隱瞞自己政治歷史問題的人。難道這些事實是可以抹殺的嗎？

拿我自己來講，文化水平是中學程度，解放前沒有做過教育工作，曾當過舊職員，也曾在歷史上做過反人民的工具。解放後黨是怎樣對待我呢？黨交給了我人民教師的光榮任務，並對我進行培養、提拔。我做過小學副教導主任、副校長，後來又調我當中學教師。肅反運動以後，在工作上、思想上、生活上對我進行了不斷的鼓勵和幫助，表揚過我在工作中微小成績，指出我的努力方向；群眾信任我，選舉我做工會委員；市委、中學黨委、和學校黨支部，曾先後三次徵求我對肅反運動的意見和結論的意見。這些事實只有使我感到黨和群眾對我更加信任、更加愛護，我深深的為這種溫暖所感動，我流過眼淚，我痛恨自己，我想在肅反運動中有問題的同志們一定會和我有同樣的感受吧。

通過肅反運動僅在我們學校里就清查出來四個反革命分子，給四十位教師弄清了政治歷史問題，下了結論，使他們放下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安心工作，領導上也了解了他們的真實情況，正確的按照德才標準進行了安排，發揮他們工作的積極性，這些偉大的成績能看不見嗎？僅就以上我所親身感受的事實，我認為足以說明了中學肅反運動成績是基本的、偉大的，黨是英明的、正確的。儘管右派分子認為是“教條主義”是“公式化”，告訴你們歪曲是壓不倒事實的。

我希望在肅反運動中曾經有過問題的同志們，在偉大的政治鬥爭和思想鬥爭的面前，我們要反躬自問，飲水思源，應該問一問解放前自己在思想上或行動上是怎樣對待共產

党，解放后党又是怎样对待自己。想一想过去的的生活比比现在，看一看我們所处的偉大时代和幸福的前途，我們不应该沉悶，更不应该在思想上徬徨，要提高我們的政治嗅觉，評一評那些企图一笔抹煞肃反成績的人，是真正为你“报冤屈”为你“訴不平”嗎？他們的居心何在？我們要勇敢的站起来，站穩立場坚决的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在党和群众的帮助下虛心的改造自己，我們不做右派分子們的思想俘虏，我們不要为那些別有用心的野心家們所利用。

(1957年7月3日青島日报)

我認为肃反並不“伤感情”

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講師 王維祺

在肃反运动中我是个被审查的对象。現在把我在肃反中所經過的事实写出来，就可以完全証明右派分子們說肃反运动“糟糕透頂了”的論調不但是錯誤的、荒謬的，而且是別有用心、別有企图的。

右派分子說：“把素日对党提意見多的人肃了，把好人肃了……”。这种說法，非常恶毒，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拿我个人來說吧，我素日对党一条意見未提过，也被肃了。那末，我为什么被肃呢？主要是我的历史复杂，有很多檢举的材料。我們学院的領導上是根据材料肃的。現在我举出两条作例：

①檢举材料上說我在旧社会做商科学学校校长时，曾递过黑名单。

②在国民党中做过諜报队长。凭这两条，以我自己看来

也應該肅；況且我自己在履歷表上親筆寫着曾經在舊社會的學校中做過校長一年，國民黨軍隊中做過政治部千事八個月，又有這兩種材料一对照，還不應該審查嗎？右派分子所謂“給黨提意見多的人就肅，把好人肅了”，是不符合事實的。

右派分子又說：“肅反不應該搞……”。我的看法正和他們相反，我認為通過肅反，領導上能把每個人素日的問題，一時無法証實而看錯了的，倒糾正過來了。還是拿我自己作例吧，在肅反期間，經過我把整個歷史做了全盤交代，領導上又化費了許多的時間和金錢，徹底搞清楚了，遞黑名單的不是王維祺，我也未做過任何諜報的工作。不是我的問題，黨一點也未加在我的身上。若是沒有肅反運動的話，我就得帶着陷害青年和丑惡特務罪名的嫌疑生活下去。所以我說肅反運動是應該搞的。至于在各個角落里边搞出很多的反革命分子，以及從台灣派遣來的特務，有的自動投降，有的被人民檢舉，這能說不是肅反運動的功用嗎？

右派分子又說什麼“傷感情”啦，“損害積極性”啦……我看不但未傷感情，相反的却增加感情了。如我在肅反前，因為自己的問題未解決（指上面說的遞黑名單……），不能主動地去靠近領導，而領導呢？以我想來，掌握了我的歷史材料，不敢相信我。因此，我見着領導就躲着走。通過肅反，我的歷史問題真象大白了，我從內心里不但願意接近領導也敢接近領導了。我在工作中的積極性也大大地提高了。在肅反前，我总是得過且過，如在教研室開會，也不願多發言，更不堅持意見，怕說錯了，和自己的問題聯繫起來。現在呢，基本上做到大小會都發言，不但談的比以前多了，也敢于堅持意見。又如在講堂上給同學們講書，肅反前

除掉讲义內的話，一点也不敢多談，現在我講課时就多給同學講些材料。由于心情愉快，身体也胖了。

我从自己的体验中認識到，肃反政策無論在那方面都是完全正确，对于工作和个人都是有好处的。右派分子的謠言是別有用心的。他們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建設，我們要把他們的真实面孔剝出来，把他們的腐朽思想挖出来，叫大家認識到这一小撮右派分子是仇視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建設。我們要坚决地和一切右派分子划清界綫，加强地团结起来，永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前进，頑强和右派分子做斗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1957年7月19日辽宁日报)

經過肃反使我增強进步信心

青島九中教师 陈可新

我在一九五五年青島中等学校第一批肃反运动中被斗争过，但运动以后，我的“委屈”情緒不大，而且通过亲身感受，我愈来愈深刻地体会到肃反运动对我的教育，和肃反运动的偉大意义。

解放前，我曾做过国民党反动統治的工具，象我这样历史較复杂的人，在运动中追查我的历史是必要的。組織上經過反复調查了解，搞清了問題，作出了正确的結論，使我放下了历史包袱；領導上还在平反會議上宣布了我的結論，向我道歉；党支部書記和其他同志曾再三征求我对运动、对結論的意見，帮助我提高認識，解除顧慮。現在我在学校中担

任語文教研組組長兼高三班主任，學校中有一些較重要的工作也交給我做，我感到黨對我是關懷和信任的。同時，我自己存在的一些錯誤思想行動，以前認識很差，通過肅反運動，也有了較深刻的認識；有幾位老師說，肅反後我的工作作風在某些地方有了明顯改進，這說明運動對我的教育確實很大，鼓勵了我爭取進步的信心。

這次整風中，有些右派分子抓住第一批肅反中的個別偏差和錯誤，故意誇大事實，歪曲政策，否定肅反成績，當時我受水平限制，對這些謬言還沒有完全識別清楚。但對東星北之流的反動言論，是很感氣憤的。以後，經過學習和反右派鬥爭的開展，對這些右派分子的真面目和這些反動言論的實質，有了明確的認識。曲北韋在肅反中沒有被鬥，為什麼要替被鬥的人“訴冤”？徐一貫在解放後一直受到黨和人民的重用，為什麼要替“舊職人員”“鳴不平”？這兩個右派分子都是想以此來歪曲黨的政策，否定黨的領導，破壞黨與知識分子的團結，以達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目的，至於東星北，是既有反黨言論，又干過訓練特務的罪惡勾當，在肅反運動中對他進行鬥爭是完全正確的，這次鳴放中他又向黨猖狂進攻，正是他反動本質的再次暴露，所以我完全同意並支持山大物理系數學系教職員建議修改對東星北肅反結論的意見。我們還必須提高警惕，堅決擊潰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繼續肅清一切殘余反革命分子，保衛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最後，我希望在肅反運動中被鬥過的同志，應該正確認識自己的問題，正確認識肅反運動，千萬不要因為自己曾經被鬥或受過一些“委屈”，而模糊了自己根本的立場觀點，看不見肅反運動的偉大意義和成績。如果存在這種情緒，就很

容易被右派分子利用，那是很危險的，我們必須在当前的偉大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中站稳革命立場，坚决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勇敢投入反右派斗争，以提高覺悟，改造自己，为偉大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1957年7月24日青島日报)

我对肃反运动的亲身体会

城市建設局工程师 刘汉耀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徐一貫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謬論，虽已引起了全市人民的憤怒与批駁，但徐一貫至今仍沒有很好的交代。他的所謂“檢查”，仍是空話連篇，光戴帽子，不肯“脫褲子割尾巴”。在民革小組座談中，連素有涵養的老先生們，都对他这种狡猾态度气憤得很，同声斥責。

为了駁斥徐一貫对于肃反問題的謬論，我以自己的亲身体會，来个“現身說法”，从而証明肃反运动的偉大成績和意义。

我是第一批肃反中在城市建設局被斗争的主要对象。根据我的情况应不应该斗争呢？斗争之后，我和党是对立了，还是更靠近了呢？肃反斗争对社会主义建設有利呢，还是無利？对个人是好，还是坏呢？現在可讓事实來說明：

济南未解放前，我是在軍統特务头子王崇五任济南市长时期的工务局长。大家都知道，在旧社会中市长和局长的关系一般是不简单的。后来我随兵工厂去台湾，解放前几个月我又自台湾回青島来任水厂厂长。同志們請想一想，我既和

軍統頭子有社會關係，又在解放前夕從台灣跑回來，況且又有當時濟南市政府人事室主任（軍統特務）檢舉我是軍統特務。既有這些重要情節，應不應該列為肅反鬥爭對象呢？我自己認為完全是應該的。從這一點也可以證明黨和政府對肅反鬥爭對象的確定，都是有根據的，是慎重的，絕不象右派分子所誣蔑是任意胡來和打擊報復的。

通過肅反運動，黨派人山南海北地去調查，搞清了我的社會關係和歷史問題，結論是好人，給我平了反。這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啊！特別是通過運動也考驗了我。在運動中我仍然熱愛工作，堅持自己應負的責任，糾正了工程上的損失，並未因被鬥爭而丟手不管。因此，現在我的心情是輕鬆愉快的。

運動過後，王副市長曾安慰過我，建設局黨的負責同志也曾和我解釋過肅反的意義。因為搞清了我的問題，組織上對我的戒心解除了，更加信任我了。一九五六年七月，我的肅反問題尚未結案（當然問題已基本搞清了），組織上就把我調到設計室擔任技術上的負責人。這是一個負責全市工程設計的重要單位，如果黨不信任我，能把這個重擔子放在我的身上嗎？自此我也是兢兢業業地來從事工作，領導上對我也更加尊重。例如，有幾次市委書記和市長宴請蘇聯專家，都叫我去作陪，使我感到很光榮。因此，我對肅反運動的重大意義的亲身体會是：①清除了革命隊伍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②弄清了幹部的政治情況，組織上對幹部可更大膽使用，而幹部也可以更好地為社會主義建設貢獻力量；③更加強了人民內部的團結。

當然，在肅反運動中自己也曾有過痛苦，感到受了“委

屈”；运动过了之后，也有一个时期心情是激动而不平静的。但这主要是因为自己的思想不健康，对肃反的偉大意义不了解。后来在工作中，逐渐体会到肃反的偉大意义，那种不平静的心情也就逐渐消失了。

我很奇怪，徐一貫身为政协副主席，做着统战工作，为什么会絲毫看不到肃反运动的偉大成績，而竟無休止地扩大肃反运动中的缺点，一再和党鬧对立，向党进攻呢？一定是別有企图！

現在我忠告徐一貫，應該老实地彻底交代自己的阴謀活动，来向人民請罪，才能得到人民的寬恕。如再繼續坚持錯誤，必将自絕于人民！（1957年7月24日青島日报）

我这个冒牌特务是在肃反中查清的！

青島十四中学教員 李鴻成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會議上所作的关于政法工作的报告中，肯定了肃反运动的偉大成績，并援引了很多事例加以說明。其中有这样一个例子：“在肃反斗争中，青島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个中学教員，解放前为了抬高个人的身价，曾經冒充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員，冒充‘藍衣社’，对他的邻居自称是‘軍統特务’，甚至还介紹了两个人参加了他的‘軍統’。解放后这两个人坦白自首了，并向公安机关檢舉他。这样一来，这个中学教員便給自己造成了极为复杂的尷尬局面。肃反斗争中，才将他的問題查清做了結論，把他自己戴上的特务帽子摘掉了。”这个报告

中提到的那个中学教員就是我。

我的情况是这样的：

我16岁小学毕业后，就到工厂中去做苦工。但是，由于我受了反动教育和当时社会的影响，在思想上很崇拜国民党；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更羡慕国民党的所谓地下工作者，羡慕那些特务组织。我曾主动地于夜间收听“中央社”的新闻广播，白天到工厂去宣传，还自称是国民党地下特务组织“蓝衣社”的小组负责人，并且答应介绍别人参加，甚至有人把相片都交给了我。当时，我还和平度的国民党游击队张金铭部下的队员王铎交了朋友，过往很密切。抗战胜利后，在我的朋友中间有的就是军统特务，我们经常来往，又通过他们的关系认识了本市伪台东警察局局长李克炼，还用他的名片到警察局去保释过人。从这一系列的事实来看，无论是在思想上、言论上、行动上都给自己造成了一个特务身份，以致在肃反运动中形成了一个自己百口难辩的局面。当时我认为就是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了。

然而党是伟大的，党对我的问题作了细致的调查和研究。结果正如毛主席所说的：“不冤枉一个好人。”实事求是地替我搞清了复杂的历史问题，正确地当众下了结论。象我这样复杂的问题要不是全国范围内开展群众性的肃反运动和党的正确领导要想搞得一清二楚是绝对不可能的。

象我这样的情况，在肃反运动中也不是绝无仅有的，就在我们学校还有一个人，他过去盗窃了一个特务的身份证，以后他就利用这个身份证改名换姓住了医院，又利用了特务的资历、学历找了工作。一直到解放后他才不用那个特务的名字。这个人的复杂问题也在肃反运动中弄清楚了。

我們当不会健忘，在青島解放前夕，不知有多少青年、工人被莫須有的理由扣上“赤色嫌疑”的帽子，而被裝在麻袋中拋到海里。越是想到过去越使我們感到今天不是共产党的偉大領導、不是偉大的肃反运动，誰能这样英明地解决这样复杂的問題呢？肃反后我心里亮堂了。我积极地工作，在工作中也出現了一些成績。这难道不是肃反运动的成績而是缺点嗎？

右派分子还說，肃反中是为了达到个人打击报复而斗争，是冤枉好人；有的将中学的肃反运动說成一团糟。是这样的嗎？不是！单拿我們十四中來說，通过肃反运动，清查出了两名反革命分子。也还有一些是由于党的政策界限的再次放寬，而結論为“不以反革命分子論处‘或’不再以反革命分子論处”的。难道这也是“搞錯了”嗎？据我所知，組織上为了帮助我們这些人弄清問題化了很多心血，有时，为了弄清一个人的問題就跑遍了半个中国，到处查对。丧心病狂的右派分子为什么看不到这些对人民高度負責、实事求是的事实呢？

右派分子还說在肃反运动中，是党“縱容”黨員和积极分子打人罵人。据我了解，第一批肃反运动中，打人、罵人的現象，在个别单位里确实有过，但这都是在反革命分子或有重大嫌疑分子抗拒交代、群众激于义憤的情况下发生的。可是必須声明，領導上在运动一开始，就一再告戒同志們应当防止偏差，而且当个别单位发生錯誤后，都及时予以糾正。我們学校就沒有发生打、罵人等侵犯人权、侮辱人格的現象。即使对以后被証实为反革命分子的人斗争时，也都是面对面的分析、批判和揭发。

右派分子还說搜查是“違犯宪法”，这更是恶意的誣蔑。我認为对反革命嫌疑的人进行搜查是完全应该的，是实事求是的作法。这不仅是根据宪法第十九条的規定，执行了宪法，并且对被搜查者本身也是有好处的，因为通过搜查可以証实許多問題，这难道是“違犯和破坏了宪法”嗎？

再看在肃反运动后党是怎样对待我的。肃反后，我校党支部公布了我的历史問題的結論，征詢我的意見。党支部書記唯恐我有顧慮，先后和我談过四、五次話，开导、劝慰和鼓励我，其他党员同志也都跟我談过心，他們給我很大的力量，我在工作中更起勁了。肃反后的两年以来，我在党的教育下，有了进步，在教学工作中有了提高。現在我是备课組長，是学校的优秀教师，許多党的活动和研究学校工作的重要會議，我經常被邀請列席參加。党不仅在工作上、思想上关心我，就是在生活上也是对我無微不至的关怀。去年夏天一次大雨，我住的房子一部分房頂塌了，組織上給予我很大的帮助，支部書記还亲自到我家探望。

以上这些，充分說明党是信任我的。我衷心的感謝中国共产党，我要坚决地站在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的立場上同右派分子斗争到底，不获全胜决不罢休！

(1957年7月27日青島日报)

倪鳴皋以自己的经历駁斥 右派分子的謬論

在肃反运动中受到政府寬大处理的反革命分子倪鳴皋，現在住在鞍山市鉄西区南七道街二十九号。日前他給报社写

来一封信，以自己的经历驳斥右派分子反共言论。现在将来信发表如下：

“最近听到一些右派分子说，不要共产党领导，又说镇反多杀了人。这简直是胡说。杀了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有什么可惜呢？不要共产党领导国家能这样富强吗？”

共产党的政策是铁面无私、说一不二的。就拿肃反政策来说吧，任何一个反革命分子，只要向政府真诚坦白，向人民低头认罪，共产党便不杀他们的头。我在伪满时，做过日本宪兵队的联络员（特务），曾讹诈勒索，并有血债。解放后又在天棚里隐藏五年。根据我的罪恶，应当法办。可是因为我在党的肃反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的感召下，在一九五六年四月十日亲自到公安局坦白自首了。特别使我难忘的是，坦白后的第十二天即四月二十二日，鞍山市人民检察院宣布对我不予起诉。这能说共产党在镇反和肃反工作中是‘宁左勿右’千篇一律多杀人吗？”

我被宽大处理后，政府对我的关怀和照顾是无微不至的。市公安局马局长、张处长、繁荣街派出所所长都到我家来看过我，他们关心我的腿肿和眼花，让我上医院治疗。我恢复健康后，政府发给我一份摊贩许可（劈材业），有了正当职业。我大儿子在高爐公司工作更加积极，二儿子在~~本溪钢铁公司~~本溪钢铁公司工作，在铁西区生产队作会计工作。三儿子在本溪钢铁公司作电工。这就是我们政府给一个坦白了的罪恶累累的反革命分子的出路。镇反杀了坚决反革命分子不可惜，这不能说明共产党不好！我是一个有良心的人，我坚决反对右派分子反共谬论，拥护共产党领导！”

（1957年7月18日辽宁日报）